

# 炎黄春秋



1957年6月，周总理接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左起：韩世昌、梅兰芳、白云生。

萧克：《长征大事典》序言  
续范亭与“西安事变”  
由“沈崇事件”引发的一场爱国斗争



蔡元培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后日子  
杜任之被阎锡山决意  
处决又获救经过  
试析“康生现象”  
的历史条件

12  
96

# 「孙中山与现代文明」

## 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沪举行



- ① 讨论会主席台
- ②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讲话
- ③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讲话
- ④ 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沂讲话
- 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宝光讲话并展示蒋克瞻词
- ⑥ 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讲话
- ⑦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戴逸作总结性发言
- ⑧ 日本学者山口一郎大会发言
- ⑨ 孙中山先生孙女孙穗芳大会发言
- ⑩ 出席会议全体代表谒宋庆龄墓并献花篮

陈卫平、杜卫正摄影

# 炎 黄 春 秋

1996/12 (总第57期)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楔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飞无线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建设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排版:北京维科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11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00元

# 目 录

## 专 稿

- ②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唁电
- ② 沉痛悼念我们的会长周谷老 ..... 《炎黄春秋》杂志社
- ④ 《长征大事典》序言 ..... 萧 克

## 春 秋 笔

- ⑦ 续范亭与“西安事变” ..... 邢同科
- ⑮ 由“沈崇事件”引发的一场  
爱国斗争 ..... 方 复 杨 立 胡东明
- ⑳ 刘善本驾机起义始末 ..... 温济泽
- ㉔ 胡耀邦最后一次故乡行 ..... 杨第甫
- ㉗ 罗青被捕与“七君子事件” ..... 申 春
- ⑳ 杜任之被阎锡山决意处死又获救经过 ..... 马 明

## 争 鸣 录

- ⑳ 试析“康生现象”的历史条件 ..... 冯建辉

## 殒 星 篇

- ⑳ 法学家张志让与三位共产党人的交往 ..... 钱听涛
- ㉑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后日子 ..... 刘小清
- ④⑤ 中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 ..... 于建宁 吴 鹏

## 长 征 颂

- ④⑨ 我送贺老总一匹“绿马” ..... 陶汉章
- ⑤① 万里征途生死情 ..... 易 雯 黄道强
- ⑤③ 莫文骅老将军的两件珍藏品 ..... 李春宇

## 人 海 浪

- ⑤⑤ 吴子熊的玻璃雕刻艺术  
令世界惊叹 ..... 陈明红 金正传

## 耻 辱 柱

- ⑤⑧ 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 赵友慈

## 同 心 结

- ⑥② 遥念谢冰莹 ..... 倪 锋

## 艺 苑 志

- ⑥④ 怀念周总理对昆曲艺术的扶持 ..... 陆 放
- ⑥⑤ 新长安大戏院开幕忆旧 ..... 葛献挺

## 古 镜 台

- ⑥⑧ 张謇:从状元郎到实业家 ..... 李羽壮
- ⑦② 廉俭恤民的君主隋文帝 ..... 贺 海

## 九 州 景

- ⑦④ 夜游秦淮 ..... 傅 贵
- ⑦⑤ 秋雨亭新记 ..... 吴继路

## 总 目 录

- ⑦ 《炎黄春秋》1996年1-12期总目录 ..... 本刊编辑部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唁电

李冰伯同志并请转

周谷城同志治丧小组：

痛悉周谷城同志不幸病逝，不胜哀悼。

周谷城同志是我国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并担任过国家领导人。从筹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担任第一任会长八年多以来，为弘扬炎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殚精竭虑。直到高龄病重期间，仍然关心我会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他的逝世是我会的重大损失。

我会全体同志将永远不忘周谷城会长对我会作出的贡献和指导。我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德；学习他孜孜以求、勤奋治学的态度，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贡献力量。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1996年11月12日

## 沉痛悼念我们的会长周谷老

### ●《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同仁

1996年11月10日18时零5分，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中华炎黄研究会会长周谷城，在上海逝世。

噩耗传来，我社同仁不胜哀伤。去年的12月，周谷老还听取过我们研究会的工作汇报，签发过文件；今年10月末，研究会的领导再次去拜望周谷老时，虽知他已病重，但总认为他能再闯险关，活到香港回归的1997年，活到他的百岁诞辰。谁也没有想到，他辞世的消息来得这样早。研究会的领导几次打长途电话给李

冰伯大姐（周谷城夫人、研究会理事），除表示慰问之意，总想派代表赴沪，最后看我们的老会长一眼，最后送我们的老会长一程。李大姐的回答却是那样斩钉截铁：“不必了，周谷老说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留下遗言：一切从简，不留骨灰，不举行任何追悼仪式。”

11月20日，周谷老的遗体已在上海火化。同日，新华社编发的《周谷城同志生平》中盛赞他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生平》还特别提到周





80年代的周谷城先生

谷老担任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殚精竭虑。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早在1987年冬，众多海内外爱国志士和专家学者联名倡议，在中原大地——郑州的黄河之滨兴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时，就得到了周谷老的热情支持，并写了“炎黄二帝，大型雕塑；功德之微，后世仰慕”的题词。1990年，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为目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式筹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老，虽公务繁忙，仍欣然接受大家的推举，担任了第一任会长。1991年5月10日，研究会宣告成立，他在致大会的书面讲话中，明确地讲：“炎黄二帝是我们民族的象征。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就是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创刊后，不断得到他的关怀和指导，杂志的学术增刊，就是在周谷老的积极推动下办起来的。

周谷老一生为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化、捍卫中华文化而以一贯之，坚持不懈。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七十余载，硕果累累。他曾以一人之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和

《世界通史》三册。193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是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著而成的，因而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在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则更具独到见解，打破了旧的世界史以欧洲为中心的老框框。他在1961年初所写的《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论文中，诠释他的观点说，“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他批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是无视亚非的历史文明。

周谷老在世界史研究中，据理争取中华文明应有的地位；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则据理呼唤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1987年版）中说：“中国过去以为旧的精神文明如儒家学说等，实为生产进步的阻碍。今则不然，因补上了生产技术一课，生产发达了，可能用得着一些固有传统的文化中之精华。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不会完全消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他还作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以毛主席和他自己对旧体诗看法为例说：“毛主席原来认为旧诗是坏透了的东西，是毒药，要把它们消灭掉。然而他自己的诗照样印。我当初也是这个讲法，现在我放弃这个主张，我自己也写歪诗，而且批评了毛主席的主张。我作了一首诗，其中：‘莫再谦称传谬种，敢将敦厚育英才。’就是说不必客气地讲谬种了，要敢于以诗教育人，这是一个好办法。”

周谷老在学术研究中勇于创新、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更为学界所尊敬。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周谷老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在逻辑学界引出不同意见，他再三答辩，并认为“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但后来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在重压之下，他坚信“双百”方针的正确，没有被“帽子”压倒。1957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史学与美学的关系，其中《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有两点（即“无差别境界”和对“时代精神”的解释）引起极大的争论。从中，也遭到了反动文痞姚文元的恶毒攻击。直至“文革”中，周谷老身遭迫害，关进“牛棚”，甚至被“触及皮肉”，他亦拒绝声明放弃自己的见解，表现了一个正直文人的铮铮铁骨。

周谷老已经走了，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他的事业尚在，精神永垂。我们研究会全体同志，我们杂志社全体同仁，将永远不忘老会长对我会作出的贡献，永远不忘老会长对《炎黄春秋》杂志的关心，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的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德，学习他孜孜以求、严谨治学的态度，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

我们将把周谷老生前鞭策自己的一句话：“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把工作做得更好，把杂志办得更好。

# 《长征大事典》序言

● 萧 克

**编者按：**作为“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之一的编纂《长征大事典》的工作业已完成，萧克老将军为她写了《序言》。序言介绍了这部书，介绍了长征，阐述了纪念长征的意义，进而论及了如何看待历史，如何对待前人记述的历史资料，如何对待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等等。本刊转载此文，目的是让更多的读者读到这篇《序》。

今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长征这个名词，古来就有。唐诗中就有这样的名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万里长征，多么雄壮！而我们红军的长征，红一方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行程二万里，红四方面军从渡嘉陵江算起，行程一万里，要从鄂豫皖算起，就有两万多里。还有红二十五军，行程也有一万里。长征是战斗队，战胜了敌人；长征是宣传队，宣传了革命；长征是播种机，播下了革命胜利的种子。这样的长征，名副其实是开天辟地第一回。长征精神，已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炎黄子孙共有的宝贵遗产。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在今日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长征是中国革命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典型例子。坦率地说，我们红军各部队的长征，大致上是被迫进行的。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红军不能继续在原先所在的根据地坚持下去，就先后进行大转移。在大转移中，我们觉悟了，遵义会议从根本上纠正了中央红军原先的错误；红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在遵义会议的推动下，也纠正了先前的错误。一旦纠正了错误，尽管仍有敌人大军前堵后追，我们在被动中逐渐取得了主动。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我们思想上、战

略上取得了这种主动的结果。离开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革命规律准确的把握，我们就要陷于被动局面；能够实事求是，摆脱种种主观主义、空想主义，我们就能获得自觉与主动。当年的长征是如此，整个革命战争是如此；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如此！

长征是从东部走到西部，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关系问题值得研究。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几乎都是从东南地区开始的。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初都是从广东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以上海、北京为中心，后来又以广东为基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中国革命的成功，都有待中部与西部的崛起。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这样。60年前，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解放从东部走到西部，革命在西部发展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有一个东部、中部、西部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在积极发展东部的同时，中部、西部要像当年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建立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一样，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利用东部的各

种帮助,来使自己有一个大的发展。东部地区要关心、支持西部。没有西部的发展,中国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不可能的。

长征还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在长征中,我们的物质条件很差,自然条件很恶劣,四周有强大的敌人不断进攻,缺吃少穿,困难多么严重!但是,我们还是胜利了。因为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具有一往无前、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去夺取胜利的精神。我们那时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有为全国工农大众争取翻身解放的热切追求,所以能不畏牺牲地奋斗。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扎扎实实地团结奋斗,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千万不要丢掉红军长征中那种坚定、乐观、团结、艰苦奋斗的精神。

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工农红军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不止,卓越地代表了这些传统。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已经站起来了。但是,我们还不够发达,还不够富强,我们要真正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必须继续努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就是我们应继续努力的重要方向。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有一个“恕道”,就是以“推己及人”的精神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记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末期,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同我说过,要重视这个“恕”字。要以“恕道”来解决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东部地区的人要“推己及人”,多想想中部、西部;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要“推己及人”,多想想尚未达到温饱及小康的人;在岗的要“推己及人”,多想想下岗及待业的人。中国素来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憎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今天,大家都能够“推己及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人们之间互相支持的祥和气氛。在党内,也利于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的发扬;在国家,能够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长征中红军各个部队团结协作、相互配合和沿途各个兄弟民族帮助的结果。同时,还离不开南方各省区游击队与白区党的策应。我们知道,在红军主力进行长征转移后,中央苏区和各个根据地留下了一批同志坚持进行游击战争。在陕北,有着相当强大的红军部队,在海南,有“红旗不倒”的琼崖游击队,在东北也有我党领导的武装。这些部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从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保存和壮大了革命骨干。与此同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区党,也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1935年,党领导下的“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策应了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毛泽东说:“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长征大事典》在以上各方面都有记述。

从前面举的历史事实来看,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与互相帮助多么重要。不仅革命时期如此,现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研究红军长征历史,应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长征大事典》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与此同时,也保留和反映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和观点,以备以后继续研究。

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为见习排长了。

这很不好。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当然,这里是指那些“始作俑者”;至于有些人记忆错误,

或人云亦云，任意传抄者，虽非有意，但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还有一种人，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喜欢引用权威者的只言片语来论证历史，把一些比较清楚的历史问题搞复杂化了。我曾经说过，什么是权威？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我们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要搞清历史事实，首先就应该广泛地搜集前人记述的历史资料。讲好话的要收集，讲坏话的也要参考。有些人总喜欢听好话，歌功颂德，不亦乐乎？一听到说我们有哪处不好，某人哪处不是就不自在。其实，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好话不一定就好，坏话不一定都坏，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好话和坏话。我们哪能事事都做得好呢？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起，我们的错误

还少吗？有了错误，自己不愿讲，也不让人家讲，这是不正确的。讲坏话的人当然也有立场问题或者说角度问题，但我们不仅要注意讲话人的立场，而且更要看他的讲话是否言之有据。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史实，对于前人记述的历史资料，要广泛搜集。在搞清楚史实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事实，鉴别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间的关系，从分析到综合，从中寻出历史进步的规律。一句话：“求实存真。”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原则。

以上所说的几点，我们在《长征大事典》的编写中是尽了力的。祝愿这部《长征大事典》成为弘扬长征精神的一部有历史价值的好书。

1996年5月15日

## “孙中山与现代文明” 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今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上海师大、宝钢集团协助下，于10月28日至30日在上海举行“孙中山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

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沂致开幕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宝光宣读薄一波、萧克的祝贺信和题词。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出席并讲了话。出席的还有贾亦斌、宋堃、冯征、杜导正、欧祁、欧远方等。

著名近代史学者、孙中山研究专家戴逸、章开沅、姜义华，日本著名学者山口一郎等，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和美国、韩国的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就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理论和思想以及对中国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想等广泛问题，进行了为期3天的热烈探讨和交流，展示了近年来中外学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丰硕成果。

会议期间，会议代表还瞻仰了宋庆龄陵园、参观孙中山在上海的故居。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会议结束时会见了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向他们介绍了上海改革开放的情况。

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也远道赶来参加这次会议。

(李耐因)



# 续范亭与“西安事变”

● 邢同科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60周年纪念日。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我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有关“西安事变”成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毛主席在1936年12月27日发表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曾作过精辟的阐述：

……“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诸种形势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

续范亭就是毛主席所指的当时国民党左派势力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1935年12月26日，续范亭在中山陵剖腹明志的爱国壮举，推动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且对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据流传到海外的张学良将军的回忆录中透露，在续范亭孙陵剖腹被救于南京中央医院治

疗期间，他曾专程至医院慰问。他们曾就当时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局，推心置腹地作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谈话。

## 蒋介石坚持内战 续范亭孙陵切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魔爪伸向我华北地区。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民族危机日趋严重。

此时，身为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总参议的续范亭将军，曾两次亲到南京劝谏蒋介石。认为：亡国的灾祸迫在眉睫，内战打不得了。抗日图存是全民族的共同愿望，违背人民的愿望就会成为千古罪人。而蒋介石对他的进言则置若罔闻。

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了腊子口的时候，续范亭对红军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理解和赞同，红军抵达陕北，给全国抗日救亡带来一线希望，也使彷徨中的续范亭受到极大鼓舞。1935年11月，他怀着满腔热



续范亭将军

情，离开兰州寓所，再次经平津抵达南京呼吁抗日，试图观察形势，力挽危局，实现联合抗日。可是他在南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时值国民党“五大”召开，会上仍是高谈“攘外必先安内”的主调，引起民众的不满。11月1日，在国府发生了孙凤鸣枪击汪精卫的事件。12月9日、16日，北平爆发的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示威运动，又遭到当局的无理镇压。续范亭对一些人愤慨地说：“有死难之学生，无死难之将军，此耻最盛！”他曾与老友于右任等频频接触，商讨救国良策，仍是一无所获。有的朋友劝他“一起到总理陵前哭陵去”，续范亭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这时的续范亭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认为：“党国大权掌握在蒋介石、汪精卫这些

人手里，这样下去中国迟早得亡国。”

对蒋介石已经失望，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续范亭，决心以一死震惊国人，唤起民族抗日救国情绪，力挽狂澜，影响政局。遂于1935年12月26日到中山陵愤而以短剑切腹，并留下《敦促抗日绝命书》、《祭总理文》和《绝命诗》五首以明心志。

在他自杀遇救时，从他内衣口袋里检出《祭总理文》一纸。文内痛心疾首地写道：“呜呼痛哉！民气将尽，国已不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上焉者犹自私自利，下焉者犹醉生梦死，只知个人利害，而不顾国家之存亡；至今寇已深入，汉奸遍地，惨杀我青年，摧毁我民气，势已不可再忍，再忍则唯有一致投敌，岂不为天下笑？耻莫甚矣！”“人心不死，四万万人不能俱尽也！为民族争人格，为世界打不平，全在此举”，“今日陵国之血聊当秦庭之泪”……

国民党当时对续范亭中山陵切腹一举极为恐惧，蒋介石亦甚是恼火。他们一面派特务监视在医院治疗的续范亭，一面下令不准记者采访，禁止各报发表消息和评论，企图搞“新闻封锁”。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天，经过新闻媒介披露，举国上下对续范亭忠烈的爱国之举一时轰动。国民党上层军政要员也纷纷前往探视，慰勉函电纷至沓来。不少报纸在报道续范亭切腹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十分尖锐的评论，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政策。

尽管这次血的控诉未能直接促成国民党当局迅速改变既定政策，达成举国一致抗战御侮的局面，却也大大激发并鼓舞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内一切有识之士，包括如张学良、杨虎城这样一些国民党政府中的爱国的高级将领，也从这次事件中领悟到不少道理。

### 杨虎城飞函慰问 张学良探病长谈

续范亭切腹遇救在南京中央医院治疗期

间，遥居西安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来电告慰。

惊耗传来，悲痛无似。国势若此，吾侪真不愿偷生斯世矣。然念新亭对泣诸君，岂可畏死，含辱忍受，终支偏安之局。我国现势虽危，究胜东晋。尽我心力，徐图挽回，自有出头之日。万望吾兄为国珍摄，保存有用之身，以谋尽其所未足，是为切盼。

字里行间反映出杨虎城将军对续范亭壮举的无限感慨和极大钦佩，并把这种感慨和钦佩化作矢志改变时局的勇气和决心。

1936年2月下旬，就在续范亭伤愈即将出院前，张学良将军亲到医院探视。据当时陪护在院的刘定安老人回忆，他俩谈话相当投机，隔屋都能听到不时传来他们爽朗的笑声。张少帅同续范亭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细节至今虽不为人知，但就当时的背景而言，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一定是针对当时形势，商讨抗日救国大计的。张、续这次长谈，留给刘定安老人最深印象的一个细节是：张学良告别出门时又返过身来，伸出三个指头与续范亭会意地大声说：“咱们就来他个三元乎！”“三元乎”是麻将游戏中的一种术语，是红中、发财、白板相碰而和的满贯，是一翻全胜的意思。当时续、张二将军暗示的“三元乎”之意，绝非戏指牌局而言，而是寓指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方面联合起来抵制蒋介石内战政策，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公开谈论抗日，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许可的，尽管续范亭和张学良此次谈话形成共识，考虑到张的处境和复杂多变的形势，续范亭私下很少透露这次谈话的内容。此次会面后，续范亭情绪饱满，精神振奋，多次向刘定安表示：“不做佛教徒，便做共产党”的心意。

续范亭与张学良是在1935年夏天兰州相识的。当时张学良统帅东北军调往西北，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一次到兰州视察时，受到时任新一军总参议续范亭和军长邓宝珊的热情款待，谈话甚是相投，从此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因感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西北军的抗日情绪，而且东北军在“剿共”战斗中又屡屡受挫，张学良早已动摇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信念。认为：“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截至国民党召开“五大”时，张学良为“剿共”中惨败的东北军请求抚恤，而蒋介石不仅不允，还撤销了部队番号，并在中央全会上对张学良故意奚落，更加深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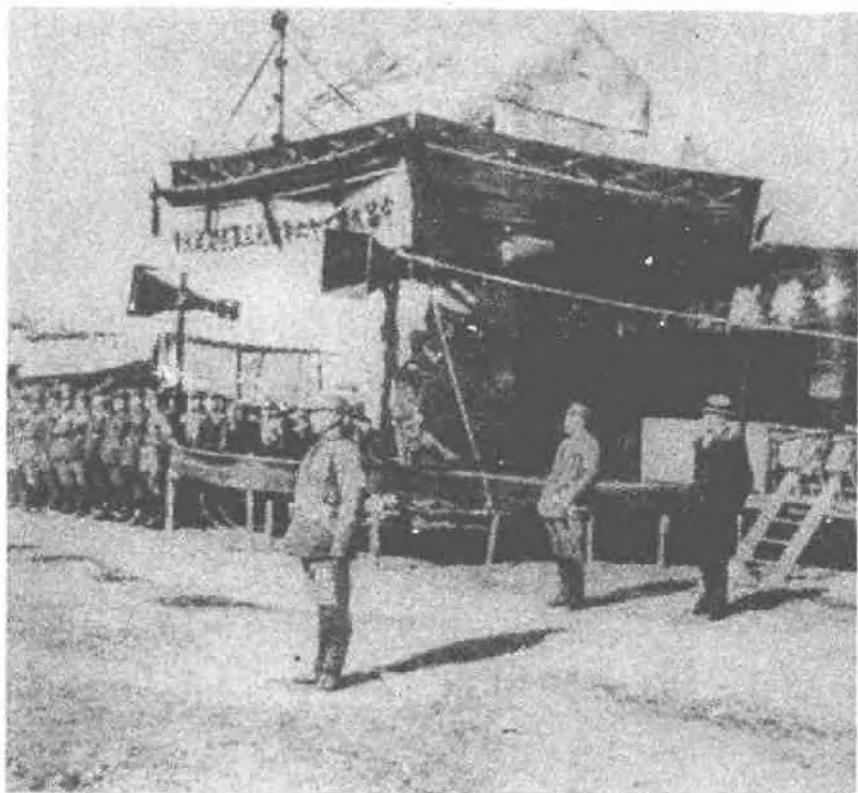
此前傅作义、阎锡山原本呼吁中央军援绥抗日，张学良也几次上书请缨作战而不被接纳，却派驻西北进行“剿共”内战，这些都使张学良受到极大刺激。在此情况下，续范亭与张学良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对形成寻求合作抗日的“三位一体”的共识是有着积极的影响的，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后，即通过各种渠道，加快了主动与红军接触的步伐足可证明。

3月4日，张学良化装豪商，驾机秘密飞抵洛川，同在那里正与王以哲将军谈判的中共代表李克农会面。张学良对毛泽东1月25日写的《致东北军将士书》表示完全拥护，对李克农和王以哲的谈判协议完全同意，并于3月5日早上达成联合抗日的三项口头协议。

9日，张学良又驾机飞往肤施（延安），参加了由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和刘鼎5人一起的秘密谈判，达成协议。这几次秘密谈判，使双方的合作关系迈向一个新阶段。

几乎就在张学良探视续范亭的同时，续范亭又亲自给西安的杨虎城将军写过一封长信，进一步激励杨将军“为公理而奋斗，为和平而牺牲，精诚团结，坚持到底，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的抗日斗志。

此后，以杨虎城为代表的十七路军同东北军和红军三方面的接触更加频繁，为西北地区联合抗日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也为而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  
续范亭应邀参加西安示威游  
行阅兵大会。前立者为杨虎  
城，后立穿黑衣者为续范亭

## 续将军应邀北上 “三位一体”起惊雷

1936年10月18日，杨虎城将军又亲到杭州拜会在西湖香山精舍养病的续范亭，这时续范亭病已痊愈，只是身体还相当虚弱。杨将军到来，续范亭格外欣喜，两位老友促膝交谈，直至深夜。杨虎城向续范亭谈了许多有关张杨携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内幕，明确透露杨与张有意逼蒋抗日的意向，使续范亭受到极大鼓舞。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与共产党方面的接触，起初都是各自分别秘密进行的。直到张、杨在洛川会晤时，彼此才坦诚相告，表明心迹，正式确立了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意向，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新型关系。就在这次会见时，杨虎城正式邀请续范亭前往西安，共图抗日救国大业。彼时的续范亭已是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他在一首赠杨虎城将军的诗中表示了“不怕死/不怕痛/不怕辛苦不怕穷/养成一身大无

畏/誓与倭寇决雌雄”的豪迈气概。

从杭州赴西安前夕，他还特意写了“尽此一报”4个大字，托工匠刻在香山洞的石壁上，作为以身许国，北上抗日的誓言。“三位一体”局面形成后，杨虎城又于10月间邀续范亭出山，以图大业。

续范亭到达西安，大约是11月20日以前。刚下火车，续式甫就陪他去见杨虎城，杨虎城设家宴为续范亭接风洗尘，并要他“赶快把身体养好，到时候，我还要请你出来帮忙呢”！

他从张学良、杨虎城及西安的一些朋友那里得知西安的许多情况，为实施联共抗日的救国大计，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秘密驻有共产党代表（此时的叶剑英亦在西安），协助他们培训干部，改造旧军。甚至隔河相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也迫于形势，声称要联共抗日。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张学良数次力诉、苦劝，甚至哭谏蒋介石，都遭到蒋的痛骂，执意命令张、杨继续剿共。并且指使其嫡系部队源源逼进潼关，形势十分严峻。

11月28日，杨虎城邀请续范亭参加了西



安反围城胜利 10 周年大会，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都参加了，规模颇为壮观。张将军讲话中勉励两军“以更坚决的意志与牺牲精神”，“一起对日作战”。杨虎城讲话中号召大家“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坚持此志，御侮争存”。大会群情激昂，会后，还举行了分路游行。这种地方军政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公开抗日集会，在当时全国恐怕也是没有先例的。

续范亭当日写过这样一段日记：

参加西安围城十周年纪念，愈知秦风强悍。自辛亥以来，革命之气始终未断，一脉相承至于而今，将来必能为救国之一力量。

这里所说的“秦风强悍”一语，对续范亭来说，是别有一番感悟的。1914 年，他与续西峰、井勿幕、胡景翼、孙岳、邓宝珊等在陕西的杨家园举行“华山聚义”，确立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方略；次年（1915 年），又与西峰等组织“西北护国讨袁军”，并由陕入晋与阎锡山作战；1919 年 4 月，续范亭参加靖国军四路胡景翼部，与杨虎城、岳维峻结为友好，协同作战，赶走陕西军阀陈树藩部；1926 年，国民军在京受挫，退居陕西三原。次年，续范亭受冯玉祥委派，提任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培训军政干部；1932 年，他又应杨虎城之约，与邓宝珊在甘肃组建新编第一军，以图抗击日寇侵略。此次，续范亭再次应杨虎城邀请，受命北上，共图救国大业。虽时过境迁，但观此西北军政民协力御侮的动人场面，确系是“一脉相承”的强悍“秦风”（“秦”即陕），怎能不令他感奋呢！

12 月 9 日这天，西安各界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再次高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在续范亭思想上也引起极为强烈的共鸣。

12 月 12 日，终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 张杨续同舟共济 共产党通力合作

事变当日，张、杨公布八项主张，通电全国。

约上午 9 时，杨虎城把续范亭接至杨的公馆，亲告事变经过，阐述“八项主张”内容。续范亭表示全力支持对蒋实行兵谏及“八项主张”，赞成邀请中共代表前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他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下午到式甫处与蒿、梦、哲诸人一谈。大家均顾念此次革命第二步法。予曰：只要革命的动机纯洁，虽失败亦有价值，况此次革命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整个战线。除此，中国亦再无出路也。

这里，续范亭明确指出：“此次革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除此，中国亦再无出路也！”可见从一开始，续范亭就对事变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无保留的支持。

12 月 15 日，续范亭又亲拟“十条”意见面见张学良、杨虎城，为他们出谋划策。这天的日记中又有过如下记述：

午间与式甫、侠侯谈此革命，虽动机纯洁，意义伟大，但须趋重事实，因拟十条面致张、杨，并面谈一切，主要在把握全国心理之重心。

张云：蒋已有回转，认为过去不肯容纳人言为过。然此次因戒备不严致启你们的事变，你们也真胆大，未知何人主谋。张答以大家意见俱如此，不过，我一人负责，委员长不必再问了。

续范亭面呈张、杨的“十条”意见的详细内容，虽迄今尚不全知。但观续范亭以往表现，与张、杨的关系及当时的反应，估计这些意见对稳定“三位一体”的格局，协调周边、内部及上下级关系，发展并扩大事变成果，都会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建议。张学良与杨虎城对续范亭的意见十分重视，即日送交当时的“设计委员会”审纳。

16 日，续范亭再次面见张、杨。在与张学良谈话时说到蒋之领袖欲太重，尚是虚荣未退，能决心为四万万人作奴仆，则自然成唯一领袖，此道唯甘地先生为彻底而纯洁。张学良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并说：“吾明日将以此进言。”

张学良在 17 日与蒋介石的会晤中，果然向蒋介石谈了续范亭所陈述的意见，续范亭的这

些意见对抑制蒋之举动，促其反省，并最后达成和平解决谅解是相当有益的。

16日这天，西北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会上，张、杨发表了情真意切、磊落大度的重要讲话。张学良在讲话中直言批评了蒋的不顾民意、一意孤行的独裁政策，表示“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声称“我们是诸位的公仆”，“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之。”杨虎城将军的讲话称：“我们要拥护我们的领袖张主任委员，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牺牲精神，在他的领导下，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续范亭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讲话给予积极评价。他在17日日记中认为讲话“主张正大，真诚痛切。此真诚文，可谓不朽文章，救国不朽之事，其在斯文矣”！

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根据续范亭等各方建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电请中共派代表前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通电国民党要员及各地实力派领袖人物，阐明事变原委；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改组陕西省政府，设立进行决策的“设计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团；解散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以及释放政治犯，封存中国银行，命令各部向西安地区集中，等等。

就在张、杨撤销“西北剿总”后不久，续范亭和景梅九等即组成了“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党部筹备委员会”，参加这一组织的还有李寿亭、焦子敬、师子敬、刘允臣、刘蔼如、曹俊夫、范紫东、李维武、史侠侯、尚卫民、王婆楞等数百人。提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实现各党派大联合，给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以有力之答复”。

续范亭还与在陕的晋绥社会名流组建了“晋绥旅陕救国同胞会”、“山西旅陕同胞援助晋绥抗敌将士委员会”等组织，积极草拟建议，通电四野，汇集筹款，慰劳将士，争取舆论，全力以赴地响应张、杨兵谏主张，发展抗日大好形势。

在南京方面大军压境，战事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责守潼关的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部，在国民党特务胁迫下有动摇倾向时，续范亭毅然接受杨虎城委托，于20日直抵大荔（冯部），对冯钦哉申明大义，劝其不要为亲日派所利用。后来虽然冯钦哉仍然投靠南京，但续范亭为国家之安危，不顾体弱劳顿，毅然前往的行为令人敬佩。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应邀来到西安，根据中共中央意见，与张、杨频频协商，在“三位一体”思想指导下，确立“逼蒋抗日”、和平解决的方针，使续范亭颇感欣慰。他在24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西安事变，实为四千余年之大转机，因与世界革命，民族存亡有直接之关系，值得吾等努力到底。”

12月23日，在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参加的“三位一体”，四方（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子文〉）谈判中，突破重重阻力，终于达成包括：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军各派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等六项口头协议。对这个协议，蒋介石承诺以“领袖”的“人格”担保执行。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得到周恩来和杨虎城同意的情况下，只身陪蒋折返南京。这天，续范亭也去机场送行，他在日记中写道：

……急驰赴飞机场，见两大机排列，一列已升火待发（即蒋、张所乘之飞机）。旁有汽车六辆……晚饭后约八时许，车来迎予，在式甫处闻蒋已抵洛阳矣，予始则哑然。

说也凑巧，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之日（1936年12月26日），正是续范亭中山陵剖腹一周年纪念日。续范亭在《我的自杀》一文中说：“当我在中山陵自杀的时候，我深信我这一刀，是能够影响到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并且连中国汉奸之类也给他点疼痛。”一年来的国内事态发展趋势，也证实了续范亭这一刀的社会效应。“西安事变”爆发了，亲日派势力遭到重创。

蒋介石一到南京，便无理扣押张学良将军，

# 續範亭沉痛悲壯

## 再告全國同胞

### 寫出「對中國現在時局認識」

### 揭穿漢奸陰謀及誤國罪惡

殺敵除奸，為全國民眾共同之要求，革命先進續範亭先生，鑒于親日份子之禍國誤國，用特一再呼籲，望全國奮起，一致殺敵，除昨發出全國同胞書外，今復以極沉

炮制所謂“对张杨的训词”，并纵兵西进，图用军事手段以达政治之目的。形势突又紧张起来。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安然归陕，确保“三位一体”局面，在1937年元旦，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在西安城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示威。续范亭陪同杨虎城检阅部队，这天天气和暖，参加检阅的军民约有两万多人，分别进行了重炮、骑兵、步兵、重机枪、迫击炮等演练。杨虎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认为：“除了一致之外，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对双十二事件，我们不但要了解这一事变的意义，我们更应该为这一事件的目的而努力”。在形势逆转、阵线对峙的当时，续范亭陪同杨虎城阅兵，既是对处于困境的杨虎城的支持，也是对南京政府的公开的个人示威。

针对南京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杨虎城在1月5日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愤怒指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但不遵守协议，反而调集重兵，集结潼关、华阴一带，积极作挑战之态势。杨虎城在通电中悲愤质问：“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心意？恃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其豆相煎之争。”并表示“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续范亭对杨虎城的通电非常拥护，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满腔义愤。仅在2月7日至10日的4天内就发表了4篇支持张、杨兵谏、痛斥南京政府和亲日派自食其言、卖国求荣的文章。其中发表在《工商日报》上的《劫后余生续范亭掬诚敬告国人书》和再告国人书《对于中国现在时局应有之认识》尤为突出。他痛切地陈述：

五年来南京政府之盗窃国民党，培养汉奸，一味恐日而亲日，残杀爱国同胞，压迫抗日运动，致使我民族无一线正气，同为日人之奴隶牛马而任其宰割，千古惨痛，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 续范亭再告同胞书

“吾等革命为中华民族找出路，与日本军阀拼死命，所谓日本之外府南京政府者，早已认其有改组之必要，今日既未能改组，复变本加厉，为日寇作先锋，致将十年来准备抗日之人才、武器，倾注于西北爱国之身，此诚罕之宇宙而征诸世界未有之奇耻大辱。”“望我国人，用全副精神与能力，消弭此万古之奇耻大辱也。努力！努力！”

续范亭就是这样以一员特殊战将的身份，参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作为一位赤诚的爱国斗士，作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知己，他拖着羸弱的身体，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积极参与和全国抗

日浪潮的不断推动下,形势终于有了好转。2月4日,杨虎城在西安领衔发表和平宣言;2月10日,中共发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正式提出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统战电文;2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首次公布了共产党的通电内容。同时,宋庆龄、冯玉祥等也提出联共抗日议案,杨虎城、于学忠等重申了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这对亲日派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就在这次全会的决议中,也第一次出现了“和平统一”和对日“抗战”的条文。后经两党多次谈判协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实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 周恩来委以重任 毛泽东撰联凭吊

在“西安事变”的后期,周恩来主动约见续范亭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富有成果的交谈。“西安事变”成为续范亭一生中的分水岭,他首次接触中共领导,并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以一个新的革命战士的身份,踏上抗日救国的征程。

周恩来会见续范亭,大约是1937年3月下旬。陪同会见周恩来的是续范亭多年老朋友南汉宸先生。周恩来对他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全国和山西的形势,认为经过“西安事变”,阎锡山为了防止蒋介石的渗透,利用红军势力抵御日本进犯,确保在山西的利益,缓和与群众的对立,与共产党暂时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此情况下,周恩来提请续范亭以杨虎城代表身份入晋,与其多年的宿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进而推动和发展山西的抗日形势。

经过周恩来的耐心诚恳的劝导,续范亭接受了返晋主张。这次会见,周恩来那超人的智慧,敏捷的洞察力,严密的哲理,坦城、豁达的举止仪态,扣人心弦的谈吐,给续范亭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坚定了他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决心。

1937年2月下旬,续范亭以杨虎城代表身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山西。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续范亭任第二战区阎锡山的高参,亲陪阎锡山到太和岭、平型关等地督战;9月,他又陪同前来山西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南汉宸等,参加了与阎锡山、傅作义、刘峙、徐永昌等一系列高级谈判;不久,在周恩来建议下,续范亭出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40年初,与八路军在晋西北的领导人罗贵波、彭绍辉等一起,挫败了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建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晋绥边区,被拥戴为行署主任;此前还担任过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他在建设、巩固和发展边区的斗争中,在抗日反顽和清除内奸的斗争中,均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延安养病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身卧病榻,仍然战斗不息。曾写出被毛主席称作“奇文”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忠告国民党当局及其策划者》、《三年不言之言》等许多战斗檄文。他还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特有的身份和影响,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为巩固和发展革命大好形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1947年9月12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大举反攻时,续范亭将军在山西临县都督村与世长辞。毛泽东亲书挽联: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遂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责任编辑 方 隍)



# 由『沈崇事件』引发的一场爱国斗争

50年前,1946年12月24日,寒风凛烈的圣诞节前夕,被蒋介石引狼入室的驻华美军,在古城北平又犯下了他们累累暴行中又一件令人发指的罪行——美军海军陆战队队长威廉士·皮尔逊伙同他的同伙下士普利查德,在当时位于东单的练兵场小树林中,强奸了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在历史上,这一暴行被称为“沈崇事件”。

“沈崇事件”发生后,北平的亚光通讯社25日率先作了报道,随后,《新民报》、《北平日报》、《世界日报》等多家报纸,突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威胁和严密封锁,相继刊载此消息予以揭露。

沈崇被辱的消息,极大地震怒了北平市民。抗日战争爆发后,撤退到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各高等学校师生刚刚复员回到北平,就遇到这样一件令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更是义愤填膺。在“沈崇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就举行了有北平14所大、中学校的万名学生参加的“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并波及到全国,从而掀起了日本投降以后国内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美蒋各为私利,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由此被蒋介石引进的近十万驻华美军,在中国大陆上横行肆虐,各类骚扰事件层出不穷,人民怨声载道,“沈崇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正如当时清华大学,在《告全国同学书》中所说:“这是对中国学生界最大的侮辱,这是对同学安全最大的威胁,也是对一个独立国家最大的讽刺。”

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旋即沦陷,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即相继撤退到云南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三校分别从昆明复员北上,各回原校,其中联大工学院原主要系清华大学工学院的老底子,故除化工系外,皆回清华大学。

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都建有较健全的地下党组织,但在学校复员回北平时,因当时斗争形势和各种原因,有的院系党的组织关系一时没有及时转妥。原联大工学院的党支部在昆明时,受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工学院的同学经过昆明“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的锻炼,学生党

● 方 复  
杨 立  
胡 东 明

悟都有一定的提高，对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都有较深刻的认识，一股强烈的爱国之心更加深深地激励着他们。

联大工学院从昆明复员时，中共云南工委委员刘清曾约工学院党支部书记方复谈话。他说，“你们复校后，党组织关系一时可能还无法转过去。在新的环境中，党支部要全力掌握好学生自治会这个重要的合法阵地。谁要掌握了学生自治会，也就掌握了本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权”。所以，联大工学院支部复员回清华后，一开始便以主要精力建立清华的学生自治会。工学院党支部团结全校同学，全身心地为他们服务，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在选举学生自治会领导班子时，方复与杨立都以最多票数当选为常务理事，从而直接参与并掌握了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为日后组织这场抗暴运动奠定了基础。

## 风暴骤起

12月26日傍晚，发生“沈崇事件”的消息传入清华园，开始是在学生大饭厅的门口，有人贴出了刊登这条消息的报纸剪报，剪报旁边还张贴了一张用鲜红颜色书写的大字报：“这就是我们的盟友！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爸爸！”剪报和大字报震动了清华同学，一夜之间，学生自治会的墙报栏上就贴满了愤怒抗议美军暴行的大字报。当晚，清华社会学学会主办的一个学术报告会正在举行，消息传来时，报告大厅内顿时哗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自治会要拿出对策，并当场写了一份“要求书”，由参加会的同学签名，准备正式交给自治会。随后“要求书”传到各宿舍，又有不少同学在上面签名，到第二天中午，签名人数已达一千多人。

当晚，工学院党支部立即紧急分别召开碰头会，对这一突然降临的风暴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清华同学决不能坐视，决定一面接受广大同学的要求，马上召开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紧急磋商抗议办法；一面派出大批联络员，分赴校外了解社会各方和兄弟院校对“沈崇事件”的反应，以便作出决策。

当时最严峻的事实，是还没有与上级党接

上组织关系，所幸的是工学院党组织已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能够通过自治会这一阵地“独立作战”。

会后，方复首先找到从中学时就同窗多年的好友齐锡玉，要他到国民党CC系的重要成员、时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兼社会局局长温崇信的家里，去探听情况。齐锡玉的父亲和温崇信是复旦大学的同事，彼此都是熟人。齐锡玉为此曾两次来到温家。温崇信对齐锡玉说，“女学生的事政府自会处理，有人借机煽动学生反政府，你不要上当。好在这样的人不多，闹一阵就会过去的。”温崇信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平市政府中一些人对学生抗暴行动的看法。

与此同时，派到各校的大批联络员，也收集到兄弟院校大量对“沈崇事件”的反应，他们和清华爱国同学一样，个个都义愤填膺，在这场斗争中，大多数院校的教授和学生都表示要和清华师生并肩战斗。

当然，从联络员带回的消息中也夹杂了一些不和谐的音调：“沈崇事件”发生后的次日（即25日），亚光通讯社率先发出揭露真相的消息后，北平市警察局长汤永威先是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一律不得刊登，接着又亲自出马，把亚光通讯社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的记者找到警察局，威迫他们具结不得再刊载有关消息。但是有良心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们，并未屈服于淫威，不仅26日《新民报》、《北平日报》、《世界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刊登了亚光通讯社的消息，而且《新民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还把中央社要各报不准刊登的通知，也作为新闻予以公布。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指示，指责学生的抗议活动是“损污友邦”，命令学生不得有“越轨行为”；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召集北平各大学校长开会，要他们劝阻学生，“避免事态扩大”，另有一些人则更加无耻，如北大训导长、国民党CC分子陈雪屏就暗地里支使人取走北大先修班学生名单，将沈崇的名字偷偷抹掉，然后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何必如此大闹”。中央社也紧接着说沈崇“尚无显著被奸污之迹象”。一些特务分子更是等而下之地造谣说，

“沈崇事件”是延安的“苦肉计”，是“派来的女八路军引诱美军成奸，以便制造事端”云云。

北大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及耿仁荫等8位女同学，机智地探听到沈崇的住处，专程前往慰问受害者和她的家人。沈崇的表姐杨太太向来访者介绍了沈崇的家世：沈崇出身名门，她的祖父沈葆楨是清末一品大臣，曾任两江总督。父亲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高级官员。这年的二月份沈崇从上海来京求学，借住在表姐家，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外出。24日这天，她抽暇外出想看场电影，不料遭此强暴。沈崇的母亲和陈雪屏之妻均属著名学者林琴南家族的人，有亲戚关系，谁知“沈崇事件”发生后，作为长辈的陈雪屏不仅不对美军暴行表示义愤，甚至不念亲戚之谊，竟信口雌黄诬陷一弱女子，陈雪屏的无耻行径激起北大学子的愤怒，次年发生“倒陈运动”，终将陈雪屏赶出北大。

清华学生自治会从社会各方面收集到大量信息，大致已掌握到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经过工学院党支部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认为当时的北平形势对学生开展抗暴活动是有利的。首先是北平各界对美军肆无忌惮的暴行都极为愤慨，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很高，对学生举行抗暴活动都寄予很大同情和支持。北平各大学院校虽然不少同学都是从大后方刚刚复员回来的，但强烈的爱国心使他们在对待这一重大事件的态度上一致对敌，团结抗暴。党支部还分析，在“沈崇事件”中，我们是受害的一方，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而驻华美军是决不可逃脱的被告，至于百般袒护美军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民众心目中也早已被置之于被告地位，这对学生开展抗暴活动极为有利。再者，当时北京当局由于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对学生的抗暴活动还没有发现他们要采取镇压的手段。因此，支部认为应该支持广大爱国学生的正义要求，抓住有利时机，开展罢课等抗暴活动，对驻华美军提出强烈抗议，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

## 罢课 前进一步

通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增强了团结广大

同学进一步开展抗暴行动的信心。28日傍晚，清华学生自治会就紧急行动起来，一面组织赶写《告北平市民书》、《告全国同学书》和《罢课宣言》等十项宣传文件；一面在东大饭厅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大会决议自12月30日起开始罢课，并授权主席团，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游行与否。代表大会后，校内不少教授和教职员听到学生可能要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活动，都纷纷找到学生自治会，表示他们的赞许与支持。

正当清华学生热烈讨论之时，29日晚，北京大学的同学在北楼礼堂也召集各系及全校各社团代表大会，讨论要进一步采取的抗暴行动。可是，就在代表大会开会不久，突然几辆吉普车和大卡车闯进北大校园，车上一百多名持枪带棍的暴徒冲向会场，撕毁壁报，大搞打砸抢，并威胁北大学生不准上街游行，否则将用机枪对付。暴徒们的野蛮行径，激起北大同学的愤怒。这伙人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派来的特务，企图破坏学生的爱国行动。

这帮特务在北大的破坏行动，当日晚间就传到了清华，罢课委员会主席团立即在西小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商议支援北大同学的紧急对策。北大的一位代表在会上还介绍了特务分子大搞打砸抢的情况，更加激起清华同学的义愤。大家认为，基于北平当时总的形势和民心，应该尽快进一步开展抗暴活动，打击驻华美军的嚣张气焰和那些助纣为虐的反动势力。为了激扬中华民族之正气，会上决议30日就联合各校举行抗暴示威大游行。

会后，清华派往各校的联络员连夜奔赴各校，传递这振奋人心的消息。

## 学生们怒吼了 抗暴游行震撼北平

1946年12月30日，北平的气温降到零下15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凛烈逼人，但义愤填膺、斗志昂扬的清华大学二千多名学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凌晨就在大操场集合，等待出征了。

30日的游行，是我国八年浴血抗战胜利后，北平第一次由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大游行。为了慎重起见，学生自治会作了周密安排，挑选了近百名身强力壮的同学组成纠察队，沿途担



北平学生抗暴大游行。照片内偏左正与推  
车人交谈者即为此次游  
行总指挥之一，本文作  
者方复

任警戒。学生膳食团还为同学们准备了干粮。

8时整，游行大队启程了。此时，燕京大学贝公楼大礼堂前的广场上，燕京的同学们也早已排队待发。约9时许，清华游行大队到达燕京，然后两校会师出发。临出发时，燕京同学发现游行大队中仅有两校各自的门旗，燕京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沈立人、袁淳增立即找来几条白床单，拼成一面大横幅，上书“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几个大字，作为游行大队的总门旗，这面总门旗在游行时一直高举在联合大队的最前列。

两校队伍顺利地进入西直门后，沿途高呼口号，贴标语，散发传单。大批市民拥挤在路旁观看、欢呼，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争先恐后地索要传单观看。大队经过新街口、护国寺到达辅仁大学门前时，高呼欢迎辅仁同学参加游行。约有四百余名同学冲破阻力，汇入游行大队之中。大队从辅仁大学进地安门，经景山东街、沙滩直达北京大学时，先期到达的各校领队已聚集在北大操场上。北大医学院的同学还随身抬来了担架，声称“为了维护自由和主权，我们准备交付自己的生命”。

到各校队伍集合齐整时，已是下午1时多了。各校领队立即协商游行统一计划，并推选出联合示威游行的临时指挥小组，小组成员共8人：北京大学的庞邦镛、胡邦定、聂运华；清华大学的方复、杨立；燕京大学的殷书训、沈立义、包儒。

下午一时半，“北平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

正式开始，总门旗作为先导，各校队伍依次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铁道学院、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华北文法学院、中国大学、师大女附中、女一中、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北京大学殿后。游行大队出发后，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也冲破该校反动分子的阻拦甚至殴打，集合了数百名同学，汇入了各校的联合大队。值得一提的是北洋大学的北平部，在28日该校学生自治会讨论抗暴示威时，遭反动分子捣乱破坏，未能赶上30日的联合大游行。但该校进步同学决定第二天一定要补上这一课，单独游行。31日，数百名同学冲破反动分子的百般阻挠，单独经西四、西单、天安门、东交民巷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东交民巷美领事馆门前宣读了抗议书，显示了中国爱国青年不屈的精神。

各校联合游行大队自北京大学操场出发后，经东皇城根、东华门大街，向南转至王府井。在游行大队经过的地方，街道两旁站满了市民，他们向学生鼓掌欢迎，有的还随着学生呼喊口号，表示了他们对学生的正义行动予以极大的支持。联合大队行进至王府井时，恰逢一辆载有30余名国民党军人的大卡车，这辆车随着游行大队向南缓行，当同学们高呼“抗议美军暴行”、“严惩肇事美军”、“美军撤出中国”等口号时，突然间，车上的军人也跟着学生一起高呼这些口号，直到他们驶到帅府园东口继续南行时才离开。

游行大队向东进入帅府园，直奔军调部美



军驻地的协和医院西门。军调部的铁门紧闭，美军当局禁止美官兵这一天外出，但是，他们中有的人又好奇地从门后惊恐地看着呼喊口号的中国学生长龙，有几个美国记者在人行道上忙着摄像和记录，也有的记者爬在医院的围墙上向外摄影。当游行大队走到这里的时候，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掀起了高潮。后来，一家报纸在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当即相继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Get Away From China!’ ‘We Don’t Want You!’ 许多同学激动地热泪满面，在地上拾起石子，拼命向里面抛过去，铁门早已关紧，他们颤抖了！”

游行大队到达东单练兵场时，已是下午三时多了。在沈崇同学受辱的地方，联合大队召开了控诉大会。北大一位女同学含着泪高声朗诵诗篇《给受难者》，在场的同学都被这沉重的气氛激动着，再度愤慨地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民主新中国万岁！”

在举行控诉大会时，游行指挥小组决定派清华的李忠立（李抗）与燕京的马建行两位同学为代表，到位于新华门的国民党北平行辕请愿，向他们提出严惩肇事美军及美军退出中国等要求，递交了请愿书。

控诉大会结束后，大队按原定计划向天安门、西单行进时，刚过南河沿不久，从东单方向突然呼啸而来约 200 名暴徒，他们打着“中国大学”的旗帜，企图破坏游行队伍。有的同学当即认出这伙人原来就是 29 日晚打砸北大的那些人。很快，清华及各校近百人的纠察队骑车赶来，经过一番斗争，终于把这伙人赶走了。这时，天已近傍晚，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的情况，保证同学们的安全，抗暴游行指挥小组决定结束游行，分批解散回校。

这次大游行以完全的胜利而结束，光荣归于北平广大爱国学生的精诚团结！

### 怒潮在延伸

抗暴游行的胜利不仅震撼了沉寂近十年的北平古城，也打破了笼罩在国民党统治区沉闷的政治空气。怒潮的波涛从北平开始，波及全国，甚至海外，不断地在延伸。

——在上海，1946 年 12 月 31 日，交通大学等 17 所院校成立了“上海学生抗暴联合会”，紧接着 1947 年的 1 月 1 日，有 21 支游行队伍在全市大游行。

——在天津，1947 年 1 月 1 日，有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女师学院、水产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在全市大游行，并到市府请愿。1 月 3 日，又有 11 所学校继续在市内游行。

——1 月 2 日，南京市有原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六所院校举行抗暴大游行，3 日，又有五六千同学上街游行示威。

——杭州在抗暴运动发起后，由浙江大学等八所院校数千人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随后又举行了罢课抗议，大批学生上街宣传，要求把美驻华军队赶出中国去。

……………

抗暴怒潮遍及全国几十个大城市乃至海外华侨。北起齐齐哈尔，南至香港、九龙，东至台湾，西至成都，抗议、罢课、游行的抗暴活动不断爆发，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从而推动了八年浴血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出现的以维护国家独立尊严、要求民主和平的爱国主义高潮。正如“新加坡各界侨胞促进民主联合会”主席陈嘉庚在通电中所说，学生的抗暴行动是“大义凛然，国格人格赖以不坠。”

在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并波及全国之后，迫于中国人民强烈抗议，1947 年 1 月 17 日，美国军事法庭不得不公开审理强奸主犯皮尔逊和帮凶普利查德，同年 3 月 3 日，公开宣判对主犯以降为普通士兵、监禁 15 年的判刑决定。尽管后来美国政府按照其一贯的强盗逻辑，撤销了对皮尔逊的判刑决定，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正义斗争，已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不可一世的气焰。北平和全国爱国学生发起的这场抗暴斗争，也将永远载入我国爱国学生运动的光荣史册。

（按：三位作者系当年中共西南联大工学院支部的主要成员，也是这次北平学生抗暴斗争中清华大学队伍的部分领导者。）

（责任编辑 方 徨）

# 刘善本驾机起义始末

● 温济泽

## 一

1946年6月26日，延安，发生一件爆炸性的新闻。

这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正在清凉山上新华社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听到天空有“轰隆轰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由弱而强，直到震耳欲聋。

好些人都跑到半山腰，向东边不远的飞机场了望，有一架巨型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上，人群在围观。

前去采访的记者回来说，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三十五中队机长刘善本上尉，驾驶美国制造的最新型的B24式530号轰炸机起义，飞到延安。

刘善本到延安的第二天，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第四天，29日，延安又举行隆重的欢迎晚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亲自莅临。朱总司令致欢迎词，

指出这“标志着全国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反对内战”，“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运动的高涨”。

我原是《解放日报》副刊主编，6月初刚调任新华社语言(口头)广播部(也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刘善本起义是广播的重大新闻，电台编辑部随即派人去采访，我自己也去看望过他。刘善本和我多次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 二

刘善本，1915年生，山东安邱(今昌乐)人。

1935年，在北平一个中学高中班毕业。时值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略华北，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何(何应钦)梅(梅津美治郎)协定，国民党政府答应中央军撤出平津与河北。刘善本激于

爱国义愤，抱着“航空救国”的想法，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随空军先后在成都、兰州等地服务。1943年，被派往美国道格拉斯高级航空学校和新墨西哥州B24飞行训练学校受训。1945年5月，接收了B24式轰炸机离开美国。但奉命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住了几个月，到日本宣布投降后，才接到命令“火速回国”。

刘善本驾驶B24式轰炸机驻进上海大场机场。他看到许多好的建筑被美军霸占，美军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美国兵在大街上横行霸道，欺压我国同胞，侮辱我国妇女。他感到不能理解：这算什么胜利？

他同时看到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忙着为国民党运军队，美国还从太平洋地区把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来，移交给国民党。他感到又要

打内战了，心里很不安。

一天，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召集空军军官“训话”。他说：“我们已经有40个美机械化师，美国又给了我们几百架作战飞机，三个月之内把共产党消灭，这是有把握的。”

刘善本听了，这才明白：把我们留在卡拉奇，不让回中国打日本，这是为了保存实力；日本投降后，命令火速回国，是为了“消灭共产党”。

### 三

刘善本在高中毕业的那一年，从一本杂志上读到美国记者斯诺写的一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毛泽东的谈话，对中日双方力量作了具体的分析，对抗日战争表示了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0年过去了。他从美国回到上海，看到中国人民刚把野蛮的日本侵略者赶走，国民党当局又疯狂地准备发动内战，心中的愤懑、焦躁和苦闷难以言状。

一天，他在书摊上发现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这个名字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翻开头一个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更引起很大的兴趣，就买了一本回去。他一开始看，就全神贯注，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了。书中精辟的论述，好像一阵大风吹散遮住他的视线的乌云，

顿有豁然开朗之感。

他又回想到在卡拉奇时，看到当地报纸上登过朱总司令限令敌伪军投降的命令和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等来自延安的新闻，心想延安一定有广播电台。于是产生了急切地收听延安广播的愿望。他买了一部看来很不错的收音机，但是找来找去，硬是找不着延安广播。

有一回，他看到空中服务员小王正在调试一部自己装的没有外壳的收音机。小王向他夸这部收音机多么多么好。他就趁机问小王：“那么好，你能收到延安广播电台吗？”晚饭后，小王急忙兴冲冲地跑来说：“延安广播电台找到了！快来听！”他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快步跑过去。果然听到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这次听到的是高树勋将军起义和马法五被俘的报道。

这时是1945年11月初。报道说，9月中旬以来，国民党军调集10万部队向豫北冀南解放区进犯，连陷我豫北7个县城和大片乡镇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抢掠，人民惨遭荼毒。直到此时，我冀南军民被迫起而自卫。10月25日，将进攻各部加以包围。10月30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深明大义，率领所属的新八军全体官兵举行起义，站到中国人民方面来。但其余部队仍坚持向解放区进犯，经一昼夜激战，仅少数逃去，多

数在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率领下放下武器。

刘善本听了，十分重视和兴奋。他很快在自己办公室里装了一个13个电子管的军用收音机，听起来更加清晰。从此，他就经常独自地秘密收听延安广播。

他接连多次听到马法五等在解放区生活受优待的连续报道。1946年2月底，他听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各界欢送马法五等5位将军返部的消息。当时，人民解放军对待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的政策是：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刘荫森等5人表示愿意回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边区政府就举行晚会，欢送他们返回国民党统治区。

延安的广播，特别是高树勋将军起义，马法五将军遣返，并表示要为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斗的消息，深深触动了刘善本的心弦。

### 四

刘善本有了驾机起义的想法。

他知道这条路上埋伏着很大的危险，必须绝对保密，连对自己的妻儿老小都一直没有透露。

同时他要做周密的准备。

他要找到延安广播电台能够用来导航的波段，找有关导航的资料，找西北的详细地图，多带几支手枪和照相机，还要买些到解放区后必用的东西。

他继续秘密收听延安的广播。蒋介石在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之后，美国军舰、飞机已经把几十万蒋军和大批军火运到内战前线，全面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6月16日的晚上，他又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一篇《延安权威人士声明》，内容是抨击美国国务卿贝纳斯刚提出的援蒋法案，声明表示：“中国的反动派如果依靠外国援助坚持内战与独裁，……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主席变为向外国称臣的儿皇帝，那末，可以断言，中国人民必将抵抗至最后一滴血。”他听到这里，就最后下定了驾机起义的决心。

就在这个时候，刘善本接到命令，限八大队在6月23日以前，将昆明的无线器材全部空运成都。这次共起飞7架B24式轰炸机。刘善本眼看时机到了。

可是他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充分做好。他借天气不好，一再把起飞日期推迟。他忙着隐匿起在八大队做机械兵的弟弟，还清了欠人的债务。

连副驾驶员在内，有10个人要与他同机飞行。他们各自都忙着买货做生意，对刘

善本一再拖延起飞日期，不但没有催促，还说他“真够朋友”。

飞机起飞时，7架飞机各飞各的，并没有编队。刘善本驾驶的飞机到了昆明，装上几千磅重的无线电器材，第3天就飞到成都。天气预报说，西北是块雨区，天气恶劣，刘善本只好在成都新津机场降落，等待时机。后来天气转好，他在由成都返昆明的途中，下定决心，毅然调转机头，飞向延安。

飞机到了延安飞机场，刘善本迅速跳下飞机，跑到一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面前，紧紧地握住那位战士的手，急急忙忙地说：“我是国民党空军驾驶员，飞到延安是反对内战来的！”说着交出4支手枪。

这时，后舱窗口有人伸出头来问：“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刘善本兴奋地拉长了声音回答：

“延安到了！”

问的人怀疑地说：

“怎么飞了这么半天才到雅安？”

这就是本文头一段所说的背景。

我多次同刘善本谈话。有一次他问我：

“在我起义前几天，从广播里听到的那个《延安权威人士声明》，是毛主席的声明吗？”

我说：“是的。这篇稿子是毛主席秘书胡乔木同志起草的，经过毛主席修改。这篇稿子的最后一段，完全是毛主席重写加上的。”

后来这个声明也在6月17日《解放日报》头条发表了。我带了一份这天的《解放日报》给刘善本看，他抢着就念起来，到最后一段，他大声念道：

“延安权威方面表示：中国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国人民神圣权利所在，任何人不能予以干涉与剥夺，中国的反动派如果依靠外国援助坚持内战与独裁，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公开直接变为秦桧、张邦昌、刘豫政府，将现在的国民党主席变为向外国称臣的儿皇帝，那末，可以断言，中国人民必将抵抗至最后一滴血。”

他说：“我就是听了这篇广播，为反对蒋介石当‘儿皇帝’到延安来的，为‘准备抵抗至最后一滴血’起义的。这个权威人士声明使我最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 五

刘善本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播音员，怀有深厚的情感。我们邀请他同播音员见面，他含着热泪同她们握手。又请他参观窑洞里的播音室和简陋不堪的机房，他惊讶地说：“想不到你们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却做出了了不起

的大事！”

7月初，我们请他到播音室向全国同胞和他的空军朋友作广播讲话，题目是《赶快退出内战漩涡》。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刘善本每次都是到播音室对着话筒播讲，播讲了好几次。7月9日《解放日报》第4版发表了上的讲话全文。

刘善本播讲道：

我为什么要到延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深深感到残杀自己的同胞，不是我们爱国男儿应该做的事。我下定决心要退出内战。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只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参加空军，原是为了打日本的，现在在抗战以后，却叫我驾驶飞机，去轰炸中国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同胞，这完全违反我的良心。

他揭露美国的政策说：

如果不靠美国帮助的话，政府是没有办法进行内战的。现在国民党当局为了要进行内战，维持独裁，不惜把任何丧权辱国的事情都做出来了，甚至于要求美国驻军直接和间接帮助国民党来进行内战，这跟北洋军阀和日本缔结的二十一条又有什么差异呢？最近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报告说，帮助中国政府运输军队解除日军武装，仅仅空运就费去三万万美元。他们运输中国军队到东北，名义上是“帮助解除日军武装”，实际上是进攻东北的民主联军。

他又对比说：

解放区和国民党管辖地区，实在是两个世界，在国民党管辖地区里，湖南一省已经饿死了三百二十多万人，还有几百万人也快饿死了。去年冬天，在上海市，一个星期，据《时事新闻》报载，就冻死五百多。……我飞来延安，看到边区，不但没有饿死人的事，连一个乞丐也没有。这里的人民都安居乐业。

最后他向空军朋友说：

希望大家赶快退出内战漩涡，为和平民主共同奋斗，一旦和平民主实现，我们就能更好地为国效劳，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光明的乐园。

国民党空军里有不少人听到了这个广播。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国民党空军人员陆续乘车或徒步投奔到解放区来的就有二三十人。

## 六

刘善本起义后，任延安人民解放军总部航空教员，不久去了东北。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和刘善本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我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一天，突然接到刘善本的电话，他到北京来了，我立即到他的住处看望他。知道他离开延安后，担任过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等职务。他已在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谈起他过去抗日有志，

报国无门，十分感慨。谈到现在，他说今后可以为新中国空军的创建大有可为了。我们都为新中国的美好前途而欢欣鼓舞。

遗憾的是，以后长时期我们未能再见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动乱，我曾担心刘善本的安危，但又想，像他这样一个爱国志士成为共产党员的好人，党和人民都会信任他的。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我费了不少周折，才打听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8年3月，刘善本已经不幸被迫害致死。

刘善本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前夜驾机起义，是立下大功的，对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和成长有过宝贵的卓越的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志愿军航空兵师长率部参战，组织过人民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就是这样一个为人民解放事业立过大功的人，竟然未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厄运而死于非命。这怎么向后世交代呢？这又怎么向历史说明呢？……

今年是刘善本驾机起义50周年，我将我之所知记述于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

（责任编辑 方实）

# 胡耀邦

## 最后一次故乡行

● 杨第甫

1989年1月，耀邦同志下榻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内的九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

耀邦同志很念旧，邀我和袁学之、穰明德同志到他住的6号楼谈谈。袁学之和穰明德二老，是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但不巧，这一天他们两人都去了外省。我只能作为代表去看耀邦同志了。

向来以健谈著称的耀邦同志，同我天南海北谈起来。当谈到去过全国哪些地方时，耀邦同志说：“我在1984年到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区考察，踏遍了大西北的山山水水，访问了各方面的人士，看望了边防哨所的战士，这次考察，四个省仅仅10个县没有去过。”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多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进行认真分析，才能把工作做好。”

接着，耀邦同志问我：“你到过些什么地方？”我说：“我跑了不少地方，最使我惊奇难

忘的是长白山天池。1945年，我由延安去东北，第一任工作就是在安图县，但我没有去过长白山天池，到了1984年，吉林省召开党史座谈会，才旧地重游有机会去看了看。我问耀邦同志去过没有，耀邦同志说没有去过，只是到过新疆的天山天池。我说：“天山天池我也去过，比长白山天池差远了。长白山天池海拔2155米，池面宽，池水深，池岸为高山陡壁，环池为林海雪峰，飞流瀑布三千尺，壮观极了。从安图县二道白河一进入森林中开辟的公路，车行几十公里，路旁松涛习习。登上白云峰俯瞰天池，远眺林海，脚踩矮松如沙发。在那里游览，空气清新凉爽，娱目骋怀，舒服极了。最好今年夏天你也到长白山天池看看。”他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突然，他问我：“你到过黑龙江省，去了大兴安岭吗？”我说：“没有去过。”他说：“我去过，大兴安岭美极了，观看原始森林，使人胸襟广阔。”过了一会儿，我又

问耀邦同志，“你到过内蒙古灰腾格勒吗？”他摇了摇头。我说，“灰腾格勒是成吉思汗的练兵场。那里有99个海子，120平方里的牧场，现在还展览出成吉思汗的指挥车。指挥车要用16头牛拉着走，车上有成吉思汗的豪华漂亮的蒙古包。”

谈着谈着，一个半钟头过去了，我起身告辞说，“你是来休养的，我不打扰你了。”耀邦同志说：“还早嘛，再坐一坐，我们不是谈得很好吗？喝点茶。”他还亲自剥了一个柑子给我吃，并说：“你去过内蒙古，看了不少地方。我也去过，那里有一个可以露天开采的大煤矿，叫乌海，我去看了，煤层几十公尺厚，是我们国家一个宝库。我们本想下决心开发出来，但限于经济条件，那里交通又不方便，至今还未开发。”耀邦同志绘声绘色地比划着，把我也带到那富饶美丽的地方去了。我说：“你是为国为民，深入各地考察，我是游山玩水，看看世面，我们



的出发点不同,看到的地方也就不一样了。”耀邦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

过了几天,袁学之同志从山西开会回来了,我又和他一道去看耀邦同志。在客厅里,我们谈得非常广泛、畅快,谈了延安的整风和“抢救运动”;谈了“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情。耀邦故旧情深,问起了一些健在的老同志的生活,更关心去世老同志身后的一些情况。

袁学之在谈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时说:“我深深感激你关心我的平反。十年浩劫开始,造反派突然把我这个省委委员、省总工会主席揪出来,作‘叛徒’批斗,关进牛棚,下放劳动改造。我向有关部门申诉多年,毫无结果。直到1978年,得知你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我当即写了一首打油诗寄给你,现在我还记得:‘江西被俘未叛变,关在九

江集中营。难友之中找同志,联络吴实谭光廷。打入白军发展党,陕西兵暴投红军。党员还有刘德夫,甘肃军区副司令。接收兵暴王首道,广东省委负责任。回到延安进抗大,两年工作你知情。请求落实我政策,否则上告上北京。’这首打油诗寄去不久,我的党籍就宣布恢复了,后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告诉我:耀邦同志收到你的信后,立即将你的档案材料调去了,开会研究之后,决定平反。接着,我又把同样被批斗达十年之久的宋新怀的所谓‘叛徒’材料寄去,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耀邦同志听后谦虚地说:“对你和宋新怀这些问题,我最了解,我有责任为你们澄清,是我应做的事。”接着,我也就这个问题说开了。我说:“1982年,湖南大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省政协写的调查报告由于得到你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湖

南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也推动了全国。当时湖南大学的教授石任球、彭肇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反映湖南大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影响了全国各大学,有些教授写信鼓励和慰问他们,说是替他们说出了要说的话。石、彭两教授接到各地大学教授的信数以百计。”耀邦同志说:“我们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几十年来,在‘左’的路线干扰下,知识分子受迫害,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平反,使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学识和才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时,耀邦同志说:“知识分子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好提意见,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机构。他们提出的意见对,就听取;不完善的,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正确的就不听。还可以



耀邦同志参观  
岳麓书院,题“尊  
重知识”4字  
(1989年1月  
于长沙)

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辩论进行说服，为什么要压服呢？”我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我国流传的一句俗语，有了三年时间，总可以把事实弄清楚，妥善解决问题。”耀邦同志说：“也不能这么讲，我们不要匆忙处理问题，是指要冷静，不要急躁，怕忙中有错。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光明磊落，敢于面对事实，勇于承担责任，是则是，非则非。如果真是我们错了，就认错，就改正。封建时代的帝王，还可以下罪己诏。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严于律己呢？孟夫子不是讲过吗？以德服人者，衷心悦而诚服也。对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就是要用说服教育的疏导办法，这样做，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缓解了。”接着，他在谈到落实政策的困难时说：“落实党的政策任务大，而且阻力也大，领导人必须下大力气才能抓好，没有务实和一抓到底的精神是不行的。”

在谈到国是的时候，他激动地站起来，又坐下去，过了好一会，才平静地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我说：“还有法治。”他说：“法治也重要，但没有民主谈不到法治，刑不上大夫，怎能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民主和科学，我们为之奋斗了70年，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谈到干部问题，耀邦同志说：“干部一定要年轻化。我去西藏时，本想去作一次全面调查，深入下去，了解西藏的一些真实情况，研究民族政策。医生要我先休息两天，适应高原气候再工作。我一下飞机，感觉良好，就到处活动。由于年纪不饶人，加上高原地区的反应，就感到不舒服，我只住了几天，就被医生劝着回北京了，这说明干部年轻化多么重要啊！”

当我们问到他是否回浏阳老家看看。他说：“不去了，

我在岳阳已看到家乡的小孙子们。”袁学之说：“不回去也好，你‘六亲不认’，对有关部门为你亲侄儿安排工作的事，你知道后嘱咐立即停办，还说‘这个后门，我就是不准开。’我看，你回去，家里人不给你喝白水才怪。”耀邦笑着说：“你替他们打抱不平吗？”我们大家都笑了。

1995年共青城胡耀邦陵墓开放，我专程往谒，见鄱阳湖水绕一青山，有白色旗形石高数丈，上刻耀邦像，栩栩如生。陪同者说：“是北京工人站在长梯上刻的。”这天非节假日，但中外游人扶老携幼络绎不绝。睹景怀人，写了一阕《临江仙》：

水绿山青奇石白，依稀胜境蓬莱。良工刻石逼真哉。士民争仰止，海外友人来。

民主建邦常督促，关心科教安排。创新除旧展鸿才。盖棺应定论，公去万家哀。

（责任编辑 王 恂）



江西共青城  
胡耀邦同志墓  
（刘兵摄）

# 罗青被捕 与“七君子事件”

● 申春

1936年12月，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横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这起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是以罗青被捕开始的。因反动军警先从罗青身上搜出文件，牵涉到沈钧儒、章乃器等。这决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 呼号救国

现年96岁高龄的罗青，1901年生于江苏省江都县塘头乡罗家舍。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对“五四”运动的声援。192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5月间，他受石家庄正太铁路局长王懋功之邀，从上海到正太局当了王懋功的秘书。不久，他参加了铁路员工救国会的活动，并主编过《正太三日刊》，积极撰稿宣传抗日救国。

1933年1月上旬，日伪联合侵犯华北，宋哲元率部抵抗。其间，蒋介石从绥远经大同、太原到石门（即石家庄）停留了几小时，石门市市长周维新邀集商会、银行、学校、驻军等方面代表，在石门市一家戏院召开欢迎大会，首先请蒋介石“训话”，

蒋在会上极力鼓吹“安内才能攘外”的妥协投降滥调。罗青当时以《正太三日刊》主编身份参加了欢迎会，他听了蒋的“训话”后，连夜赶写一篇短评，并发表在《正太三日刊》上，短评主要内容是反映大敌当前，全国爱国青年请求蒋委员长立刻停止内战，领导全国人民一致对日作战，通篇是针对“先安内后攘外”的论调讲的。

王懋功作为正太铁路局局长、国民党改组派头面人物，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几天后他回到石家庄，突然把罗青叫到他的办公室，气势汹汹，拍案怒斥罗青胆大妄为，背着他闯了大祸，并责问罗青为什么敢于写文章嘲讽蒋委员长。罗青年轻气盛，据理直言道：“大敌当前，民族兴亡，匹夫有责。事关救国救民的大事，我为何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不怕丢脑袋，你可以把我交给陈立夫去处置。”王懋功气极之下，要动手打罗青，被一旁几个人拉开了。罗青本是应王懋功之邀到石家庄谋职的，没想到却因呼号抗日救国激怒国民党当局，又被王懋功免了职。

1936年2月，罗青从北京乘火车抵达南京，他决心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南京奔走呼号，联

络了邹趣涛、游仪声、郑律成等，创立了进步文艺团体“五月文艺社”，并通过《新京日报》《激流》副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宣传抗日救国。不久，南京爆发了一场以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路线的爱国学生运动，愤怒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包围了位于南京萨家湾的国民党外交部，国民党中央政府大为震惊。事后，南京街头到处传说国民党要下毒手，便衣特务手中的黑名单有6个人，其中就有罗青。一天晚间，罗青的好友余仲英来到罗青住所，对罗青说：“南京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必须立即离开。”本已有所警惕的罗青，联想到社会上的传闻，马上找到“五月文艺社”负责人邹趣涛连夜商讨对策，决定立即往镇江转移，准备在那里筹组成立江苏人民抗日救国会。

10月上旬，罗青为取得全国救国会的支持，从镇江来到上海，通过中共党员金奎光（朝鲜人）的引荐，先后与章乃器和沈钧儒晤面，罗青当面向章乃器汇报筹组江苏救国会的计划后，章当即表示完全支持，随手取出两份文件：《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复信》（油印件），信的主要内容是表明中



96岁高龄的罗青在他的寓所看报  
(申春摄)

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罗青在上海期间，曾多次拜访金奎光、杜君慧夫妇，夫妇俩均是中共党员和左联盟员，他们向罗青介绍了上海开展救国运动的情况，并给了罗青两份党内文件：《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罗青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他高兴得彻夜难眠，自己动手雕刻了“江苏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的图章。

## 江阴被擒

罗青于1936年10月21日离上海回到镇江后，他即刻与曹秉乾、杨公岩、陈斯白等好友晤面，交换上海之行的情况，他们商定把江苏各界救国会的筹备处设在镇江。为尽快筹集活动经费，罗青当天便乘火车赶到无锡，换乘汽车直奔江阴，准备过江后到靖江县找老朋友筹措经费，当时由于天色已晚，渡船停驶，他只好返回江阴饭店过夜。

晚七时许，几个国民党军警突然闯进饭店，直扑罗青的房间，“我们是从南京来的”，并说“你要抗日，请跟我们走一趟”。罗青方才明白，

这显然是国民党当局的预谋，原来他的行踪，早已被国民党便衣特务监控。军警当场从罗青身上搜出4份文件和1枚图章。当即将罗青押往孙元良所属的一个旅部看管，不几天，罗青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金鸾巷看守所。在几次对他的审讯中，他大义凛然地阐述自己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在民族被外侮的紧要关头，奋起救国何罪之有！当追问4份文件来源时，罗青为避免危及金奎光夫妇，只说4份文件全是章乃器给他的。罗认为，全国救国会是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团体，而且沈钧儒和章乃器都是社会名流，心想国民党对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罗青这想法毕竟也太天真了。几天后，他从法官审讯中得悉，救国会的7位领导人先后被捕。其实，国民党对“七君子”下手，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罗青身上搜出文件，只不过是这起事件的导火线。

## “七贤”同难

1936年11月，上海7家日商纱厂工人，因日商把工人不当人，任意打骂，无故开除，加上工人劳动时

间过长，每人每天平均只能领到3角钱的工资，由此而引发万余工人的罢工。其间，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会，在上海女青年会大操场，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大会，并发起募捐，声援和支持工人罢工，在救国会领导下成立了“支援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负责救济因罢工生活困难的工人。当时，日本国驻沪领事在日商纱厂资本家的压力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强烈抗议，声言如工人再罢工，日本陆战队将登陆镇压。国民党当局遂以此为由，再加上从罗青身上搜出的4份文件，认定“七君子”是这次工人罢工的总后台，以“支持工人罢工，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罪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将“七君子”逮捕入狱。

1936年11月22日深夜，邹韬奋在上海家中被法租界巡捕房警察逮捕，次日押往江苏高等法院。章乃器和史良，也因住法租界而同时被捕。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他们4人，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相继于11月24日夜间被捕。12月4日，将沈钧儒等移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却因证据不足，暂由律师保出在外，但她却自动



于11月30日到苏州投案入监。沈钧儒等6人关押在吴县横街看守所一处平房内，史良关押在女看守所，把罗青单独关在司前街看守所。这就是1936年11月发生的救国会“七君子”之狱。

罗青与“七君子”并案受审，国民党当局高等法院费尽心思，给罗青及“七君子”罗织了“十大罪状”。当时在上海许多有正义感的律师，为“七君子”的爱国行动鸣不平，纷纷提出愿义务做他们的辩护律师。围绕着救国无罪和“救国有罪”而展开的这场尖锐的斗争，持续达数月之久。

## 铁窗答辩

罗青度过了半年多的牢狱生活，他在狱中坦然自若。他深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等那封信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也有一种负疚感，即因自己的大意被捕而连累“七君子”同难。为表达他自己矢志爱国的心境，他在狱中写了一首感愤诗。诗曰：

匹夫有责负兴亡，战斗何辞锁铁窗。

御侮坚持宣统战，救亡奋起反内攘”。

狱兴“七子”怜同难，兵谏千夫赞有方。

未立寸功身系狱，徒惭博得姓名香。

这诗，既抒发了罗青当时忧时之感，又表达了他坚定的抗日决心。

他在被关押中，接到长达两万多字的冗长的“起诉书”后，怒不可遏，面对苍天长叹“罗青爱国，何罪之有”！他别无选择，准备面对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他针对国民党对“七君子”和他罗织的“十大罪状”，写出了近万言的答辩书。他写的答辩书，据事论理，以理服人，通篇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对日

妥协、对内实行高压的反动政策，显示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的胆识和博大胸怀。

罗青在答辩书中，首先论证了救国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之救国运动，而救国运动之高涨与组织化，则自民国二十四年发生之华北事件始”，“北平各学校首于12月6日通电全国，誓死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全国进行对敌抵抗”，“继而发生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大游行示威，提出立即停止任何内战的口号。北平发动后，天津兴起，全国响应，各地纷纷有救国团体之出现，全国各界救国会产生的背景原因全在此”。

罗青对当局起诉沈钧儒等所谓“募集款项，救济工人，煽动罢工罢课，图谋颠覆”等罪状，加以反驳，他答辩：“所援助救济的罢工工人，乃日商纱厂之工人也。敌人在我国内开设工厂，掠我原料，夺我市场，破坏我之工商业，剥削我之劳苦同胞，实为侵略中国之毒辣手段”，“援助此种含有民族性之罢工运动，实足以加强整个民族之团结力量与信念”。罗青用辛辣讥讽的笔调答道：“所谓图谋颠覆政府云云，恐有以所谓大日本帝国政府，代替本国政府之嫌矣！”

罗青对涉及他个人的“罪状”申辩道：“爱国救国，乃国民天职，何待他人之派遣”，他指出“组织江苏救国会，并非受沈钧儒、章乃器派遣，救国会并非危害民国之团体，本人既未加入，复无已遂组织江苏救国会之事实，所谓搜获身畔的救国会之印刷品，并非与三民主义不相容者，起诉书拟为危害民国之罪，显然失当”。

罗青在法庭开庭前赶写的答辩书，行文慷慨，据理陈述，通篇状词着眼于全局，始终围绕卖国有功，爱国罹狱展开，以便向国内外公布这起冤案的真相。他将这份答辩词交

朱公亮和谢居三两位律师看后，他们均感对当局鞭撻过多，而有所顾忌。罗青却坚持把自己多年积忿如骨鲠在喉的话，一吐为快，两位律师只好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并由律师将答辩书印成32开本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迫害爱国人士的可耻行径。一时间内，国内外舆论哗然，大江南北，举国上下，密切注视着这起冤案的结局。

## 怒斥群狐

1937年6月11日下午1时，罗青和救国会“七君子”并案在苏州高等法院公开审理。就连这个公开审理也是经过斗争才得到的。临开庭前，审判长竟然宣布不准许任何人出庭旁听。当时，聚集在法院门口的从上海、南京赶来的各界知名人士及被告家属，在门口受阻，不准进入法庭。被激怒的旁听者，当即提出强烈抗议。罗青和“七君子”知道后，慨然表示，如不公开审理，决不说话。法院当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让步，最后同意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参加旁听。

下午二时许，“七君子”和罗青、任崇高、顾留馨共10位被告，依次出庭受审（其中任、顾二人因代表上海群众要求当局释放“七君子”而被捕）。当轮到审讯罗青时，审判官竟然将罗青和上海救国会联系起来，妄图以此指控“七君子”扩大救国会组织的“罪行”。

罗青出庭后，神态自若。审判官问道：“你为什么要去看看章乃器？”

“因为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去见他，并和他交换意见。”

“你组织江苏各界救国会是谁的指使？”

“我乃自愿发起组织的，因民族危亡，迫在眉睫。”

审判官一看不妙，变换了审讯内容。

“你赞成全国救国会成立大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吗？”

“赞成。”罗青坚定地回答。

审判官最后问：“你赞成联合各党派吗？”

“当然赞成。这不但是救国会的事情，全国人民都是如此主张。”

审判官见罗青辞锋尖锐，没再多问，便就此结束。第一次开庭后，法官从罗青口中没有得到一点可供定罪的东西，准备把他先送往“反省院”，然后“保释”，以便集中突审“七君子”。罗青得知后，为挫败当局阴谋，决定同“七君子”一起斗争到底。

1937年6月25日，第二次开庭。罗青作为第八个被告出庭受审。这次审讯，罗青变换了斗争策略，他是国共合作时跨党加入国民党的身份出现的。当审讯他去镇江是为看望由罗青介绍参加国民党，现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的周某，以及取道江阴去靖江看望担任国民党县长苏民和公安局长薛秉阳时，罗青表明自己也是国民党中有资格的“党员”。当审讯他为何要组织救国会时，罗青强调说明自己看到国民党内的人腐化而不满，才投身于爱国运动，以达到“护党救国”之目的。他目睹当局如此对待自己的“党员”，岂不是“摧残党的生命吗”，这一连串既讲斗争策略，又辛辣有趣的答问，把审判官搞得狼狈不堪。国民党当局以为，只要罗青屈服招供，就可以加罪于“七君子”，没想到他在法庭几个回合的斗争中，使出了“出人意料”的一招，说明国民党当局奉行的妥协投降路线是如何不得人心。

就在审讯“七君子”和罗青之时，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七君子”的热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坚决要求释放沈钧儒等7人。以宋庆龄为首的著名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并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尽快释放“七

君子”。就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冯玉祥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专电给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出狱。这一切，终于迫使蒋介石没能对“七君子”下毒手。

## 无罪获释

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经过近半个月开庭审理，“七君子”案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法庭既不能判，又不能放人。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蒋介石在全国抗日声浪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发表讲话，无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要求，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的要求。

1937年7月31日下午，“七君子”和罗青等同时被释放出狱。这起围绕救国与卖国、内战与反内战、民主与法西斯的激烈斗争，终于以正义力量的胜利宣告结束。出狱后，罗青与“七君子”在古吴路看守所门前晤面，并合影留念。前来欢迎“七君子”的各界人士，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并燃放鞭炮。当晚，罗青应律师朱公亮和谢居三之邀，举行便宴慰劳。8月2日，罗青由上海赶到南京。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已经形成。但战争形势的发展，已使上海和南京处于紧张备战状态。罗青旋即奔走于上海、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38年开始，他历任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长等职。1940年，在太行涉县东辽城村，他与“难友”李公朴相逢，并赋诗为李公朴送行：

清漳河畔送君行，烽火弥天惜别情。

敌后史诗蒙绮梦，峨眉山月为君明。

（作者附记：本文已经罗青老先生审阅。谨致深切的谢意。）

（责任编辑 凌辰）

# 杜任之被阎锡山决意处死又获救经过

●马明





杜任之

我知道杜任之的名字，是1937年12月，我正在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三纵队八总队做连队政治工作。听说杜任之调到临汾不久，就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很快参与组建了统一战线性质的民族革命大学，聘请了李公朴、侯外庐等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授。这所培养抗战人才的学校，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许多青年学生。在日军侵占临汾时，又听说他带领民大学生行军，渡过黄河，有不少人到了延安。这是他第一次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 (一)

最难忘的是，1943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聆听了杜任之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讲话的题目是：《目前孝义地区的粮食问题》。当时，杜任之是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他是孝义地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民族革命同志会高级干部委员会候补高干的合法身份，被聘请为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讲话的。

在讲话之前，他为了掌握老百姓的真实缺粮情况，带领干部深入孝义县西关、南关附近农村，访问调查了十多户农家，目睹农家普遍吃

糠咽菜，小孩子因营养不良，个个骨瘦如柴。而另一方面，阎锡山军队当官的“吃空额粮”，存粮多得发霉，却又催索过头军粮。杜任之在极端愤慨的情况下，向“战训班”八十多名教职学员讲话，据实叙述了这些情况，为群众鸣不平，揭露阎军的营私舞弊。他说：“老百姓肚饿没粮吃，军队有存粮吃不了，有些军官高价倒卖军粮，却硬逼着还征粮，老百姓实在负担不了，这明明是在要他们的命啊！”讲到这里，他气愤难平，语调激昂，激起听众一阵阵热烈掌声。“战训班”教职学员多数是孝义人，深知家乡民情，一致认为讲话抓住要害，真实感人，便把“讲话”在《战训报》重要位置刊登。孝义区群众说，杜任之说出了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

但是，这次“讲话”，惹起了阎锡山上层高级军政人员的恼怒。第二战区视察处负责人薄毓相（反共起家的“同志会”高干，太原解放后被镇压），拿上刊登杜任之讲话的《战训报》，向当时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加油添醋，作了控告。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向阎锡山告密，说杜任之“征粮不力”、“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心”，还说杜任之不执行逮捕地下共产党员的“肃伪政策”。同时，驻太原日军也通过阎驻太原办事处人员，对杜任之在孝义推行“对日经济作战”，向阎锡山提出严重抗议。

阎锡山听了勃然大怒，决定把杜任之的撤职拿办，押解到他所在的吉县克难坡。并于1943年4月22日午夜，立即向驻孝义兑九峪的晋西南北区军总司令楚溪春发出密电：“杜任之讲话挑拨军民关系，企图瓦解军队，有叛变嫌疑，即派宪兵押解回部，注意防范，小心劫持和逃跑。”数分钟后又发一电报：“此事万勿含糊。”楚溪春接到密电后，立即调动骑兵部队，在兑九峪山头戒备。接着，阎锡山又向“战工会”发来电

报：“杜任之主任委员征粮不力，贻误军机，着即调部，‘战工会’主任委员由楚溪春兼任。”从先后发的电报内容上，不难看出阎锡山是玩弄了花招的。他发给“战工会”的电报，措词比较缓和，分明是怕孝义区的干部们反感而闹事；而那份充满杀机的密电，才是事情的本质。次日清晨，楚溪春召集“战工会”干部会，传达了阎锡山发来的电报，他宣布接任了主任委员。接着，他不得不派一个班的宪兵把杜任之逮捕。杜任之双手被捆绑高克九峪，引起当地人们的义愤。许多人说，杜任之是为老百姓说话被捕的。“战工会”的干部们相聚时都泣不成声，停止办公，绝食一天。

同年5月3日清晨，阎锡山又指使在孝义县的第三宪兵队队长齐步瀛，带领20名宪兵，把“战训班”副教育长张斌和指导员兼教育张铭扣捕，武装押送到克难坡宪兵司令部，说他俩同杜任之一案有牵连，要对《战训报》刊登杜任之关于粮食问题的“讲话”负责。

## (二)

阎锡山依据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甚至要处决杜任之，除了上述直接的原因以外，深层的根源和政治背景则是，阎锡山把杜任之视为他挽救其没落的统治地位和同日军、伪政权勾结妥协的绊脚石和障碍，同时，也暴露了他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内心虚弱和恐惧。

早于1940年11月，阎锡山就派曾任阎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的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村，依照阎所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条原则，与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参谋长楠山和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汉奸梁上椿会晤，进行了秘密谈判。1941年3月，阎又派赵承绶到白壁关村，和日军驻汾

阳县岩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确定“阎日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还议定“离(石)军(渡)公路以北之‘防御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西，由阎军负责”。赵承授提出要求日军从孝义城撤出，交阎方接管，作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以后，太原日酋岩松义雄以“东亚联盟共同防共”为借口，计划让苏体仁与阎锡山会见，并派梁上椿亲自到吉县克难坡劝诱阎锡山。1941年6月，阎日双方达成协议，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交给阎军接管。但是，日军撤出孝义却并不善罢甘休，而是变换手法，改用了经济渗透的方式，使用伪联币打击阎占区流行的法币，使法币贬值，一元伪联币可换20元法币。从此，孝义地区伪联币充斥市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阎锡山对此也恼火，想扭转这种局面，苦于找不到敢于抵挡日方的合适人选。

就在这时，同阎锡山关系特别密切的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提议，让杜任之担任孝义地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进行“对日经济作战”工作。阎锡山虽因杜任之把儿子杜力送到延安不回，对杜并不信任，但是在赵戴文积极推荐下，还是把杜任之勉强委派去了。

杜任之到任后，从有利于抗日出发，首先充实加强了“战工会”的领导机构，撤销了原孝义县县长吴鸿喜，新派出能够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丁皖生、卜尔康和李功宇分别担任了孝义县长、汾阳县县长和介休县主任特派员。接着运用阎锡山五首脑领导机关给予的代表职权，指挥全区(包括孝义、汾阳、平遥、介休四县)军政民机关、团体，联合起来认真进行“对日经济作战”。在和日军占领区联接的边界地带，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抵制日货进入，控制物资流出；严禁走私、贩毒和伪联币流通，打击了汉奸和奸商。对内提倡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厉行节约，



前排左二为平杰三，左三为谭一波，左四为王怀明，左五为杜任之

反对贪污浪费。由于孝义区的经济很快得到复苏，开始阎锡山也挺满意，批示发通报表扬。但是，孝义区的对日经济作战，不仅打击了日军，也堵住了某些阎军军官走私贩毒的发财之路。所以阎锡山一接到驻太原日军的抗议和高干薄毓相等对杜任之“讲话”的诬告，他又出尔反尔，把杜任之视为他的眼中钉，决定铲除杜任之。

### (三)

杜任之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押送杜任之的囚车前往吉县克难坡的途中，原本是杜任民大教授时学生的区县干部，不少人拦车送茶送饭。特别是路经隰县城时，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进山中学主持工作的赵宗复(中共地下党员)，安排让杜下车在招待所休息，并告诉他，已派人火速给赵戴文送信，想方设法来保护和营救。

赵戴文平时对杜任之就有好感，认为是难得的人才；接到儿子的信后，立即找阎锡山询问扣捕杜任

之的原因。

阎说：“杜任之是国际共产党间谍，那年因为第三国际间谍案，武汉行营追捕的刘思慕就找到他这里。”

赵说：“我们那时说，没有证据，杜任之是杜任之，刘思慕是刘思慕，两个各不相干嘛。”赵引用当时的决定来驳阎。

阎又说：“还有英共《工人日报》记者也来找过杜任之。”(事实是先和杜任之联系后，与阎见面的)。

赵说：“人家是访问你来的。”

阎说：“访问我？那不是个样子，实际上是来找他的。”

赵又说：“你说杜任之不好，恐怕没有那么严重吧？过去的案子都弄清了，国际间谍案是你批的，你批示放了他，哪能现在又找后账呢？”

阎很不高兴地说：“1939年十二月事变里咱们吃了大亏，咱们不能轻心，杜任之在孝义是要搞政变。还有他把儿子送到延安不回来，在孝义他不肃伪，他手下又有一帮人，这种人我们不能留。”

这次，虽经赵戴文尽力辩护，阎锡山没有一点松口，但总算给了赵一点面子，杜任之没有被关押在宪

兵司令部，而是软禁在克难坡二新沟的杜的家里，由六个宪兵轮流看管。其间，赵戴文还见了杜任之一面，赵听了杜的述说后说：“救不下你，我心不甘！”

#### (四)

阎锡山要处决杜任之，又不愿落个杀人的臭名声，便决定让杜任之“自裁”，这是阎进行封建统治的最高纪律处分。

之后，阎又想到让杜自杀也会激起广大文职人员和群众的反对，便想到借刀杀人；面示赵承绶以“同志会”驻会主任委员身份，召开高级干部审判会，让集体签名强制杜任之“自裁”。

赵承绶在会上说：“杜任之讲话是有意破坏政策，挑拨军民关系，性质严重，组织不能宽容他，大家要维护纪律。”薄毓相、孟际丰（阎军总政治部主任、候补高干，太原解放后被镇压）随即鼓噪要杜“自裁”，并在判决书上签名。而省政府秘书长王怀明和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等，则在赵戴文的支持下拒绝签名。王怀明说：“依法判罪没有证据不行。”并反驳关于“杜任之是国际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的说法：“是谁指示了他，指示了些什么？有没有人证？如果说到过延安的就是接受了指示，那么我去延安时还见过毛泽东，这样闹下去，岂不人人自危？”孙楚也说：“我和杜任之在晋南督战时，他抗日坚决，是好干部，不能一有错误，就不能宽容他。”王怀明和孙楚这一文一武，据理力争，拒绝签名，也影响了大多数高干。

同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受命对因《战训报》刊出杜任之“讲话”被捕的张斌、张铭进行审判，也没有逼供出可供“处决”杜任之的任何把柄，阎锡山杀害杜任之的阴谋终于破产。

#### (五)

长期被软禁的杜任之，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阅读了赵戴文派人送来的《易经》、《老子》和《论语》，撰写了《中国古代辩证法》和《孔子论语新体系》两书的初稿，还在窑洞前的山坡上开荒播种蕃茄。

1943年12月底，赵戴文逝世，杜任之要求前往吊唁和送殡，他在送殡行列中，向阎锡山的副司令长官杨爱源提出了“恢复自由”的要求，后又致函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希望对他恢复自由出力。

1944年1月的一天，梁化之和杨爱源一起去见阎锡山。梁对阎说：“放了杜任之吧！要不一般青年干部都不安心。”杨也美言相加。阎沉吟良久，勉强地说：“那就撤去看守的宪兵吧。”

这年夏天，山西大学代校长徐士瑚致函阎锡山说，“山大缺乏教授，学生很不安心，请让杜任之来校任教授兼训导长，以安定学生情绪。”阎看了信后，无可奈何地批了“去吧”二字。

#### (六)

杜任之是山西万荣县人，1905年5月生。1927年11月，在上海劳动大学后，不顾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悍然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抱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党的委派到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和“兵暴”工作。为了寻求革命真理，1929年在德国留学，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同盟，与纳粹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933年回到上海，受上海反帝同盟总部委托，回山西

宣传、策动抗日救国运动，其公开身份是太原绥靖公署办公室秘书。1936年，他和一些进步人士发起组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8月，他32岁时自荐担任了太谷县青年抗日县长，兼任周围五个县的总动员指导员，组建了人民抗日自卫队。他在阎锡山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培养了不少地下工作人员，在山西“十二月事变”中和以后，掩护、营救了一批进步青年和中共党员。

抗战胜利后，杜任之在山西大学边教学边联络进步教师和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下半年到了北平，担任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他利用和傅作义的私人关系，积极参与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他于1949年9月回到太原，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53年任山西省商业厅厅长。1956年，他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1958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创办并主编了《哲学译丛》。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坐牢六年多，在狱中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据理驳斥了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四人帮”被粉碎后，杜任之不顾年老多病，又积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和科研组织工作，担任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会副会长。他还被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三、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

杜任之同志于1988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他为了党的事业，历尽坎坷艰辛，进行了曲折、英勇的斗争。他学识渊博，著述甚多，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

（责任编辑 焯然）

# 试析“康生现象”

## 的历史条件

冯建辉

康生，这个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却曾以“理论权威”的面目，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制造过许多冤假错案。不少传记作家和研究者谈到康生的累累罪行，常常归于康生的个人品格——善于钻营，看风使舵，阴险狡诈，等等。《炎黄春秋》1996年10月发表的温济泽的一篇短文中说：“为什么如此一个大奸，能隐藏在党内如此之久并步步高升呢？这不能光从个人原因，而应从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党的某些制度上找出根源。”我很赞成这一分析，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 一、党内一度出现了“思想的荒漠”

康生能够横行一时，是和党内由于个人迷信而曾一度出现了“思想的荒漠”这个大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的。

提及个人迷信，人们往往认为是愚昧，没文化，不懂科学，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引起的。这些分

析，一般地说是正确的。然而套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则不尽符合实际。在中国，60年代前后形成的个人迷信，主要不是文化不高、封建思想颇深的农民搞起来的，而是包括许多高级干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都热心参与了。对党的绝大部分高级干部、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说他们没文化、愚昧，充满封建思想，人格低下，显然不符合事实。据有关资料统计，<sup>①</sup>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77名成员中：（1）从本人参加革命前的职业看，农民仅1人，占1.3%。青年学生、教师、记者、职员占76.7%。（2）从文化程度看，77名成员中大学、大专、师范学校毕业、肄业者64人，占83.1%。（3）从理论学习情况看，都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且有43人，占中央委员会成员的55.9%到苏联、美、法、德、比、英、泰等国学习和工作过。（4）从入党时间看，有64人是党的创建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占92.2%。曾遭反动派逮捕入狱者15人，占19.5%。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骨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较多科学知识，并非愚昧无知者；绝大多数成员思想敏锐，接受新事物快，并且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满脑袋封建意识者；绝大多数成员经过长达几十年的血与火的严酷考验，矢志追求伟大理想，勇于为真理献身，行而叱咤风云，并非鼠目寸光、趋炎附势的凡夫俗子。这样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为什么会一度演出“个人迷信”的历史悲剧呢？

历史的当事人，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回顾这段历史教训时说：

“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

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sup>②</sup>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书，引用毛主席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话：“由于历史经验，人们相信毛主席已经超过相信自己，甚至超过相信集体的智慧和意见。因为在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处于少数，但他总是代表了正确”。<sup>③</sup>

历史的参与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说：

“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地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sup>④</sup>

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可以称之为历史巨人的负面效应。普列汉诺夫曾对这种社会现象做过极为深刻的分析，他说，18世纪法国出现拿破仑这个军事天才以后，“社会的结构就堵截了其余一切能干军人成为军事统治者的途径。于是这种结构的力量就成了障碍能干军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sup>⑤</sup>人们谈到这时常常错误地“夸大了拿破仑个人的力量”，其实，这是一种“社会运动”现象。普列汉诺夫谈到“人类智慧发展史”时还说过，当社会上的某种任务已为杰出人物A解决了时，其他许多人的视线“就会离开这个已经解决的任务而去注意另一个任务”。<sup>⑥</sup>

一个历史巨人的出现，可以启迪千万人的心灵，点燃起他们的希望之光，从而有力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由于历史巨人的光芒太强了，太耀眼了，也会使不少人暂时形成认识的盲区，使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智慧反而受到抑制。从认识论上讲，社会的需要产生着巨大的力量，推动人们去寻找，去探索，去冒险。人们在寻找、探索、冒险中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智

慧，同时也在精神上不断得到自我满足。一位历史巨人的出现，以他深邃而耀眼的光芒，一下子把人们认识上的迷途照得很远很远，同时也使人们在某些方面，一下子精神上得到极大满足。这固然是好事，但也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即：一方面，人们往往容易把“一下子”展现的认识之途上的“很远很远”，误当做认识上的尽头——终极真理的实现；另一方面，认识上的众多疑惑和渴求“一下子”得到巨大的满足，反而容易使人们的认识产生惰性，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失去继续寻求、探索、冒险的动力。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一度出现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是一种历史巨人的负面效应。康生现象的出现，则是这一段特定历史的衍生物。在历史暂时形成的“思想的荒漠”中，拉大旗做虎皮，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正是康生及其同类者最主要的行为特征。

## 二、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形而上学风行

1959年庐山会议和随后在全国掀起的“反右倾”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一大批从实际出发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的干部，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彭德怀等“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为祸首”。全军划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中央国家机关重点批判了1900人。湖南省县级以上机关就有4696人被重点批斗，1630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1962年进行甄别平反时的统计，那几年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达365万之多。<sup>⑦</sup>这一段历史在全党党员思想上引起的震动实在太大了。特别是

“反右倾”运动中流行的某些形而上学理论，在人们思想方法、思维模式上产生的消极影响，实在太深远了。

首先，是非标准搞乱了。当时流行着一种非常有影响的说法，“路线对了，一切皆对；路线错了，一切皆错”。“三面红旗”是革命路线的产物，所以大方向就永远不会错。即使有错，也永远只是支流，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形势永远大好。彭德怀“路线错了”，因此一无是处。新账老账一起算，从一参加革命就别有用心。因为他过去的名字叫“德华”，可见野心勃勃想“得中华”，是个典型的野心家。这种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绝对化思维模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曾为多少人所接受，所使用，又曾使多少人越来越“糊涂”，思想陷入一片茫然。

其次，做人标准搞乱了。我们党一贯提倡实事求是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表现。可是在“反右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却大讲“站在哪一边，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以人划线，以风划线，事事处处划线站队。站对了队，就是“头号的大好”；站错了队，“就是头号的大坏”。有些人一遇风来便不顾原则，抢先表态，唯恐表态慢了成为“政治问题”。他们说：宁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要组织上出问题。政治上犯错误是大家的事，组织上出问题个人吃不消。于是，看风使舵，虚张声势，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四起。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对当时党内的精神状况，做了如下描述：

“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时候，弄虚作假，吹



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受排斥打击，而一些看风使舵的人物却受到提拔重用。这也就迫使一些同志不得不“只磕头，不说活”，或“只照抄报纸说套话”，或“昧着良心说假话”，或发些违心之言”。<sup>⑧</sup>

第三，思维逻辑搞乱了。由于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形势做了“帝、修、反联合起来整我们”的过于严重的估计，精神过于紧张，使“斗争哲学”、“针锋相对”等思想，形而上学绝对化。如在那个年代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一个口号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一说法在敌我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包含一定的真理性。然而把它绝对化，甚至凡是反对者说好的，我们就要说坏；反对者说坏的，我们就认为好。反对者赞成的一定是坏事，我们必须反对；反对者反对的一定是好事，我们就要坚决去干。这种和反对者势不两立，在一切方面采取“对着干”的思想，则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根本问题在于，对事物的认识和态度不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根据敌人或反对者的态度来决定。如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但由于得到赫鲁晓夫等人某种程度的赞同，因此“反证”彭的意见必定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三面红旗搞糟了，我们就说由此证明三面红旗好得很。苏联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我们则认为金钱、利润是坏东西，大批“唯生产力论”。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逻辑，也助长了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发展。

阴谋家康生批判人、整人、害人，之所以能连连得逞，在方法上，正是利用了这一风行一时的形而上学的逻辑。

### 三、政治与理论关系的误区

在我们党的理论发展上，曾出现过一种不好的倾向，谁有权谁就自以为有真理。陈独秀身居党的总书记高位，就自以为拥有绝对真理权。大革命时期，共青团中央郑重其事地向陈独秀提出书面意见，他连看也不看当众撕碎扔到脚下。李立三做党中央实际负责人时，也常常标榜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借口“军事时期”，禁止党内的任何批评与建议，更不允许有反对意见，一律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使同一句话，如“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说出来就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由王明的嘴说出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在这种“谁有权，谁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长期受到压制，并被扣上“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与组织处分。遵义会议以后，上述错误倾向得到纠正。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内逐渐形成有利于理论健康发展的良好风气，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出现了理论蓬勃发展的局面。1957年以后，执政党的地位再加上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党内产生了骄傲情绪。“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在一部分干部中再度出现。领导干部的话不仅是“真理”，而且是法律，甚至大于法律。

康生成为“理论权威”，正是这种不好风气的典型表现。建国初的几年，康生不得志，默默无闻，没见过他有什么理论建树，没有听谁称他为“理论权威”。1956年“八大”，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1957年3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来又成立中央组织小组，康生兼任组长。195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任副主任。下半年，他受中央委托兼管党校工作。由于康生管理理论宣传和文教工作，自然要讲点“理论”性的话，从此竟以“理论权威”自居，别人也渐渐把他视为“理论权威”了。

康生成为“理论权威”，还和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过分依赖于现时的政治活动有关。长期以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理论要服从现实的政治，理论工作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这一说法对党的理论工作，乃至理论本身的发展，影响甚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种服务主要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在革命实践活动中不断受到检验，不断修正，不断发展，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是“服从”。正确阐述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然而理论工作还肩负着另一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理论工作要以革命实践为中心，为宏观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进行理论论证，以对现实的系统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为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形成提供正确的依据，并在其执行过程中及时提供修正性意见。

一个时期内，由于我们对理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片面的解释，以致形成理论始终围绕现实活动转，理论工作成为现行政策的合理性解释者，发展了实用主义倾向。在这种状况下，“了解上头精神”成为进行理论工作的关键问题。谁能及时了解“上头精神”，谁就在理论



上最有发言权，谁就可以成为“理论权威”。长期走红的理论家陈伯达就是这样做的。他经常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陈伯达的秘书曾说，陈“最关心的，是摸主席的动态”，“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康生更是如此。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有着其他理论工作者所没有的特殊条件，能够及时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动向。因此，他常常抓住毛泽东思维过程中的某些想法，大作文章。如5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在“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上与苏共有不同看法，担心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会在中国重演。康生则及时地在1958年夏给北京市教师做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使他成为早于林彪提出“顶峰论”的风光人物。反右派、反右倾以后，党中央对知识分子一度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康生则到处鼓吹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要以政治思想标准划分阶级，及时为党中央这一“左”的估计披上理论外衣。

#### 四、“左”倾错误的历史需要

普列汉诺夫谈到历史人物要能够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必须有两方面条件：一是社会的某种需要；二是本人恰恰具备这方面才能。我想，这个看法不仅适用于“英雄人物”，也适用于历史上的“恶人”。我们党“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sup>⑤</sup>最大的错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问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

紧，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康生由于长期搞情报工作，又有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使得他对“阶级斗争新动向”有着特殊的敏感，并且非常会搞这种错误的“阶级斗争”。康生的这些歪才，在我党的“左”倾错误发展中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他的罪恶行径又对党的“左”倾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康生于1931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直到1937年11月回国到延安。这一时期，正是苏联肃反扩大化严重泛滥的年代。在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大批干部被扣上“反党分子”、“特务”、“外国间谍”、接受“外国津贴”等罪名，惨遭监禁甚至杀害。最后，连执行肃反任务的许多“契卡”人员，也不能幸免。身在莫斯科的康生，把这些统统作为正面经验接受下来。他于1937年11月到延安以后，1938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期刊第34期就刊登出《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右派与托派同盟”叛国案的判决书》。“判决书”宣称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是“德国间谍”，“每年获25万金马克”。康生如法炮制，于1938年1—2月份发表文章，无中生有地给陈独秀等人扣上“日本奸细”的帽子，并说陈独秀从日本每月领取300元的津贴。此后，康生又在延安整风中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左”的眼光视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但总的看来，康生的这一套在延安时期只是“小试身手”就碰了壁，因为当时不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受到许多同志的抵制。

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潮的逐步泛滥和人为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使得康生的“这一套”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于是康生成为思想战线上能呼风唤雨的“权威人物”。他以特有的嗅觉，从一部很好的小说《刘志丹》中，能够嗅出“反党”气味，创造“利用小说反党”这一莫须有的罪名。他能够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综合经济基础等学术争论中，施展阴谋诡计，使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把杨献珍等一大批理论工作者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投入牢狱。一时，在党内，特别是在理论工作者中，造成提心吊胆、人人自危的局面。

我们研究康生由心术不正者到充满杀机的“理论权威”的发迹史，应当着眼一个曲折时代给予我们的惨痛教训。

[注]

①王健英《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状况的基本分析》，见《中共党史资料》第49期。

②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81、1290页。

④《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华龄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页。

⑤《大将罗瑞卿》，转引自《毛泽东一代政治领袖》（高健生著），第410页。

⑥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⑦以上几个统计数字均引自丛书《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29—232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5页。

（责任编辑 杜晋、洛松）



# 法学家张志让 与三位 共产党人的交往

● 钱听涛

张志让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1893年12月28日，他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贞和堂张宅，比毛泽东同志生日迟两天。贞和堂的隔壁是瞿秋白出生地八桂堂。

抗日战争中，我少年时在八桂堂住过几年，知道贞和堂张氏是常州世家，后来才知道就是张志让的故居。因此，对这位尊敬的乡先辈一直怀有一种亲切之感。在搜集史料研究他的生平的过程中，得知这位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与三位共产党人的交往特别令人感动，引起沉思。

## 张志让与张太雷

原来张志让是张太雷同五世祖的族兄，比太雷大五岁。清乾隆年间，住在常州西下塘的张圣经有子二人：长子张怡为张志让高祖父，次子张悦为张太雷高祖父。经过百年沧桑，世事沉浮，张怡的曾孙张赞宸（韶甄）迁居贞和堂，当了萍乡煤矿总办兼汉阳铁厂总办，他就是张志让之父。张悦的一个曾孙张光斗（亮采），家道式微，生活无着，他就是张太雷之父。在当时宗族观念很强的社会里，两家不仅有来往，而且张亮采投奔族兄张赞宸时，赞宸看到亮采还是入过学的秀才，因此就安排他在安源煤矿洗煤台担任文牍。不幸的是五年后即1907年左右，赞宸、亮采先后在任上病故，两家均扶柩回乡。张

太雷母亲携一子一女到张志让家帮助料理家务。张志让及其姐妹均在聘请的家庭教师处学习中英文，张太雷也曾一度随读。张志让在他71岁时写的自传中还提到“张太雷（更名“泰来”）是我远房的堂弟，他的父亲曾在萍乡煤矿做事，那时我还很小，两家常有来往，因此我与他很相熟”。

星移斗转，岁月如流，两人在以后十余年中经历大异，来往也疏远了。辛亥革命这一年，张志让北上北京入清华学堂初级部，后又转北京大学预科，不久又南返入上海大同学院。1914年毕业后，又进复旦公学。1915年赴美，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文科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法科。1920年夏毕业，又到柏林大学法科学习一年，1921年夏初回国。由他父亲友人、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董康介绍，到司法部门工作，在大理院当推事，办民事案件，还兼任过“法权讨论委员会”笔译工作。王世杰曾邀他到北大法律系兼课，江庸邀他到北京法政学校兼课，他还在《法律周刊》上写文章，因此，这时张志让在北洋法学界已很有名气了。

十月革命发生后，张志让虽然仍在美国埋头读书，但也预感到这是“世界变化的新趋向”。回国后，1926年秋天，张志让再也不愿在北洋法界工作下去，请假南返，到上海后就正式向大理院辞职。不久，北伐军占领武汉，1927年2

月，武汉收回英租界。3月，张志让下决心赴汉口看看正在创造的新世界。这时张太雷作为鲍罗廷的译员，常常出席汉口的群众大会，张志让终于知道了这个堂弟的下落。他很快找到了张太雷，作了倾心长谈，张志让接受了张太雷对当时形势的种种分析，相信共产党是为救国救民而献身的革命先锋。张太雷建议这位堂兄参加武汉政府最高法院的工作。张志让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迅速回上海取了衣被就到汉口上任，担任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员。张志让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知识，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

时局急转直下，宁汉分裂又合流，中共中央又转入地下。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张志让所在的最高法院与武汉国民政府一样宣告结束。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张志让心中是非分明。他决定回上海，临行前到张太雷在南湖的秘密工作地点匆匆晤别，谁知竟成永诀。当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张志让在上海知道这噩耗后大吃一惊，非常悲痛，也更崇敬这位堂弟。

张志让在武汉仅约四个月，却成为他一生政治上的转折点。他在晚年回忆说：“在武汉所看到和谈到的一切及张太雷对我的谈话，更使我确信：只有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才是真正以谋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是中国当前唯一的出路”。在大革命遭到失败，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许多不坚定的人被大浪淘沙而去，而一个接触革命不久的张志让却能如此坚定，这是多么高贵的品质！

## 张志让与张庆孚

张志让由汉回沪后，一直在上海执行律师事务，成为上海有名的“张律师”。同时，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夜校）兼课，从1932年春天开始，又在复旦大学任法律系主任，以后还兼任法学院院长。

在当时反共高潮中，张志让对共产党的信念未变，他一直渴望找到党。大概在1929年，他在李达家中遇到了老共产党员张庆孚（时名

张琴抚），才实现了这个愿望。

张庆孚是1925年经恽代英介绍入党的老党员，1926年7月毕业于上海大学，后经恽代英介绍入黄埔军校任第六期入伍生部一团四营、三营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从广东秘密逃回上海。根据党组织指示，曾一度到湖北、河南、安徽一些国民党杂牌军中做兵运工作。后因站不住脚，又潜返上海，在中央机关做交通发行工作。党的“六大”后提倡党员工作社会化，要找公开合法的职业。1929年7月，他由表叔朱文瀾介绍，入上海法政学院（朱是该校教务长）当教授。在此之前，张庆孚已根据党的安排，担任了和“左联”类似的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全称是“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书记。

张志让在60年代写的自传中提到：“我自从在汉同张太雷分别后，一直渴望与党有所接触。回沪后不久，有一天在李达家中同张庆孚相识。”“他在同我长期的接触中也成为知我最深的人。”一直到1934年11月，张庆孚受党指派离沪赴陕北时止，几年中间，张庆孚时常与张志让见面，向他讲解形势，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使张志让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张志让为党所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利用他从事律师业务的机会，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30年，党为了营救被捕同志，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张志让和史良、潘震亚等都被聘为互济会的律师。1933年1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邹韬奋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时，张志让被推举为三人法律委员之一（另两人为沈钧儒、郭蔚然。）根据张庆孚介绍，张志让为之辩护而营救过的共产党员有潘梓年、吴亮平、黄洛峰（解放后曾任新华书店总经理）、郑绍文（解放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等。

张志让特别参与了三件大案：

一是1931年8月，“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成员、共产国际驻沪秘密代表牛兰夫妇（无国籍外国人），被国民党逮捕，轰动国内外。宋庆龄亲自为之多年奔走，张志让曾陪同宋庆龄到南京营救。牛兰夫妇一直关押到“七七事变”后几个月，才获释转到苏联。

二是1936年冬，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虹口被人枪杀。当时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日方蓄意扩大事态，租界外国当局为了自己利益，诬称两个无辜的中国人杨文道、叶海生为凶手，被国民党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两人不服上诉，由江苏高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等复审，张志让担任辩护律师，把案内破绽一一指出，当时各报大力宣传，上海闹得满城风雨。后来上诉到最高法院，法院悬而不判，一直拖到“七七事变”爆发后才宣告被告无罪，但叶海生已屈死狱中。这是所谓轰动一时的“八·一三前奏曲”。

三是有名的“七君子”案，在辩护时请了21名全国闻名的大律师，张志让是其中之一，而且决定由他起草《答辩状》。这份《答辩状》在各报公布后，也引起全国震动。

后两案虽在张庆孚离沪后，但显然与张庆孚几年来对他的影响分不开。

全国解放后，两人又在北京相遇。张庆孚任林业部副部长，张志让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60年代张庆孚逝世前，两人时有来往，这真是生死不渝之交啊！

## 张志让和李正文

1946年夏天，张志让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成立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参加者为以复旦大学为主的上海各大学进步教授，从20多人发展到80多人。它的核心组织是干事会，基本上由沈体兰（名义上的主席）、张志让（实际负责人）、李正文（主管组织）、郑太朴、蔡尚思、曹未风等组成。实际上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局主要通过李正文在“大教联”中贯彻党的意图，李也要定期向组织汇报。由于张志让在会员中威望高，能出主意，许多事李正文都通过张志让出面去办。李正文后来回忆：“由于我同张志让先生在‘大教联’干事会上的共事关系，不久他就意识到我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于是，有事便和我商量，遇见疑难问题，就叫我请示党。党叫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就这样，我们俩建立起亲密无间的战斗友谊。从此以后，他虽然不是党员，但实际上

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上海局的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和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当中，有他一定的贡献。当时，我称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张志让的回忆中也提到：“‘大教联’推出干事五人。干事经常开会，讨论当前政治问题，并决定工作问题。干事中有我和李正文。我在与李接触后不久，就意识到李能带来党的指针。我们在‘大教联’的整个共事时期，始终密切合作”。

从1946年10月到1948年底有两年多时间，正是配合解放战争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的关键时期，上海和北平是当时南北两个中心，影响到全国。从沈崇事件、反对美军暴行，到上海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五·二〇事件”等，“大教联”发表过一二十次爱国民主宣言。配合“五·二〇事件”，张志让在复旦大学发动一次罢教。国民党悍然解聘进步教授，李正文也在内。张志让提出，撤掉他的法学院院长来代替解聘30多位进步教授。他还主编《日本问题面面观》一书，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阴谋。在1948年，张志让尽力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将人员物资随蒋介石迁到台湾，动员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留下来。这些活动，都是与李正文配合进行的。

1948年底，党中央决定邀请陈叔通、马寅初、张志让、叶圣陶等32位著名民主人士，秘密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这也是通过李正文安排的。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正文作为军代表接管复旦大学，张志让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两人先后调京。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及“文革”结束后，两人忧时忧国，仍频频来往。

从张志让几十年来与三位共产党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80年代党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不仅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张志让与张太雷、张庆孚、李正文的关系，感人至深，值得永远铭记。

（责任编辑 丁 末）

# 蔡元培

## 在香港的最后日子

● 刘小清

1937年11月27日，一辆灰色小轿车驶进上海黄浦江边法租界码头。车内走下一位长衫一袭、步履蹒跚的长者，他眺望黄浦江面繁星似的点点灯亮，回眸身后黑黝黝的摩天大楼轮廓，脸上露出一种依依不舍的神情。

海关大楼那熟悉的钟声一连敲了八下。他在随行的搀扶下，寻着一条窄长的伸向江面的人行通道，登上了停泊在码头上的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法国邮轮“珂拉密司”号。

这位老者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蔡元培。

“鄙人是一个  
拿笔杆的人，所敢  
夸口的也只能是在  
笔杆上多尽点力”

蔡元培生长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浙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年间，奇迹般地由古城绍兴的布衣寒士而跻身

于帝都北京的翰林文苑，引得多少寒窗学子的艳羨和惊慕。然而，他却轻抛功名、挂冠而去，继而走上反清道路。他以不惑之年，远走欧洲，留学德国，倾心求索创造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化。回国后，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民国初立，他为首任教育总长，励行变革，祇定共和教育的根基。其后，他执掌中国一流的北京大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并蓄的旗帜，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焕发新生的新式学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促成了新文化的繁盛，也激发了“五四”风潮的热情。他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为研究实体，面对重重困难，殚精竭虑，不仅组织了一支汇集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而且初步确立了独立开展科研的规模和体系。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追求和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卓著功业，得到国人的广泛推崇和尊敬，从而被誉为

“学界泰斗”、“一代宗师”。

然而，一生不乏高官显位的蔡元培，晚年却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政治，社会活动也日趋沉寂。随着年老体衰，他试图从繁杂的事务牵扰中摆脱出来，静心做一点自己的事情。为此，他辞去了多达23个兼职。在辞职启事中声言：“以元培之年龄及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勉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

辞职后的蔡元培如释重负，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和日程表来统筹晚年生活。这对劳瘁了几十年的蔡元培来说，是一种解脱，一种数十年未及享受的宁静。

1936年1月11日，蔡元培迎来了自己70岁的生日，家人为此举办了小型寿宴。其时，室外虽然寒风凛冽，雪花飘洒，屋内却春意融融，气氛热烈。蔡元培借用孔子70岁时的生命自述来观照自己的人生历程，其中广征博引，雅趣横生。他说：“人生在世，

一百二十岁为上寿，一百岁为中寿，八十岁才称下寿。只有社会的寿最长，可以称万岁。”蔡元培以“八十岁为下寿”来勉励自己，从而对人生充满了乐观态度，幽默中不失哲人的旷达。

蔡元培 70 寿辰，为著名画家刘海粟等人知晓，他们以为不大庆一番，“同蔡元培先生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太不相称了”。而刘海粟对此尤为热心。早在 1912 年，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蔡元培即担任了校董事会主席。此后，蔡从各方面支持刘的艺术事业，帮助刘出国考察游学。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也深受蔡元培的启示与影响。这位后来被日本名画家誉为“东方艺坛之狮”的我国近代美术奠基人，对蔡元培先生始终敬重有加。为此，刘海粟热心发起，在坐落于上海外滩的著名国际饭店举办了蔡元培七旬寿辰的盛大庆祝活动，参加者多达千人，其中颇多名士。有：沈钧儒、沈思孚、黄炎培、陈树人、于佑任、马寅初、许寿裳、梅兰芳、林语堂、林岷瞻、叶恭绰、张学良、顾维钧、王昆仑、李四光等。在这串显赫的名单中，不乏政界要人和金融界巨头，但更多的则是科学、教育、文化界人士。

蔡元培先生一生推崇恬淡雅静，不愿如此张扬，曾极力推辞，但又拗不过众人的盛意，遂欣然到场，又感触万端。他不无激动地答谢：“鄙人是

一个拿笔杆的人，所敢夸口的也只能在笔杆上多尽点力。”

然而，也许是乐极生悲，在这规模盛大的庆寿活动后不久，蔡元培即大病一场。虽说治疗及时，调养有方，终于转危为安，但他已体力大衰。

1937 年 7 月 7 日，当抗日的烽火在华夏大地燃起后，病体孱弱、心力不支的蔡元培，除了以其名望呼吁抵御外侮外，不可能再有更多作为。于是蔡元培前往香港避难养病。

### 他内心世界的 激情岂是那病弱的 身体所能框限？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初生活，仰赖友人王云五的悉心安排。王云五曾在 20 年代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东方图书馆馆长，后继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因发明四角号码检索法和完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曾经名噪一时，但他对当年曾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无论是学识和人品都很仰慕，故过从较密。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中心即移香港，王云五也就常驻香港督导。

其时，蔡元培化名周子余。出处在于《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子遗。”周乃蔡之母姓，故喻母周之子。他深居简出，绝少公开活动。

初到香港的蔡元培为了调养身心，在其家人和朋友的

陪同下，曾游览了香港扯旗山、浅水湾等名胜风景地。

蔡元培在宋王台遗址前凝神很久，默然伫立，仿佛从中透视出那一幕悲壮的历史。

那是南宋末年，蒙古人攻陷都城临安，数十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军民，在张世杰、陆秀夫的率领下，拥戴 9 岁的赵昰为帝，逃亡到南中国海滨。剽悍的蒙古军穷追不舍，一路烧杀掳掠，直逼珠江口。赵昰在颠沛流离中惊悸成病，不久亡于香港大屿山。大丞相陆秀夫遂立 8 岁的赵昺为帝。他们建皇宫，造军营，试图凭借一隅与蒙古军相抗。无奈落花流水，天意难违，蒙古军大将张弘范率大军攻破宋军阵地。为免被掳受辱，陆秀夫令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幼主赵昺蹈海殉国。众多朝臣、官妃，见此情景悲愤难抑，竞相扑向大海，宋朝由此而亡。

蔡元培在这悲壮的历史面前唏嘘不已。他想到如今日寇入侵，不由更加惦念战火中的故土，并情不自禁地赋诗咏怀：

由来境异变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蔡元培在香港唯一的一次公开活动，便是出席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賑会联合在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的美展开幕式。这天，蔡元培精神大振，在包括港督罗富国在内的众多来宾面前，他即兴发表演讲：



抗战时期需要人，人具有宁静而坚毅的精神，不论是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还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救难民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有了这种精神，便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从而在全民抗战中担当起一份任务……

在抗战初期的困难时刻，蔡元培对未来始终有一种自信的乐观豪情，时时鼓荡起铁马金戈的壮烈情怀。这种思绪，在蔡元培的诗作中有很强烈的表现：

枫叶荻花瑟瑟秋，江洲司马感牢愁。

而今痛苦何时已，白骨皑皑战血流。

这是他当时写给陆丹林的红叶诗。

世号诗史社工部，亘古男儿陆谓南。

不作楚囚相对态，时间诤语展雄谈。

这是他为张一馨《八一三纪事诗》所题七绝。

最能说明这时期蔡元培壮心不已的文字，莫过于他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后，为该会会歌所作的歌词《满江红》：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

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羸拙。

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

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

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

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

与友邦共奏凯歌曲，显成绩！

## 在平静、寂寞中发出“岛居颇恨图书少”的感叹

蔡元培晚年在香港摒除外务，希求静心养病和写作。他的写作计划有：写一本“以美育代宗教”的书，编一本美学书，编一本比较民族学书，另外，应胡适的多次建议，拟写自传。这些愿望已萦绕心中多年。他一生奔走国事，投身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几乎难有充裕的时间静心从事著述。然而，对中西学术长期求索而形成的独立见解积蕴于心，不发不快。人入晚境，回首往昔，世事纷扰，以有生之年力求补偿，该是一种进取的情愫。

以后，蔡元培在香港经常写作的，是他的《自写年谱》。该年谱自1936年2月在国内时即已动笔撰述，在香港只是续笔。但由于蔡元培不久病卧床榻，不得不辍笔。因此年谱仅有4万余字，是一部未完成之作。该年谱用白话文写作，文字简洁清丽，对家世、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及读书、供职北京翰林院、回乡从事教育、在上海的活动、留德四年以及其后旅居法国的生活，均

作了详实记述。蔡元培人生成长的轨迹于此一目了然。同时，还可从中探知蔡元培思想人格的形成环境和过程。

蔡元培一生虽参政较多，但始终是一名学者。及至晚年，他仍勤学不辍。据资料记载，他晚年在香港读书的篇目有：王闾运《湘绮楼日记》、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张元济《校史随笔》、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以及《王阳明全集》、《陆放翁全集》、《游志汇编》等。

然而，在蔡元培的大视野里，港岛毕竟局处一隅，弹丸之地，远远不能满足他那博大的需求。于是，他发出“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的感叹。

读书暇余，蔡元培仍应约为一些书籍撰写序文。先后有《鲁迅全集》序、肖瑜《屠友学说评论》序、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任鸿隽《古青诗存》跋等。作为蔡元培晚年所留不多的文字，这些序跋的价值也就远远不止其本身了。

最令蔡元培欣慰的是，晚年他与周夫人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夫妻感情融洽，恩爱有加，还不时作诗唱和，情趣盎然。1939年3月，时在香港的周夫人50寿诞，蔡元培专门赋诗《为夫人周养诒寿》，其中云：

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

万壑万岩在眼前。

## 一代宗师被安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在寓所起床时，倏觉头晕目眩，失足仆地，口吐鲜血。家人急召医生诊治。由于时为星期天，商务印书馆特约西医朱惠康至中午始到，后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应请前来会诊，疑为胃疾，建议住院治疗。翌日，由周夫人和朱医生侍伴，送蔡元培过海到跑马地香港养和医院救治。抵达医院不久，病人即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状态。虽然中外医师悉心救治，施以输血措施，但终以年高体弱，与世长辞，终年73岁。医生认为，其摔倒在地，伤及内部，导致胃瘤出血，乃不治之因。

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痛惜。3月7日，蔡元培遗体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香港各界敬送挽联。三百余人前往参加遗体告别。人们悲痛欲绝，恸哭不已。

一位港台学者曾经说过：“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十九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初叶，在这段时期中，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颂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20世

纪中国伟人中极少数例外之一。”

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张一鸾则写道：“宋人谓：见程明道如坐春风中。与蔡先生交往，殆有此风象。”

曾是北大学子的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在蔡先生身边，感同风光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

印象如此接近与相像，充分说明了蔡元培先生有一种非常人可比的人格魅力。蔡元培一身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了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因素。

然而，正如蔡元培的学生，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大家只看见先生谦恭和蔼的方面，而少知先生坚毅不拔、风骨嶙峋的方面。”林语堂先生亦有此说：“蔡先生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然而，大师去矣！3月10日，是出殡的日子，香港前往执紼者竟达五千余人。蔡元培的灵柩最后被安葬在港岛南端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京师大学堂校友叶恭绰书“蔡子民先生之墓”刻石。

蔡元培逝世后，全国各界举行了悼念活动，多家报刊登文赞誉他的功德，各主要党派和团体及名人要人纷纷致电吊唁。民国政府发布褒扬令，称蔡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

噩耗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即派驻港负责人廖承志为代表，前往慰问蔡元培家属。中共中央在唁电中称蔡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子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言，尚祈节哀。”

悼念期间，各界人士所送挽联，蔚为大观。在后印行于世的《哀挽录》中，有一联云：

“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推动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曾分别在武汉和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的挽联云：

“薄元首而不为亮节高风千秋曾有几辈；容百家之并起宏模雅量当代祇见斯人。”

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挽联云：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有学者研究蔡元培身上蕴藏着什么力量，能赢得如此广泛的拥戴和各党派的称誉？结论是：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

（责任编辑 王 恂）

# 中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

● 于建宁 吴鹏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旨在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武昌起义。满清朝廷派袁世凯率北洋军倾巢出动，镇压起义民军。民军与数倍于己之敌鏖战，汉口、汉阳等地相继失守，情势危急。面对清廷重兵压境和檄榜“殊灭九族”的威胁，海军将领黄钟瑛以民族大义为重，率中国主力舰队起义，投向民军，削弱了清军阵容，改变了两军实力对比，被民军总司令黄兴称做“一举夺得扬子江，汉势不孤”。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将海军部列为政府9个部之中，并亲自任命黄钟瑛为海军部总长兼海军总司令。1月6日，孙中山发布《告陆海军将士书》，号召同心戮力，拥护民国。同年12月，黄钟瑛戎马征战，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孙中山闻讣大恸，哀叹他“尽力民国最多”，“屈指将才有几”。

## 爱国当为己任

黄钟瑛，字赞侯，号建勋，福州市茶亭街人。其父黄河澄曾以五品同知衔被闽浙总督左宗棠推荐出办团练。黄钟瑛7岁时丧母，由长兄嫂照顾长大。他14岁时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局后学堂第十一期驾驶班。该学堂为我国第一所军事学校，授课用英语，课目除了军事外，还有数、理、化、航海船艺等几十门，学制8年。校友中英才辈出，有译著《天演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造船专家魏瀚，在甲午黄海大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刘步蟾等。在学堂，黄钟瑛钻研各门功课，成绩优异。毕业后，派往“清远”、“威远”、“康济”等舰见习；又去威海刘公岛枪炮学堂学习，学

成后，充任“济远”舰舰员。

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是年7月，“济远”、“广乙”舰护送运兵船“高升”、“操江”，去朝鲜汉城以南的牙山，在返航途中的丰岛海面遭到日本“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巡洋舰的偷袭。当时，日舰占压倒优势。“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吓得躲进底舱，大副沈寿昌登上望台代理指挥。炮战中，“济远”舰望台被击中起火，沈寿昌阵亡，二副柯建章立即接替指挥，不久，也身中弹片倒下。同舰官兵伤亡枕藉，前主炮已无法射击。黄钟瑛挺身而出，大呼“胜在智取不能硬拼”，指挥“济远”舰以尾炮边射击边向西撤退。敌旗舰“吉野”紧追不舍，两舰相距渐而缩短仅2500米左右，黄钟瑛与水兵王国成、李仕茂在纷飞的弹片中，冒着呛人的硝烟准确射击，命中“吉野”、“浪速”二舰，“吉野”舰拖着中弹燃起的滚滚浓烟，转舵逃跑。此刻，方伯谦听说战况转机，钻出底舱，喝令停止炮击，置“广乙”、“高升”、“操江”三舰于不顾，驾舰逃回旅顺。随而，“广乙”、“高升”舰被敌击毁，“操江”被日舰俘获。

五年后，黄钟瑛调到“飞鹰”、“福靖”舰任枪炮员，又历任“海琛”、“海天”、“海筹”等舰船械驾驶副舰长。前后仅三年，就提升为“飞鹰”舰长，又任“镜清”舰长兼海军部参谋，1907年调任“海筹”舰长。他在十余艘军舰上任过职，阵前身先士卒，精通业务技术，军纪整肃，且又与下级官兵情意交孚，经常接济生活困难和有伤病的部属，以“爱兵”而久享声望。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的舰艇全部丧失，南洋舰队也失去了仅有的三艘巡洋舰。之

后，海军经逐年添置，至辛亥年前已有五十余艘的规模。由莘莘学子转为桓桓武夫的海军官兵，目睹清廷的腐朽，国势的衰弱，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鲸吞，国土海疆的支离破碎……无不饱受现实刺激而倾向革命。《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商务报》等鼓吹革命的书刊广为流传。舰上有偷剪辫子的水兵，按清律要处死，黄钟瑛不仅不予追究，反而加以庇护。他对视为体己的舰上正电官（分工电报通信的官员）何谓生沉痛地说：“割地赔款，不兴必亡……”

## 一举夺得扬子江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在广州、惠州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失败后，便计划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发动起义，夺取扬子江流域，进而推翻满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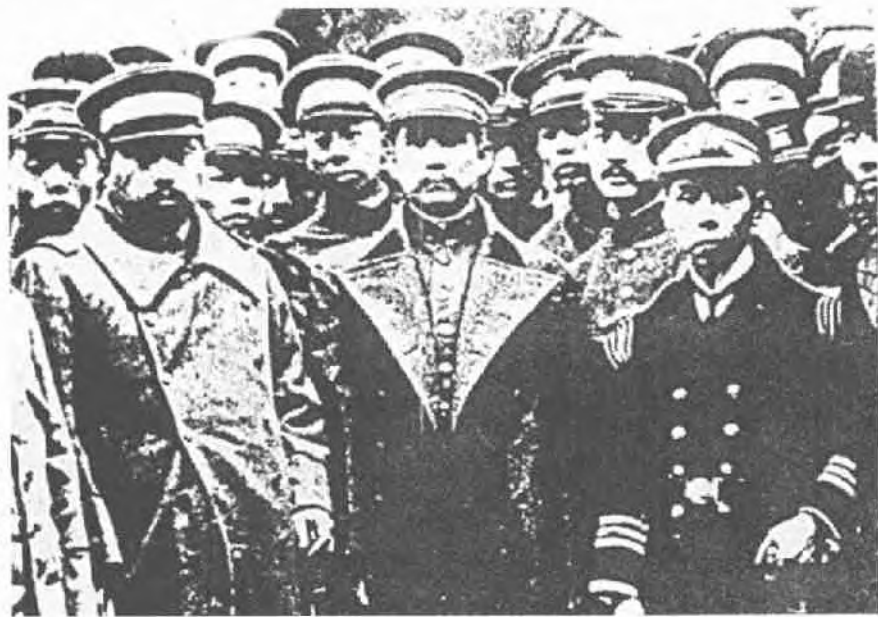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江南黄鹤楼与楚望台上升起了与满清黄龙旗迥然

不同的深红底色九角十八星旗。11日、12日，起义民军相继占领了汉阳和汉口。起义属猝然爆发，是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宣传革命，募捐经费；黄兴正在香港养伤。湖北革命党总指挥部21人，或伤或病或牺牲或逃亡，参与起义的仅剩两人，躲在部属家中的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旅长）黎元洪，被士兵们搜出推为民军都督。10月28日，黄兴装扮成医生乘客轮抵达武昌，出任湖北军政府总司令。对起义恐慌万分的清廷，急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两镇（辖旅的师），陆军、海军提督（总司令）萨镇冰率北洋舰队与长江水师星夜赶赴武汉，进攻作为起义民军主力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在河南彰德原籍蛰居六年的袁世凯亦被清廷召出，以钦差大臣拥权调遣以北洋六镇和北洋水师为主力的湖北前线的满清陆海军，为袁世凯拥兵在握、窃取全国政权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美、英、法、德、日等国，纷纷往武汉江面增派军舰达二十多艘，随时准备以武力助清廷镇压民军。

当时，中国的海军以英制“海圻”，德制“海筹”、“海容”、“海琛”这4艘巡洋舰为大，全部编入北洋舰队，亦全部驰抵武汉江面。萨镇冰率舰到达武汉后，即下令封锁江面，防止两岸民军互相支援。10月18日晨，民军进攻汉口刘家庙，清军溃退至汉口。萨镇冰乘“楚有”号与清湖广总督瑞澂乘的“楚豫”等舰，以猛烈炮火轰击民军，双方炮战了三个小时。下午3时，民军重新发动攻势，又遭到清舰炮火截击，民军伤亡惨重而被迫后撤。次日晨，民军的进攻又遭清舰炮火拦阻，双方炮战至中午。

10月26日拂晓前，清舰冲过武昌东民军的青山防线，以密集炮火袭击汉口三道桥南的民军，炸死民军五百多人。汉口清军乘机反扑，在刘家庙与民军展开拉锯战。当日晚，湖北军政府决定通知各处不得供应粮、煤给清舰。27、28、30日，清舰多次猛轰民军阵地，炮战中双方互有伤亡。31日起，北洋第一军（辖三镇）军长冯国璋在铁路沿线火烧民房，把民军赶出汉口。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军政官员公祭明孝陵，发表演说后合影。前左一为黄兴，左二为孙中山，左三为黄钟瑛

处于劣势的起义民军，尽管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在敌人机枪火力网下，尸填沟壑，汉口、汉阳相继失陷敌手。失败的阴云笼罩在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黄兴的心头上，他欲与阵地共存亡，几次自尽均被救获。11月26日，在军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失败，第一系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少机关枪。”

海军先进装备的威力为革命党所关注，能否争取这支武装已成为挽救革命的关键。黎元洪通过红十字会给他过去在天津水师学堂上学时的老师萨镇冰去信，晓以排满救国的大义，劝萨及各舰舰长脱离清政府。萨左右为难，对镇压起义转向消极。

此时，海军中部分官兵正在酝酿起义。“海琛”、“海容”、“海筹”三舰正电官张悻伯、金琢章、何谓生三个同窗好友，在策划起义时分析道：如果三海舰起义，其他各舰都会响应。“海琛”舰长荣续、“海容”舰长喜昌都是满人，仇视革命；唯“海筹”舰长黄钟瑛不仅是汉人，而且早就倾向革命。目前只有黄钟瑛才能指挥得动整个北洋舰队。他们便找黄钟瑛谈，彼此间在起义倒戈问题上的态度不谋而合。黄钟瑛让何谓生编英文密码12种，沟通各舰联络。在舰队戒严、禁止各舰私下往来时，黄钟瑛还派出鱼雷艇，以维修电机的名义，传递各舰组织起义的情况和有关的消息。

11月11日，在阴遯江面，黄钟瑛觉得时机不可耽搁，毅然决定即日起义。在舰上会议室召集下属官兵，他腰挎指挥刀，胸挂望远镜，表情严肃地说：“吾辈乃炎黄子孙，……应当效忠自己的祖国。如今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诸君要成为共和国的军人，性格要刚健正直，志向坚定而不可偏移，不要私心，不讲

客气，以国事为重，参加革命，保持我中国海军的荣誉。”全舰官兵在二副沙训龄、教官余振兴及何谓生等人的带领下，齐声回答：“一切听从你的指挥！”

黄钟瑛随即下令起锚开航，驰往下游，以摆脱袁世凯对舰队的控制。随着“海筹”舰的蒸汽轮机的轰鸣声响彻江面，张悻伯、金琢章等以黄钟瑛的名义策动“海琛”、“海容”舰起义也获成功。各舰官兵纷纷扯落满清龙旗，抛入江中，将白色义旗高悬于船檐之上。荣续、喜昌躲进睡舱不敢露面，待舰队驰抵九江时，这两人领了路费上岸逃生。“飞鹰”舰大副满人吉升，投江自尽。萨镇冰借口生病，搭乘英商太古公司客轮赴沪。他临行前在“江贞”舰召集各舰舰长说：“本人厕身海军三十年，屡历战事，从来获胜，现同室相残，胜不足荣，长此迁延，既无以对朝廷，更不便附合民军。今舰队托付诸君，好自为之吧。”

黄钟瑛率领北洋舰队脱离萨镇冰的指挥，在九江金鸡坡要塞和马当炮台与民军取得联系。林森等革命党人登舰慰问，在招商局码头欢宴各舰军官。黎元洪闻讯，派专使带信请求派舰来湖北作战。黄钟瑛把舰队分成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由舰队参谋汤芑铭率“海容”、“海琛”、“楚泰”、“楚同”等舰为第二舰队，回驰阴遯。他亲率“海筹”、“江贞”等舰为第一舰队东下，载江西民军司令李烈钧的部队驰向安庆，与残余清军作战，清剿扰民乱兵。平定匪乱后，黄钟瑛又率第一舰队运载炮弹1400发、子弹50万发，驰援武汉。“飞鹰”舰还运来飞机1架。

11月20日起，先期抵汉的第二舰队迎着炮火抵近北岸，以排炮轰击二道桥与三道桥的铁路线，击毁运兵火车，击毙北洋第四镇兵卒400多人，并数次开炮掩护民军渡

江作战。27日，汉阳失守，“海容”等大小舰艇一字排开，沿江来回鼓浪巡航，轰击汉口、汉阳的马场、桥口、戴家山等处清军。第二舰队会同随后赶来的第一舰队的各舰炮不断调整射击仰角，一排排炮弹呼啸着飞向目标区，炸得北洋军阵地一片火海，浓烟冲天。炮战中，各舰艇也中弹累累，官兵伤亡多人，但水兵奋不顾身地为革命作战，体现了孙中山提倡的“为未来而斗争的精神”！

黄钟瑛指挥海军主力舰队，掉转炮口与清军作战，为民军夺取了扬子江水域，保障了沿江的客货运输，维护了治安，挫败了清军的反扑，促成了清朝封建帝制的崩溃。直到清军民军停战议和，黄钟瑛才率舰队驰离入冬水浅的武汉水面，驰往上海，与南洋舰队会合。

武汉议和之后便是上海议和。在上海召开的各舰代表会议上，由于革命党人对参加镇压武昌起义的萨镇冰较为反感，一致选举黄钟瑛在程璧光没回国之前任海军代总司令。临时海军司令部设在上海市的高昌庙。

## 公而忘私 死而后已

1912年元旦，天气薄阴，南京两江总督府辕门前张灯结彩，鼓号齐鸣，代表中华民国的五色旗、陆军的十八星旗和海军的红旗右角镶有青天白日旗，并幅高悬于旗杆之上。院内大会堂，身着立领式黄呢军装，头戴大檐帽，足登长统马靴的孙中山，正在主持临时政府的成立典礼。他以洪亮清晰的声音向全体国民庄严宣誓：“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图谋民主幸福，……我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他宣布了组阁名单，共设陆军、海军、司法、财政、外交、内务、教育、实业、交通9

部。天庭饱满、体魄魁梧的黄兴，就任陆军部总长兼参谋总长；面容清癯、身材修长、穿蓝呢海军制服的黄钟瑛，就任海军部总长兼海军总司令，授海军上将军衔。

在军事上同为孙中山左臂右膀的“二黄”，私人交谊甚厚，在南北议和上却有不同的政治见解。黄兴曾一时对袁世凯等汉族官僚抱着幻想，黄钟瑛不主张与北洋军妥协。黎元洪、胡汉民等，对袁世凯却是一味地献媚。南京政权成立伊始，黎元洪便在争夺军权上与黄兴对抗，黎还反对定都南京，力促把政府迁往北京，他扬言：如果坚持定都南京，他将与北洋军联合，以武力推翻南京政府。

3月10日，在得到重兵在握的袁世凯书信许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之后，孙中山把“二黄”召到设在国民政府西花厅的总统办公室内，双手习惯地叉着腰，望着桌上的铜匣台钟，沉思良久，说：“黎元洪有野心，但他缺乏将才，不能持久。唯袁世凯篡夺革命，窃我中华之更大野心不能不使国人担忧。为避免内乱，议和成功，我决定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接着他手书“有志竟成”、“公而后私”等警句条幅，分别赠与黄兴、黄钟瑛共勉。

“请总统放心”，黄钟瑛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接过横额条幅，说：“海军为国服务，唯听从革命！”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把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民国海军部也从南京盐仓桥迁到北京石驸马大街。黄钟瑛不为袁世凯所拉拢，随孙中山之后辞去海军部总长职务，留在上海专任海军总司令。为了海军的整理、扩充，走向强盛，能够保卫革命政权，御内乱抗外侮，与列强抗衡，黄钟瑛事必躬亲，日夜操劳。冬夜深长，夜阑雪冷，他经常独烛煨火，

熬夜至天明。为防止封建复辟阴谋，他支持在海军中广泛散发《军中白话宣讲书》，以坚定民国海军官兵听命革命政权的觉悟。

黄钟瑛36岁始成婚。黄父河澄为官清正，去世时两袖清风。黄钟瑛早十几年的薪水全用在为父还债及营造父母墓室上，他说：“父母未安，不敢有家室也。”其妻薛氏，性情和顺，见他戎马征战，积劳成疾，便请来他的长兄黄钟沅劝他休息养病。1912年6月，黄钟沅来上海，弟兄俩同游愚园。哥哥望着弟弟眼窝深陷、瘦弱不堪的样子，心痛地说：“你就告病还乡，不要再当这个差啦。”黄钟瑛嘘叹着说：“我何尝不想激流勇退，回家消闲养病。知我者晓我之忧，弟身负重任，实乃身不由己啊！”黄钟沅回福州又写信来，劝他千万要保重身体，公事切勿过劳。他回信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去职方休，整理建设海军，非加十倍精神不可。”信中还说等薛氏分娩后，偕同请假反闽省亲。

同年10月28日，黄钟瑛伤病复发，吐血满盆，遂请假就医。11月15日，进入上海徐家汇红十字医院。22日，偶因公务操心，夜不成寐，两颊红赤，诸症并起。27日出院，请中医诊治，终不见效。临终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一切公事，目始瞑”。歿时12月4日中午，年仅44岁。

过后十日，黄钟瑛灵柩由上海白克路寓所出殡至斜桥会馆，中外吊唁民众络绎不绝。

12月28日，民国海军部在北京阅学堂召开黄钟瑛追悼会，在京军政要员悉数来会致祭。

同一日，上海，陈其美、伍廷芳、萨镇冰、程璧光、魏瀚、严复等发起的追悼会在斜桥会馆召开。孙中山收到讣告，特地从杭州赶到上海主

祭，作了阐述黄钟瑛生平的爱国业绩的演说。说到失此英杰将才给国民革命造成的损失，孙中山悲恸激昂，声泪俱下，与会数百人都与孙先生一起失声痛哭。

1913年1月12日，孙中山专令军舰送灵柩回福州故里归葬。在福州孔庙明伦堂祭吊，孙中山、黄兴、袁世凯等送来了挽联祭文。孙中山的挽联是：“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南海权。”黄兴的挽联是：“一举夺得扬子江，汉势不孤，黯收幕南王气；九州齐传艾尔逊，将星勿陨，独有海上雄风。”

作者附记：本文史料由前空军气象学院院长黄汉基（黄钟瑛之孙）先生提供。并参照《民国海军的兴衰》等书。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焯然）

## “七战七捷” 的提法出自 延安总部发言人

贵刊今年第5期刊出的《粟裕对手李献庵谈“七战七捷”》一文中，把“七战七捷”的出处，说成是粟裕同志提出来的，事实上，最早把这次战役称为“七战七捷”的是延安总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提出来的。

鞠开



# 我送贺老总一匹“绿马”

● 陶汉章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

贺龙善战和善于相马都是天下闻名的，长征中红军队伍里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那是1935年在湘鄂川黔根据地，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以伏击手段，速战速决结束了有名的板栗园战斗。我带领着教导营的全体战士（学员）迅速打扫战场。

战斗已结束了，枪声已停，硝烟仍笼罩着方圆十几里地。一败涂地的伪军八十五师官兵，有的把军帽翻转来（帽子里子是白色的）不停地在手里摇，有的举枪投降，有的干脆跪地求饶。地上遍布着东歪西倒的枪支、迫击炮炮弹、水壶、饭包、防毒面具，还有血泊中的尸体……这时只见一匹惊马，在阵地中穿梭、奔跑、嘶叫，疯了似

地乱踢乱咬人。这匹马的主人就是被我红二、六军团击毙的八十五师师长谢彬。马失惊也许是因为主人不在了。

我即令几个大个子战士围上去，抓住马的“嚼口”狠狠地摔了它几下，这马却死死地咬住“嚼口”不松。想制服它还真不容易，后来大概是把牙齿给摔软了，马才站住不动了。

嘿！这匹马可真漂亮。一身雪白闪亮的长毛，高高昂起的头，宽厚的胸脯，一双尖尖的耳朵在那里不停地转动，无疑听力是非常灵敏的。4条又细又长的腿，跑起来跨度很大。一看就知道是一匹纯种阿拉伯马。从它那身雪白发光的毛上看，肯定是吃谷子的。

红二方面军打从贺老总指挥那儿起，到每个战士，没有不爱马的。我看到过，在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只要能弄到一个鸡蛋，贺老总总会把它塞到马嘴里。贺龙识马、爱马，见到好马他是一定要的。这一回，我心里打起了“小算盘”。我想：不报告给他，留着！这马我要了，马就放在教导营。那时我在教导营担任营长，也只不过18岁的小青年，有了这匹好马，心里格外高兴。白马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热闹，天天有干部、学员、战士来借马，骑它转几回。

有一次，一个叫张晋的干部要求骑马，我答应了，并告诉他要当心！张晋骑上马后，猛拉了一下缰绳，这下子马身猛地竖立起来，而后如箭般地飞奔，竟然能从小推车上空一跃而过，一口气跑出去十多里才停了下来。张晋不敢再骑了，是牵着它走回来的。真是一匹烈马！

不久，麻烦事来了，敌人朝我们轰炸，部队

需要转移。李达参谋长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白色的、红色的、发光的、目标大的一律不准跟司令部走，不能加入军队序列……”这头大白马是当时目标最大的东西。这可不好办了。开始，我牵着白马和部队保持一段距离，跟在后边走。后来我们要向江垭方向转移。长期这样下去怎么能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办法有了——染马！我立即到桑植县城街上染布店买了一小包叫“洋绿”的染料，回到驻地，我亲自动手，先用耙子给马梳理，再给马洗了一个干干净净的澡，马很舒服，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我和几个战士把“洋绿”一点点从马头刷到马尾巴。经太阳晒干以后，变成了一匹非常漂亮的“绿马”，油绿颜色，非常好看，又添了几分勇武之气，更加威风凛凛了。这一来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专门赶来看的人络绎不绝，还七嘴八舌地议论，都说：“这一辈子什么马都见过，就是还没有见过绿色的马……”奇闻传开了，“我们的营长陶汉章有匹绿色的马……”我心里想：这下可以加入行军序列了，说不定夹在队伍中间走，还可以从贺老总指挥的跟前“混过去”。我有意将马夹在队伍中间，和我拉开距离。

一天，我们队伍正在通过一座小木桥。突然，我发现贺老总正坐在桥头和人谈话，队伍都必须从他身边经过。不好了！我怀着侥幸心理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先从他身边溜了过去。刚走过离他几米的样子，只听到贺老总从我背后大喊一声：“陶汉章！”我立即转身，向他敬礼，忙问：

“总指挥有什么指示？”贺龙说：“不是什么指示啊，你这个人啊！缴了一匹马我看一眼都不行嘛！？”我心里想：坏了！坏了！他要我那匹马了。我赶快辩解：“不是的，马不好，毛病不少，是白色的，要是红的、黑的我就给你了。”贺龙笑着说：“好嘛！好嘛！马在哪里？牵来我看一眼就是了。”我立即向后跑了半里路，告诉小马夫快把马牵到总指挥那里。心想，这一回马是留不住了。当把马牵到贺龙面前，令人惊奇的是这马仰天长啸，似乎它已认出这就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军！贺龙非常识马，一眼看上了，用手拍了拍马的头部，对我说：“是你染的吧！办法倒多。是匹好马，我们换马吧！”随后他就告诉马夫大老李说：“把我那匹枣红马给陶汉章。”我当然高兴，总司令的枣红马也是一匹名马。我连忙跟着大老李去牵马。哪知到了那里，大老李就变卦了。他不肯给，并告诉我：“这匹枣红马在战斗中救过贺龙。”啊！原来是这样，是一匹功臣马。此时，我心想：别说是“换”，就是贺老总送给我，我也不能接受。大老李又对我说：“长征中为司令部驮物资是很重要的任务，我给你一匹骡子吧！它过去是拖迫击炮的，力气很大，一天能驮东西走百把里……”我对大老李说：“你别做我的思想工作了，功臣马我是决不能要的，那是老总的心爱之物。‘绿马’本就应该送给贺老总的，他比我们更需要。骡子我要了。”

（责任编辑 一尘）

## 《炎黄春秋》杂志社

### 读者服务部公告

我社读者服务部自1996年元月已由朝阳区金台西里2号迁至西城区天津街7号杂志社内办公，请读者按新址与我部联系。

本部全体人员根据杂志社关于学习邹韬奋办生活书店悉心为读者服务的指示精神，热诚地服务于读者，近期已开展以下业务：

1. 为读者邮寄本刊；
2. 向读者介绍新书并代为邮购；
3. 代读者寻购书刊。

《炎黄春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

# 万里征途生死情

● 易 雯 黄道强



陈文科老人回首当年(陆欲宣摄)

## (一)

1928年,18岁的陈文科在他的家乡湖北沔阳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次年,他所在的游击队被编到了贺龙的正规部队,在红三军军部当上了一名警卫员。1934年,被选到贺龙身边当勤务员。长征途中,部队在湘黔边的山区行进。一天,陈文科突然发现贺军长走路一瘸一拐,便低声问警卫员:“总指挥的脚什么时候受伤了?”

“总指挥的脚一到冬天就裂口、流血,脚一沾地更是疼得钻心,走路能不一跛一跛的?”

警卫员的话使陈文科暗暗责备自己的粗心大意,赶忙上前搀扶着贺龙,捱到宿营地,他赶忙烧了一盆热水给贺龙端过去。

“陈伢子”,贺龙拍着自己的挎包,说:“里面有个装凡士林的小盒,你给我找出来,我要治治这不争气的脚哪!”

陈文科从挎包里取出盒子递过去,贺龙用手挖了一点凡士林,抹在脚底的裂口处。陈文科这才看到那脚板

上的裂口足有一寸多长,鲜红的嫩肉裸露着。贺龙却没事人似的,一边与陈文科闲聊,一边一点点地把凡士林抹进裂口里,并递过来一盒火柴说:“陈伢,你帮我烧一下脚。”见陈文科一脸不解的样子,又说:“过来,陈伢,你用火柴将凡士林烧化,伤口就填平了,血不就流不出来了吗?”

“军长,用火烧露出来的肉,那会痛死人的。”陈文科急得不知所措。

贺龙划燃了一根火柴,自己去烧伤口,因为不顺手,几次都没烧到位置,反倒差点烧到了手。

陈文科见状,这才哆哆嗦嗦地划燃一根火柴,慢慢移近伤口,直到滋滋地作响。陈文科边烧边说:“军长,要是痛,那就别烧了吧?”

贺龙倒嘿嘿笑了起来:“陈伢,你打仗时还蛮勇敢的嘛,现在怎么婆婆妈妈的。”就这样,一根接着一根的烧,直到嫩肉发焦,贺龙才满意地说:“这下行了,蛮可以对付一阵子了。”说完,擦了擦满头的汗珠。

从此,帮贺龙烧伤口,成了陈文科的“专利”,隔段时间就得来一次。

## (二)

进入草地不久,陈文科病了,上吐下泻,没几天便不能走路了,情况十分危急。

贺龙的叔叔跟着贺龙参加了长征,大家都亲热地叫他“贺老太爷”。贺老太爷懂点中医,贺军长见陈文科病得奄奄一息,便将他交给他的叔叔,还一再叮嘱:“陈伢病得厉害,您老人家搞点草药给他治病,我们搞到药马上给您送来。”

就这样,贺老太爷整天陪着陈文科,到处给他采集中药,亲自熬药给他喝,贺军长有空还要来探望陈文科。

陈文科瘦得皮包骨,整天伏在马背上不想动弹。然而一天,这匹过分劳累的瘦马躺下后再也爬不起来,陈

文科抱着断了气的马的瘦腿哭了起来。

当时，总部的牲口已所剩无几。有的累死了，有的在断粮时被宰杀了，只剩下几匹驮文件包的马。许多首长的乘马也没有了，大家都在步行。

陈文科难过地对贺龙说：“总指挥，别管我了，我走不出草地的，我是个包袱，拖了大家的腿，不能再……”

贺军长打断陈文科的话，严肃地说：“说的么话，莫哭了，有我们在，就有你陈伢在，我们决不会丢下你的！”说着，拉过副官处长杜世新来，小声嘱咐了些什么。

不多一会儿，杜处长牵来了一匹马。大家又把陈文科扶上马背，继续前进。原来，这匹马是杜处长用来驮文件的，为了驮陈文科，文件只好分给同志们背着。

### (三)

长征路上，贺军长最关心最牵挂的要数任弼时政委了。当时，任弼时身患肺病，脸色蜡黄，形容枯槁。

行军途中，贺龙隔一阵子就停下来，问身旁的陈文科：“去看看，任政委到了吗？”停了一会儿，贺龙又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好政委啊！要不是任弼时同志带着六军团，带着密电码和电台，冲破敌人的封锁，来贵州同我们会合，你们想想嘛，我们就会成离群的孤雁了！大家要记住，尊重任弼时同志，照顾好他，这不只是个责任问题，还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哩！”

一天，陈文科发现任政委咳嗽得厉害，便报告了贺龙。贺龙马上命令司务长弄来一副担架。

可是，任弼时怎么也不愿躺在担架上，他说：“我能走，大家都很累，担架给重伤员预备着吧！”

贺龙三番五次地劝说，还找来关向应等人相帮，任政委才“寡不敌众”上了担架。贺龙仍不放心，一直跟着担架走了一里多路，一会儿前一会儿后，生怕抬着担架走险路有什么闪失。

贺龙常说：“我是个大老粗，十多岁就上了山，没学着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帮助，我贺龙有什么用？任政委、关副政委都是知识分子，我要好好向他们学着点呢！”

### (四)

贺龙酷爱下象棋，即使是长征途中休息时，也爱“车马炮，马萧萧”地杀上几盘。军部炊事员老辛是贺龙的棋友，他有一个12岁的儿子，大伙叫他“辛伢”，浑身透着股机灵劲儿，特别招人怜爱。每逢父亲与贺龙“交战”，辛伢便在一旁观战，时间久了，竟也记下几招儿，偶尔忍不住还要“指点江山”。

一次，贺龙的车马炮直逼老辛的帅府，眼看被逼上了山穷水尽的绝路，辛伢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老辛依计而行，不想竟扳成了平局。

贺龙本来就喜欢“小鬼”，见辛伢机灵可爱，更是宠爱有加。只要有较好的饭菜，总要陈文科到处找辛伢，实在找不到时，还要嘱咐给留上一份。

过草地时，老辛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在掩埋完老辛同志后，贺龙将泣不成声的辛伢搂在怀里，对警卫员说：“你们想办法给辛伢找一匹马，辛伢老子死了，你们都是他的战友和兄长，只要我们有一个不倒下去，就要把辛伢带出草地！”

以后，辛伢成了贺龙的“棋友”，偶尔还能赢上两局。

### (五)

漫漫长征路，最艰苦的是缺衣少粮，吃成了首要问题。贺龙军长总是以身作则，先人后己。

有一次，陈文科一位相好的同乡战士摸到军部找到陈文科：“陈伢，我实在饿得走不动了，你给我弄点吃的罢，不然，我走不出草地的。”陈文科为难地说：“你别以为我们在首长身边就能有吃的，告诉你吧，贺总指挥有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实在对不起，我这点干粮还得派大用场呢！”

这话，恰好被贺老总听到了，说：“陈伢，你把干粮给他吧！我们多找点野菜，可以将就一下嘛。”

那位战士接过干粮，眼泪夺眶而出。以后，那位战士逢人便说：“是贺军长捡回了我的一条命。”

还有一次，四师师长卢冬生到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汇报工作，不知道把干粮丢在什么地方了，急得卢师长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当时全军上下，从总指挥到战士，每人都有一个粮袋，饿了就吃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丢了粮袋等于丢了命根子啊！

“不行，我得回去把粮袋找回来！”说完，卢师长便朝回走。

贺龙军长一瞧，心急如焚。这满地烂草、臭水的，上哪去找？即使找到了，也无法下咽啊！他三步并作两步将卢师长拉了回来：“哎，卢师长，谁知道丢哪里去了，吃我的吧！”说着，便把自己的干粮递了过去。

自己吃了，总指挥就得挨饿啊！卢师长说什么也不肯收下这珍贵的干粮。贺龙说：“你年轻，饭量大，不吃东西是走不出草地的。我们这里人多，大家凑一点，便能对付过去。”

贺龙把干粮给了卢师长，勤务班的同志深感不安，大家七拼八凑了一份给贺军长。

(责任编辑 王 恂)

# 莫文骅老将军的两件珍藏品

● 李春宇

一枚五分重的金戒指，一块磨损得已不见光泽、失去纹路的银元，对于现今很多人而言，也许微不足道，然而，在原装甲兵政治委员莫文骅将军看来，却是无以取代的珍宝。因为它们记载着这位老将军与自己的亲密战友间肝胆相照、唇齿相依的深情厚意，记载着这位老将军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一片丹心。

1929年12月，莫文骅参加了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军部中尉参谋。就是在这次火热的革命斗争中，莫文骅认识了与他年龄相仿，勇敢、坚定，而又英俊、活泼的革命战友——营政治教导员杨英上尉。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热望与期待，有着共同的苦辣与甘甜，从而结下了深挚的战友情。为了纪念他们的友谊，1930年秋，杨英把自己珍藏的一枚一钱重的金戒指拿出来，在广西果化县，分打成两个，每个五分，同莫文骅一人戴一个。1933年，莫文骅与杨英同在红七军五十八团工作，杨英任团政委，莫文骅任六连连长。攻打江西赣州城的前夜，这两个亲密战友住在一起。想到第二天就要开始的这一重大战役，他们都激动得睡不着觉。莫文骅对杨英说：“明天这场攻坚战，六连是先锋连，我任先锋连连长，牺牲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我牺牲了，你能活到革命胜利，一定到我家去一趟，告诉我的父母，我是怎样牺牲的。”杨英也向莫文骅表达了同样的心愿，并告诉他，自己在湖南宝庆县的家中，有老母亲和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的未婚妻。

第二天，战斗打响。红七军攻打赣州北门，莫文骅带领的先锋连担任突击队。随着爆破声

的巨响，突击队冒着硝烟和尘土冲了上去，然而面临的竟然是没有炸毁的突兀而立的城墙，战士们迅速搭成人梯，往城墙上爬。敌人则拼命地阻击，打开的缺口，很快又被敌人封锁了，冲到城墙上的战士几乎全部伤亡。此时，焦急的莫文骅却很冷静，他知道整个部队都在期待着他们这第一步的成功，而他们此刻唯一的选择是冲上去。就在他带领战士继续冲上去时，他只觉得周身一麻便摔倒了，原来他的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穿。杨英带领部队焦急地从后面赶了上来，他扶起莫文骅，来不及多说什么，便径直往前冲去。

莫文骅终因身体不支倒在地上，卫生员用布条加碘酒为莫文骅包扎好伤口，抬上担架向后撤。由于莫文骅是重伤，担架员的步子很慢，竟被后面的一个担架跟上来，催促着走得快一些。前面抬担架的同志回答说：“这是个重伤员，是六连长。”后边担架上的人却笑着说：“哦，是你呀！”原来说话的伤员就是莫文骅的亲密战友杨英。他是继莫文骅之后率队爬城冲锋而负伤的。

就在这次战斗之后，杨英调走了，莫文骅和杨英失去了联系。直到1935年1月，莫文骅在遵义时，才最终打听到杨英同志的消息，这位当时身为江西二十四师政治委员的杨英，红军长征时被留在江西坚持斗争，他已经为革命而牺牲了，时年仅仅24岁。

戎马倥偬，莫文骅从未忘记赣州之役前夜杨英的一席话。解放湖南时，莫文骅率领部队到了宝庆，便到处打听杨英的家庭，打听杨英母

亲和未婚妻的下落，解放后也曾派人去找，但始终不得音讯。那一枚小小的五分重的金戒指，就成了莫老追惜战友英魂时的唯一的慰藉。80年代，莫文骅将军把这枚珍贵的戒指捐献给了广西百色革命纪念馆，至今一直陈列在那里。

赣州之役莫文骅负伤后，组织上曾发给他32块银元，让他补充营养，悉心养伤。莫文骅急于重返前线，勤务员刘应祺每天花一个银元买甲鱼和鸡来炖汤，几十天过去，左腿的伤口刚刚愈合，他便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之中。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前担任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莫文骅，到延安后工作有了变动；勤务员也换了当勤务员高登云又要调走时，临行前对莫文骅说：“前一个勤务员小刘（即刘应祺）走的时候，留给我两块现洋，说是您受伤后组织上发的，剩下来两块没花完。”说着，小高拿出银元来让莫文骅看。莫文骅没想到，时间已过去了几年，居然还有两块银元，心头有不尽感慨。回想起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栉风沐雨，衣食无着，竟然留下了这两块银元。莫文骅掂掂这两块在当时就颇为稀少的、印有孙中山头像的开国纪念银元，笑着说：“来！小高，咱们俩你一块，我一块。”

1945年，“七大”之后，党派莫文骅去南下支队任副政治委员，到广东去打游击。那时莫文骅已有了牵挂，妻子杨枫和一个五岁的孩子不能随军，自己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而自己留给妻子孩子的仅有一块银元和一枚金戒指，这么么行呢？于是他找到了八路军供给部长叶季壮，用一个半新

不旧的皮箱又兑换了26块银元，一并留给了妻子和孩子。恰巧，“八·一五”日本投降，莫文骅受命转向东北。杨枫得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带上孩子，走了七个月的“千里寻夫”路，到达本溪湖。

此时，杨枫所带行囊中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但是忍饥受冻，1933年莫文骅养伤时剩下的那块银元，却一直珍藏在身上。

几年前，莫老已将这一块现洋送给了自己的孙子莫宇。这块银元虽已不见光泽，然而永远在历史的篇章上闪耀光芒；它虽已显得陈旧，然而永远在人民质朴的心灵上飘散芬芳。它激励着莫老的子孙，也激励着所有的后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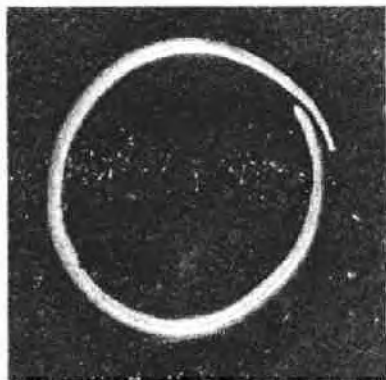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洛松）

## 邮购启事

时至岁末，各地邮局报刊征订工作已告一段落，如果读者因故漏订本刊，可直接向本社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定价4元，预订一季度、半年、全年均可。免费邮寄。

请您汇款时务必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书写清楚，并在简要附言栏中写明所购期号。

《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献给革命博物馆的戒指（放大）



珍藏的银元（正面）



银元的反面



# 吴子熊的玻璃雕刻艺术令世界惊叹

● 陈明红 金正传

1996年9月,我国第一家玻璃艺术博物馆——吴子熊玻璃博物馆在浙江椒江破土兴建。

吴子熊,这位世界闻名的玻璃雕刻大师,37载以砂轮为笔,与玻璃作伴,用他那双奇特的手,那双魔术师般的手,创造出一件件流光溢彩、令人生叹的玻璃雕刻艺术精品,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国的精灵”、“中国一绝”、“东方奇葩”。他刻的凤尾酒杯,被用到周恩来总理宴请尼克松总统的宴会上,还两次为邓小平刻制彩色玻璃瓶。

## 他的作品飞出了浙江,进入了人民大会堂

1986年3月。德国布吕尔市“幻想世界”中国城。玻璃雕刻大师吴子熊,正在给欧洲人民现场表演他的砂轮绝技。

他左手一按按钮,砂轮飞速地转了起来,吴子熊右手拿着一只高脚玻璃杯靠近砂轮,“嗤”、“嗤”的声音不绝于耳,不一会,晶亮透明的杯面上出现了两只栩栩如生的对虾,长长的虾须回丝一百八十度,相对嬉戏,情趣盎然,旁边还有题字和落款。整个过程只用了1分钟37秒,不到100秒钟。

人群沸腾了,蓝眼睛、黄头发的望着这位“中国精灵”,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速度如此之快,画面如此美丽,神了!

一位携妻旅游的美国跳水运动员,挤到吴子熊面前与翻译哇啦哇啦聊了一通。原来这对夫妇到“幻想世界”已三天了,没有挑到一件合适的新婚礼品。吴子熊当即为他们特意制作了一幅“鸳鸯戏水”,这位新婚的妻子高兴地说:“太美了,这简直不可思议。”

献艺的第三天下午,一位德国妇人在砂轮机前徘徊良久,她叽叽喳喳地向那些外国人指着机器。正巧定居联邦德国已20年的华侨艺术家胡天池在场,他低声地对吴子熊说:“她怀疑你的机器中装有电脑控制设备,不然的话你不会刻得这么快,你打开机器让她看看。”吴子熊笑了笑,让周围人群走近机前仔细观看,并请这位妇

人当场点题,那妇人说:“请刻朵矢车菊(德国国花)吧!”

吴子熊二话没说,拿起一只啤酒杯在旋轮上左右、上下移动,不出三分钟,一朵呈大理石色的矢车菊“浮”在了杯壁上,那妇人瞪着眼睛看着,似乎还有疑虑。胡天池让吴子熊打开机壳给她看,妇人仔细查看后,疑虑顿消,她对围观者大声嚷道:“比电脑还厉害。”

难怪澳大利亚一家报纸对吴子熊的评价:“他的作品没有宝石,但是像宝石一样闪光;没有流水,但象流水一样清新。”

1978年6月,人民大会堂进行装修。吴子熊接到浙江省委的电话,要他为人民大会堂大厅西厢壁上设计两盏雕花宫灯和六块刻花玻璃,还要求不能在玻璃外露出灯管。

吴子熊接到任务后,既激动又犯愁:这项工程是多么崇高和神圣,担子太重,责任太大;愁的是,他从没设计制作过这些东西,怕有闪失。吴子熊经过八天八夜的思索,终于想到了用喷砂把平玻璃磨成毛玻璃,然后用凸浮雕、精刻、细磨、抛光等综合技巧,把灯管隐藏了起来,攻破了灯管外露的难题。吴子熊把这个试验品送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总体设计顾问邓白教授那里,在他精心辅导下,吴子熊又经过二十多天的昼夜加班终于赶制完成。当宫灯的亮光和大厅整个庄重、华丽的柔光融为一体时,吴子熊激动得连一句话都没敢说出来。邓白教授高兴地说:“小吴呀,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视觉效果呀!”

对于中国来讲,玻璃雕刻属于舶来品,最早产生在意大利和捷克等欧洲国家,他们一直在世界玻璃工艺品市场上独领风骚。吴子熊是中国第一个以玻璃雕刻艺术闻名世界的人。现在全世界有八十多个国家存有他的作品。从1986年以来,吴子熊的足迹留在了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土地上。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位轰动世界玻璃工艺界的雕刻大师,曾是个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流浪儿呢!

## 他在偏僻山村度过了童年

1942年秋,浙江省仙居县一户贫穷农家里,一个

男孩呱呱坠地。由于母亲的奶水不够，小子熊经常挨饿，不到半周岁就开始喝稀粥。尤为不幸的是，小子熊长到两岁，长期的贫穷、饥饿和疾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失去了母爱的小子熊，饥一顿饱一顿地过着他那艰难的童年岁月。

到了上学的年龄，深谙知识重要性的父亲不惜自己挨饿，省出仅有的血汗钱，让小子熊和小同伴们一样，走进了课堂。那时，父亲既要维持家庭，又要供小子熊上学，只有靠卖苦力挣点血汗钱。懂事的小子熊体会到父亲的难处，从不叫一声苦，反而更认真学习，每次的考试成绩在班上总是前几名。

真可谓“祸不单行”，就在小子熊 11 岁那年，父亲也一病不起，撒手离开了人间。

失去双亲的子熊，在无奈中结束了自己的学习生涯。为了糊口，他先是以乞讨为生，后来靠捡破烂、卖报纸、做苦工来度日。年幼的子熊深深体味到了人生境遇的悲凉。

1955 年 1 月 18 日，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攻克大陈岛。那时，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的号召。吴子熊无事可做，便跟随部队，跨江过海，登上了大陈。由于年龄太小，他没能如愿穿上军装，而是成了驻大陈部队军人浴室的一名招待员，天天与擦背、扫地、倒痰盂打交道。

然而，吴子熊很满足，因为是在他最艰难困苦的时候，部队这个大家庭收留了他，给了他人世间的温馨，让他感受到以前从没有过的温暖。大概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以后的日子对部队充满感情的原因吧！

1990 年 6 月，“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导演专程到浙江台州，赶在“八一”建军节前摄制一部反映大陈岛驻军风貌的纪录影片。经过近一个月的了解，影片的主角选中了吴子熊。正是因为吴子熊曾在大陈岛部队干过三年杂工，在他以后的生涯中情系大陈驻军，吴子熊被搬上了银幕，在影片《留在大海里的记忆》中给全国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们为吴子熊的成功叫好，为吴子熊的勤奋感动，更为吴子熊那曲折的人生道路和他不屈的奋斗所惊叹。

## “一切事业的成功者都属于为成功付出代价的人”

50 年代末，吴子熊这位“编外士兵”，因为大陈岛部队精简整编，带着对部队对大海的眷恋，离开了大陈岛，在部队的帮助下，安排到浙江海门玻璃制品厂，当上了一名普通的玻璃刻花工人。

玻璃刻花，以玻璃为“纸”，以连续转动的砂轮为“笔”，依靠娴熟的技艺在玻璃上绘画和展示书法功力。

这对于只读过四年小学的吴子熊，一切都是陌生的。在这之前，他甚至连玻璃刻花这个词也没听说过。

三个月后，厂里派他到大连玻璃厂学习。当他看到师傅们刻的画面和那熟练而独特的技术动作时，吴子熊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在普通的玻璃上，经过一双双巧手“绘”制，竟会如此绚丽夺目，光彩照人，充盈透明而纯洁的美感。吴子熊深深陶醉于这独特的“砂轮”艺术的同时，也在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学会刻花，成为一名出色的刻花工人。

这正是吴子熊的秉性，就像当初决定学习绘画一样。在大陈岛的三年里，从闭塞农村走出来的吴子熊，初见海岛那壮丽的景色，曾发誓把它们画下来。但苦于自己知识太少，又缺少老师辅导，吴子熊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直到他离开大陈那天，他从没有停止过。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当初不离开海岛，吴子熊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这也算是他最初的艺术之缘。

在大连学习的三个月里，他虚心向师傅们求教，挤出休息时间在砂轮上“死磨硬缠”。由于他文化基础太差，进步却很微小。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是一只笨鸟，而且非常笨，我不但要比别人飞得早，飞得多，更要飞得远。”

玻璃是一种艺术表现力很强的材料，通过砂轮机深刻浅磨、抛光蒙砂等技术手段，产生折光、聚光、反光、漫反射等独特的艺术效果。“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用来比喻玻璃雕刻一点也不过分。次次落笔都必须恰到好处，这些效果才能得到体现，这就需要娴熟的技巧。在大连的三个月里，吴子熊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虚心学习，在砂轮机旁一坐就到深夜。他的手腕肿了，手上满是血口子，皮掉了一块又一块。三个月时间结束了，吴子熊虽然黑了瘦了，但从此走上了玻璃雕刻的艺术道路，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没有较高的文学、美学、绘画书法等知识作基础，刻出来的作品将永远是庸品，没有丝毫欣赏和美学价值。”只读过四年书的吴子熊深深认识到这一点。玻璃雕刻是一门苛刻的艺术，除了技巧外，制作者必须对布局胸有成竹，做到落笔成章，一笔失败都会造成一部作品的报废，不像绘画可以更改。同时由于砂轮转动非常快，每分钟在 300—5000 圈，更需要毫不犹豫，不能有丝毫误差，这是文化修养和艺术素质的综合反映。

从大连回到浙江的几年里，吴子熊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领略其意境；学习了绘画和书法，领悟其笔法；为寻求刻花的节奏感，他又学会了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揣摩其韵律。为了这份事业，吴子熊付出的心血确实让常人难以想象。

为了在玻璃杯上雕刻天鹅，吴子熊阅读了大量有关天鹅的书籍，临摹了许多绘画作品，还找三名猎人了解天鹅飞行休息时的身体形态特点。甚至自己跑到动物园里和天鹅打了三天交道。作品制作完工后，他又专程来到浙江美术学院，找工艺系主任邓白教授请教。

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使吴子熊的玻璃雕刻艺术取得不断的进步，更难能可贵的是吴子熊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画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如果能在玻璃上体现出国画的特点，将会使这门古老的艺术更具活力，也会给玻璃雕刻艺术增添新的内容。吴子熊经过细心研究，选用软硬粗细等不同质地材料制出多种砂轮，并在刀道的轻重、刀面的深浅方面做了无数次试验，又根据玻璃的不同性质，创造了“凸浮雕”、“蒙砂”等四种雕刻技巧，将中国画的点墨、侧笔、勾线等很好地移植过来，产生了华丽的视觉效果和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风格与魅力。

## “我来美国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的玻璃雕刻艺术永远属于中国人民”

1988年9月，吴子熊赴澳大利亚表演。

豪华的展示大厅里，四枝漆黑的粗大毛竹支撑起一顶茅棚，边上放着一把竹梯、一盆树景和四只箩筐。原始的材料搭成原始的作坊，标志着古老和落后。大厅里的一幅广告更为显眼：一个东方人坐在竹棚下磨着玻璃，并用汉英两种文字写着“中国玻璃雕刻大师吴子熊先生艺术表演”。吴子熊的心深深被这讽刺性的布置刺痛了：难道这茅棚代表了中国式操作间的“民族特色”？难道在外国人眼中，中国真的如此落后与简陋？吴子熊认为这是污辱，不仅是对自己的污辱，更是对祖国和民族的污辱。

“考林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我拒绝在这茅棚里表演，中国的工作间绝不是这个样子。”祖国荣誉和民族尊严，使吴子熊义愤填膺，面色愠怒严峻。

“哦……”代理商考林先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来自中国的吴子熊会如此生气。“那么您的意思是……”

“重新配备灯光，另设工作台、广告画。”吴子熊斩钉截铁地回答。

四个月後，国家有关部门为此发出通报，表扬了吴子熊为捍卫民族尊严所作出的不屈抗争。

1984年，吴子熊还是海门玻璃厂的一名刻花技师。那时，中越边境战火未息，边防军民日复一日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领土。有着三年“兵”龄的吴子熊，

用满腔热忱精心雕刻了四只酒杯，委托驻浙江某部转寄给驻守老山、者阴山的边防部队指战员。这四只酒杯由特殊的玻璃制成，上面分别雕刻着红梅、雄鹰、青松、翠竹和“红梅飘香透国魂，威震中华破敌胆；坚如青松志不移，胸怀壮烈守国门”四句诗，这不仅代表了吴子熊自己，也代表了全厂职工和后方广大人民对边防官兵的问候和致意。

吴子熊出名了，但没有忘记曾给他温暖的部队，更没忘记培养他、给予他艺术生命的祖国和人民。

“中国人神了”。《纽约时报》于1993年6月以此为题，详细报道了吴子熊在世界著名的贾维茨展览中心表演的绝技。那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赴美。在美国的一个星期里，吴子熊以他高超的技艺赢得了美国人的称赞。展览中心的工作人员看了他的表演和作品后，惊呼“中国人太神了，简直不可思议”。一位名叫兰斯顿的美国人在留言簿上写道：“吴大师，您的艺术太美了，祝您在纽约愉快！”

美国的一些公司和企业闻讯后，都想挖走这位神奇的中国人。吴子熊白天在展览厅献艺，十多家公司的代表在展览厅等候；晚上他们又追踪到吴子熊下榻的旅馆。面对高薪，吴子熊丝毫没有动心：“我来美国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的玻璃雕刻艺术永远属于中国人民。”

是的，他的艺术属于中国人民。从1986年以来，吴子熊先后访问了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事不知碰到多少回，吴子熊始终没有被金钱和生活的安逸所诱惑。

1988年，他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以艺术家命名的吴子熊玻璃雕刻艺术实业公司。今年9月，在浙江省委的支持下，又在浙江椒江动土兴建全国第一家玻璃雕刻艺术馆，用来珍藏展示他多年收藏和精心创作的三百多件珍品。

有人说，吴子熊早该成为“千万富翁”了。是的，他去德国“幻想世界”中国城，一次就赚了近二十万美元，但回国后全部交给了国家。谁也不会相信，今年动土兴建艺术馆时，他节省下的几个钱简直是杯水车薪，浙江省财政拨款征地，又借了台州市财经部门的低息贷款，才勉强凑足了建筑所需经费。

吴子熊的玻璃雕刻技艺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单说这项，也算是一笔永久的财富，是用钱买不到的。十多年来，为让更多人掌握了解这门艺术，吴子熊已亲手带出了一百三十多名徒弟。他的付出是无私的，他为的是这不朽的艺术，为的是弘扬中华民族那博大精深的文化。

(责任编辑 未名)

# 靖国神社： 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 赵友慈

8月15日，在日本应是象征和平、誓不言战的日子。因为1945年的这一天，不仅一些国家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而且日本人民也从战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可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每到8月15日，设于东京的靖国神社总是麇集着一批批右翼分子，他们舞战旗，举军刀，耀武扬威；还有众多的国会议员、内阁大臣，乃至一国首相也去那里顶礼膜拜，祭悼亡灵。今年不同的是，这个场面提前到来了：7月29日，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在登记簿上签到。

靖国神社究竟是什么场所？日本一些人为什么去那里参拜，这一行动意味着什么？

## 一、靖国神社供奉着 246 万为天皇战死的亡灵，其中竟有 14 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重刑的甲级战犯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它的前身是1862年（文久二年）设立的招魂场。1869年（明治二年）改称东京招魂社，1879年（明治十二年）始称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是国家级的神社，称“一国之祭庙”。道、府、县、村的护国神社，实际是它的下属地方分社，最盛时期，全国有十余万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国外占领区也建立了不少神社，如台湾神宫、朝鲜神宫、昭南神社（在新加坡）等。

靖国神社在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前，享受皇室的特殊待遇，由陆军省、海军省直接管辖，祭祀仪式也由这两个省负责。日本战败后，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1946年将其改为民间的宗教法人，不再由国家掌管，但有政府参与的祭祀活动依然进行。

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为天皇战死的246万多亡灵。其中除一万四千多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的外，其余都是在对外侵略扩张战争中战死的。具体情况如下：

“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中战死的：13619名；

“出兵台湾”（即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我国台湾）等战死的：1130名；

“义和团事件”（即我国的义和团运动）中战死的：1256名；

日俄战争和镇压朝鲜战死的：88429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出兵西伯利亚等战死的：4850名；

“济南事变”（即日本出兵我国济南）中战死的：185名；

“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17161名；

“日中战争”（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战死的：188196名；

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2123651名。

令人愤慨的，1978年秋，一些人竟偷偷地把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重刑的14

名甲级战犯亡灵的牌位塞进了靖国神社。他们把这些战犯称作被“联合国单方面处死”的“所谓战犯”，他们称这些人是“昭和殉难者”。

这14名甲级战犯中有：

**东条英机** 其父东条英教是发动和指挥中日甲午战争的头子。东条英机1935年到我国东北，先后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和关东军参谋长，疯狂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七七”事变后，率东条兵团大肆侵占我国领土。1940年后，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军需大臣、参谋总长、内阁首相等，竭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1944年7月，因军事上连遭失败被迫下台。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广田弘毅** 1933年起任外务大臣，曾提出扩大对华侵略的“广田三原则”。1936年至1937年任首相。是发动“七七”事变、扩大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日本投降后，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土肥原贤二** 1931年任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亲赴天津，将溥仪诱胁到长春。1935年策动华北事变，签订了侵犯中国主权的《秦土协定》。1938年在上海主持设立“土肥原机关”，加紧对中国的特务活动。此后，曾任第五军司令官、航空总监、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等。日本投降后，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板垣征四郎** 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参与策划和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后，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后，任第五师团师团长，指挥对华北的侵略战争。1938年后，任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朝鲜日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等。日本投降后，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木村兵太郎** 1939年后，任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缅甸方面军司令官等。日本投降后，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松井石根** 1933年任驻台湾军司令官，“七七”事变后，任上海日军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日本投降

后，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武藤章** 1937年任日军参谋本部课长，积极主张进攻中国。后任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1941年任近卫师团师团长，率军侵占印度尼西亚。任内杀害大批战俘和平居民。日本投降后，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 二、靖国神社既是为天皇战死的人招魂的场所，又是驱使更多的日本人为天皇尽忠、制造新的亡灵的地方

《靖国神社志》写道：“遵照皇上睿虑，建立神社是为了安抚忠魂，永远供奉，使忠节益彰。”所谓“忠魂”，就是为天皇战死的亡灵。

“安抚忠魂”并不是供奉他们的目的。其目的是什么呢？日本战败前“修身”教科书说的很清楚：“我们要铭记天皇陛下的厚恩，向被供奉在神社的人们学习，为天皇和国家尽忠。”简言之，就是要生者向死者学习：为天皇去送死。

为天皇“尽忠”，是日本宣扬军国主义、鼓吹“武运长久”、进行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这被称作日本的国民精神，又称“大和魂”。由于当政者、宣传者说，“大和魂”永远坐镇靖国神社，所以靖国神社就成了统辖日本国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有了它的存在，就使得国民对战争的牺牲者不仅不感到悲伤和痛苦，反而感



东京靖国神社大殿

到光荣,并引以为自豪。靖国神社成立一百多年来一直发挥着这种作用,到现在也未改变。

日本于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国民为天皇效力乃天经地义,为天皇尽忠则无尚光荣。正如美国出版的《“大日本帝国”的研究》一书中所说:“只要是日本人,就要理所当然地对天皇赤胆忠诚,‘以慰圣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天皇就是自己之所以能活在人世的依靠,又是一旦需要时不惜粉身碎骨的动力源泉。”

日本天皇及其支持者,正是利用天皇的这种绝对“权威”和“大和魂”永镇的靖国神社,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也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战争需要“炮灰”的时候,天皇便频繁地去靖国神社参拜(称作“亲拜”)。下面是日本近代三世天皇“亲拜”次数不断增加的情况:

明治时代 45 年间,睦仁天皇“亲拜”七次,平均七年一次;大正时代 15 年间,嘉仁天皇“亲拜”三次,平均五年一次;昭和时代从 1926 年至 1945 年 20 年间,裕仁天皇“亲拜”20 次,平均每年一次。

随着天皇日趋频繁的“亲拜”,靖国神社里的亡灵也迅猛增加。人们说,天皇的“亲拜”是激发国民军国主义的一种表演。下面是日本三个时代靖国神社供奉亡灵的数字:

明治年间(至 1912 年):118472 名

大正末期(至 1926 年):123355 名

昭和十六年(1941 年):223789 名

昭和二十一年(1946 年):约 246 万名

下面从昭和时代裕仁天皇的“亲拜”,看与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的关系:裕仁第一次“亲拜”是 1929 年 4 月 26 日,是供奉出兵山东(即攻占我国济南)战死者的临时大祭上。第二次“亲拜”是 1932 年 4 月 26 日,是供奉“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和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战死者的临时大祭上。第三次“亲拜”是 1933 年 4 月 26 日,供奉者与第二次同。1937 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从 1938 年起,每年春、秋两季的临时大祭,裕仁都去“亲拜”。日本投降后,1945 年 11 月 20 日,他还去靖国神社“亲拜”过一次。

### 三、靖国神社的建筑、设施、陈列无不反映了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象征

靖国神社大门外左右两侧各有一座高十余米的石塔。这是日本经济界的一个首领为“追慕”“尽忠报国”之士于 1935 年捐献的。每座石塔的塔座上各有八面青铜板制作的浮雕,其中除少数几面,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侵略中国、朝鲜的内容,为它的侵略扩张歌功颂德。如:日军侵占台湾、日军炮轰沈阳城、日军攻占长城、日军轰炸苏州,等等。

靖国神社正殿前有一座高大的木制牌坊,它是用中国台湾阿里山的树木建成的。

靖国神社“宝物遗品馆”有两扇门板也作为“宝物”陈列。它是日本侵占台湾时,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台北附近驻扎时当作床板使用过的。展出的“宝物”中还有:在中国“北海湾敌前登陆图”、“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军人,以及日军进攻南京炸毁城门、首先登上南京中华门的日军工兵等。

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是日本国立军事博物馆,陈列着日本历代的武器装备和在对外侵略扩张战争中缴获的军用品,还陈列着写有“武运长久”的军旗、战刀及阵亡军人的遗像、遗物等。

上述情况说明,靖国神社的建筑、设施、陈列是从物质方面宣扬军国主义,鼓吹“武士道”精神,为侵略扩张战争唱赞歌。

### 四、日本首相以公职身分参拜靖国神社反映了政府的政治态度,日本政治右倾化日趋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有所收敛。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70 年代以来,这种活动再度复活。1975 年,内阁首相三木武夫以“私人身分”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战后参拜的第一个首相。1985 年,中曾根康弘公然以“内阁总理



大臣”的名义去靖国神社参拜，激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此后十年，历届首相对参拜靖国神社均采取慎重态度，再未参拜。在今天，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检验日本政要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态度的试金石。

桥本龙太郎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目张胆地以“总理大臣”的身分参拜靖国神社，这绝非偶然，也不寻常。他任首相之前，每年都去参拜，平均每年参拜三次。去年他是以“通产相”身分参拜的。现在他作为政府首脑这样做，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政治态度和基本政策走向，这也是日本政治右倾化日趋明显的一个例证。

日本政治日趋右倾有大量事实为证，下面仅是近年来的一些事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否认过去侵略战争的历史。由桥本龙太郎任会长的“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竭力反对国会通过“谢罪式的不战决议”，要求国会的决议不能使用“侵略”、“领土扩张”、“殖民统治”、“反省”等词句，声称避免“使战后被歪曲的历史法律化”。由桥本等 105 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写道：“满洲不是中国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原法务相奥野诚亮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

（二）强占领土的野心更加露骨。今年 9 月，自民党把对我国的钓鱼岛和对其他国家的领土主张写入国会议员选举公约。日本政府对一些右翼团体在我国钓鱼岛上建立非法标记和设施，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今年 10 月 1 日，桥本龙太郎妄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

（三）增强军事实力，要做军事大国。日本的军费连年剧增，1995 至 1996 年度高达 502 亿美元，仅低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是我国该年度军费的 1.5 倍。日本的军队名义上是“自卫队”，实际上已是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为数不多的强军。今年以来，日本陆上自卫队派遣国产最新式的坦克到美国陆军基地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航空自卫队携带地

对空导弹和运输机，到美国空军基地与美、英、加拿大等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海上自卫队也同他国进行联合训练，包括防空战训练和反潜战训练。

（四）重新构筑日美安全体制，增强“抗衡中国”的力量。现任官房长官梶山静说：“在日本美军的的存在至关重要。现在，我把日美安全保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日美签订《安全保障共同宣言》时，日本自卫队和政界一些人士扬言，要为中国 20 年后成为不稳定因素作准备，并从现在就和美国携手，保持“抗衡中国”的力量。今年 10 月 27 日，桥本龙太郎则说：必须“致力于充实和运用国防力量”，因为日本周围地区“存在着种种不安定因素”。

## 五、日本必须正确认识那场侵略战争，真正认罪，诚心反省，才能取信于亚洲人民，走和平发展之路

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等逆行遭到日本人民的反对和谴责。许多党派、团体和人士，批判桥本的行为是为战争罪犯扬幡招魂，是宣扬军国主义，是美化侵略战争。他们指出，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向海外派兵及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正在使日本一步步丧失亚洲国家的信任。他们提出了“追究加害者的责任，与亚洲各国共生”的口号。

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严正指出：靖国神社里祭祀着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头目的亡灵，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历来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及政府领导人前往参拜。桥本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应当真正反省过去那段侵略战争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朝鲜、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界人士、社会舆论也发表声明和评论，尖锐指出：桥本的行为是向亚洲人民示威，向国际社会挑战，也是他反动政治心迹的大暴露。

（责任编辑 萧 徐）

每当我拜读国内有些报刊上载有写谢冰莹的有关文章时，总会引起我对她的深深思念。但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些文章里不见写有她在闽西时期的这段重要经历，有的也只是一笔带过。恰恰在1933年闽西时期，我和谢冰莹朝夕相处，交往有半年之久，她有些感人的事迹，值得一写。

——那年我还是一个不满18足岁的傻小子。春节后，接到我姐姐从闽西龙岩寄来的信和路费，叫我到龙岩去，将给我找个工作做做。我便离开郑州父母身边，只身上路，不远千里，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由十九路军接管的原属我中央苏区老根据地的闽西龙岩。

当我一跨进姐姐和姐夫的住所——一座逃亡地主留下来的弹痕累累的破洋楼下的所谓饭厅，恰逢有谢冰莹在座，小聚晚餐。在座的客人们，还有几位头面人物。据事后得知，他们有：徐名鸿（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周力行（即周士第，十九路军独立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是贺龙的参谋长）、李盛宗（十九路军六十师副师长），以及傅柏翠、刘侠仁等（均“闽西善后委员会”委员）。姐夫陈小航则是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兼“闽西善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现在叫我这个刚刚走出高中校门的一介书生“敬陪末座”，那简直是如坐针毡，片刻难熬。反观谢冰莹相处在他们中间，显得雍容大度，游刃有余，风趣幽默，且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使我暗暗敬佩不已。我想这可能是由于她在北伐军中当兵时，为了写作采访素材的需要，多走访一些军政领导人物而养成了这种生活习惯的原因吧。这时她已穿起了十九路军的军装，短发短装，更显得英姿飒爽，热情奔放，依然保持着一个风华正茂青年女兵的气概，令人羡慕。

——我到龙岩不久，即被安排在办公厅以谢冰莹为科长的宣传科里当一名科员。从此，谢冰莹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了，更是我初进社会的启蒙恩师。这一天，她像亲姐般地领着我这个小弟弟走进委员会的办公厅，我怯生生地跟在她后面也不敢东张西望。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坐下后，谢冰莹热情地、轻声地首先将办公厅里的主要领导人介绍给我听：“喏，你姐夫就是这

# 遥念

## 谢冰莹

● 倪 锋

个办公厅的主任，和你姐夫面对面坐的正在批示公文的那个军官，就是六十师师长沈光汉，他是代蔡廷锴军长（兼任“闽西善后委员会”主任委员）坐镇办公厅代拆代行的。”“噢”。我懵懵懂懂地答道。

我上岗的第一课，就是誊写谢冰莹编辑起草的小学各年级教科书的课文。然后她拿到印刷厂去付印，并亲自作校对。她工作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敢说敢做，无所畏惧。她在编辑教科书课文时，曾多次流露出—个观点：“还是苏区徐特立的施教方针对头，值得借鉴”。实际上她已巧妙地“借鉴”了。但这也真够大胆了。幸而由于她的知名度和有较好的上层关系，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我们感到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委员会每星期一要惯例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集会。在纪念周上跟着主持人逐句朗读“总理遗嘱”倒也无所谓，最怕的是唱国民党党歌。一宣布唱“党歌”时，我和谢冰莹两个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溜到最后—排，只动嘴皮不出声。原来，我们互不暴露反帝反蒋的共同信念，尽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

——有儒将之风的六十师副师长李盛宗，他常爱到我们住宿的这座破洋楼来走走，或找我姐夫和谢冰莹谈谈。其间，这位副师长曾两次邀请我骑马打猎。原来是谢冰莹有意拉我出来作陪的。我只好舍命陪君子，拿出骑虎的勇气，咬着牙跨上从未骑过马的马背。渐渐地，跨

裆酸痛起来了，也忍着酸痛骑下去。却不料通过这两次苦苦作陪，竟然“因陪得福”。1940年春的一个夜间，我在参加豫东战役时，跟随一个骑兵团，突然袭击敌占区一座铁路桥，并炸桥成功。在这次战斗中，我过去所练的骑马大大地派上了用场。多亏谢冰莹当初强拉我出来骑马作陪，给我一个锻炼骑马的机会，从而获得了这次杀敌报国的良机。

——中秋节过后，谢冰莹从厦门大学兼代一门文学课，匆匆返回龙岩，正忙于宣传科本身业务之际，突然接到一个举办文娱晚会的紧急任务（大概是为了庆祝“双十节”）。于是，谢冰莹紧张地筹备起来。其中京剧、粤剧可以从外界邀请，唯独话剧要自己解决。可是，办公厅里几个年轻人都难为情，不肯担任角色。在此为难之际，只听谢冰莹快人快语爽朗一笑问我：“雪林（我当时的用名）你有勇气么？我们两个人上”。“上就上！”我答。“爽气，这是我们宣传科的任务。”她又说：“这样吧，你马上写个独幕短剧，只要姐弟两个角色，我扮姐姐，你扮弟弟。

剧情大意是姐姐身兼教教，把误入歧途的弟弟挽救过来，走上光明道路（当时不便公开写‘抗日’两个字，只好用‘光明’二字代替）。等写好了，我再修改修改，再起个剧名”。想不到，待晚会一开场，独幕剧一开幕，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原来大部分观众是冲着“女兵作家”谢冰莹客串主演《姐弟情深》独幕剧，一睹谢冰莹的风采而来的。足见谢冰莹在闽西时期的影响。

一声炮响“福建事变”爆发了，十九路军毅然与中央苏区联手反蒋抗日。万众一片欢腾。不料由于种种原因，不到两个月又失败了。大家各奔东西，各谋生路。从此我和冰莹姐闽西一别就是大半个世纪。

几年前，当我得知冰莹姐久居美国闭门耕耘的信息后，真是喜出望外，只是打听不到她在美国的确切地址，不能写信向她问候致意，只好翘首东望，以解思念之渴。现在，我多么希望她能看到我的这篇小文章，然后回我一封有她确切地址的来信啊。我在殷切地期待着。

（责任编辑 孙 申）

## 广 告

谈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人们都同情怜悯那位面目丑陋，但心地善良的卡西摩多。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丑陋？现代医学揭示：是先天性血管瘤。这种病横行人类至今，仍是医学界公认的一大难题。

然而，在郑州却有二位以“神针妙治血管瘤”著称的，名列《中国当代高科技人才系列词典》的医学专家——何成荣、何继忠。他们治愈了无数个

类似卡西摩多的患者，其撰写的论文《局部注射治疗小儿血管瘤 1877 例临床分析》，于 1993 年在全国疑难杂症诊治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引起轰动。多年来，他们以治疗血管瘤的卓越成就，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全国各地患者的盛誉，他们的名字及其疗法被载入《中国名医良药实用辞典》、《实用外科注射法》以及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陆求医购药指南》等 20 余部著

作中。新闻界也炒得沸沸扬扬。1994 年 4 月 7 日至 10 日，中央电视台在《天涯共此时》节目中，对他们的事迹作了专题报道。

据悉，为找到启开血管瘤病大门的钥匙，他们集祖国医学、现代科学于一体，结合 30 余年的临床实践，大胆摒弃传统的手术、激光、冷冻、放疗、硬化剂等疗法，独辟蹊径，将自己配制的药物直接注入瘤体，使之产生无菌性肿胀，持续压迫瘤体，阻断血液供给，最后使其被肌体吸收消失。经大量临床验证，该疗法对于血管瘤，尤其是海绵状及淋巴血管瘤疗效显著。最近，他们又投入近 20 万元，引进了 90 年代国际医疗器材（联合国开发署援华项目），专治红斑痣（俗称胎记），使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地址：郑州市西大街 73 号，郑州向阳中心医院  
电话：0371—6327239 邮码：450000

## “神针妙治血管瘤”

# 怀念周总理 对昆曲艺术 的扶持

● 陆 放



周总理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侯永奎合影

只要北方昆曲艺术在祖国的艺坛上存在一天,北昆人就会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66年,江青假借毛主席的名义,撤消了所有全国昆曲演出团体和戏曲学校的昆曲班。北昆老一辈艺术家白云生先生喊出了所有昆曲工作者、爱好者的的心声:“取消昆曲我死不瞑目!”可惜,他到底没有赶上1979年北方昆曲剧院重建!

有人说,北昆的老艺人对党的感情最真挚最纯朴,当他们跟别人一样说“党的扶持”时,总爱加上“亲手”两个字,说“党亲手扶持了昆曲”。是的,北昆(包括南昆)的老艺人,在旧社会受的苦最大最深,昆曲早从清代中叶就由辉煌转入衰败,曲高和寡,观者寥寥;加上天灾人祸,暴政战火,昆曲艺人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又由城市落魄逃回农村。据说,北方昆弋班社在前清乾隆、嘉庆年代,仅在冀中平原就活跃着四五十个;而到解放前夕早已荡然无存,艺人们回乡务农的,滞留城市的则卖香烟、拉排子车、修鞋,勉强糊口,能在京戏班、梆子班搭班的就算幸运的了。

“一唱雄鸡天下白”。全国解放后,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北昆老艺人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妥善安排。1949年,韩世昌被选为北京市文联委员,并担任人民艺术剧院教员;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等著名演员重返舞台,昆曲恢复了勃勃生机。特别是他们多次去怀仁堂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是他们平生最大的荣誉。侯永奎回忆:“……到怀仁堂演出,周总理叫我演《林冲夜奔》,当我刚唱完[折桂令]‘管教你海沸山摇’,毛主席就站起来鼓掌,首长们都站起来鼓掌。演完后,毛主席接见我说,‘演得好,要传下去教好青年演员’。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衷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几年中,他们在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剧院担任民族舞蹈教师,培养了李淑君、丛兆恒等青年演员学昆曲。

1956年,浙江省昆剧团来京演出《十五贯》,周总理看后加以表扬,一时轰动,有“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之誉。下半年,文化部组成北方昆曲代表团,去上海举行南北方昆曲会演,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地演出,与南

方昆曲界交流技艺。

回京后，文化部决定在北昆代表团的基础上筹建演出单位。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正式建立。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总理到会讲话，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代表国务院宣布北方昆曲剧院正副院长名单（院长韩世昌，副院长白云生、金紫光）和剧院建院方针，并进行了建院演出。“北方昆曲”从此作为一个独立剧种定名。韩世昌说：“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兴奋地落下了泪，万想不到昆曲艺术今天又得到了甦生，我个人又被任命为剧院院长，唯恐不克担任如此重责，……惟有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誓忠于人民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以图报于万一！”（韩世昌《我的昆曲艺术生活》）

1958年，即北方昆曲剧院建院的第二年，剧院排演了由同名歌剧移植改编的现代题材昆剧《红霞》。由李淑君、侯永奎、丛兆桓、白云生等老演员和青年演员合演。周恩来总理审看《红霞》时的评语是：“为昆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没有从具体艺术的精粗好坏上谈，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指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发展革新而又不违背传统规律的艺术就是有生命力的。

1960年，周总理审查了北方昆曲剧院《文成公主》的彩排。这出戏由许宝驹编剧。剧本在翦伯赞等历史学家协助下，依据史实，写了唐太宗与吐蕃国和亲友好的故事。李淑君、侯永奎分别扮演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是吐蕃国的创始人。公元641年，松赞干布25岁时迎娶了唐朝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带去汉族的较高的文化，协助松赞巩固政权，创制文字（由吐蕃文后来发展为藏文），发展农桑，兼并强邻。吐蕃的强盛对后来藏族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周总理在审查演出当中，反复强调要充分表现大唐和吐蕃的历史友好关系，要演好松赞干布一心与大唐友好的诚意，要演好文成公主协助松赞干布与亲唐大臣禄东赞等，粉碎吐蕃上层中民族主义顽固分子破坏唐、蕃友好的阴谋。当时西藏达赖掀起的叛乱刚刚平息，此剧形象地阐明中国和西藏的历史渊源，是有教育意义的。

1963年，北方昆曲剧院排演《晴雯》。剧作者王昆仑，是“民革”中央负责人，又是北京市副市长，是著名的“红学”专家。这个剧本借助于王昆仑对小说原著多年的潜心研究和他笔下词曲之精深高雅，描绘生动，深情缱绻，使观众唏嘘拭泪，反映热烈。但周总理看了彩排后，立即召见作者、导演等，严厉提出批评。当年8月在全国音乐舞蹈座谈会上，他又批评说：“《晴雯》这个戏到底是以反映阶级矛盾为主，还是以主奴恋爱为主？对于我们来说，阶级性也就是人民性。当年封建社会的时候，阶级性就是要站在农民方面，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这才能表示出当时人民性。”周总理批评后，剧组经过学习讨论，修改了剧本，复排后演出。1979年又一次修改演出。

在《晴雯》的初排稿中，儿女情长的成分占了主流，尤其晴雯被逐之后，虽然写的是奴才被害的悲剧，但晴雯和宝玉遥相思念的心理刻画过浓过重，却难以鼓舞人们对封建势力残害奴隶的同仇敌忾之志。这二者之间分寸感畸轻畸重，暴露了创作思想上的问题。

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家发生了诸多变化，文艺界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如何评价文艺界的许多变化？如何评价周恩来总理对《晴雯》的批评讲话？如何用这段讲话的精神对照今天舞台上、电视里纷纷扬扬的众多节目？难道不值得振聋发聩吗？

香溢幽兰仗护持，北方昆曲从复苏到发展，倾注了周总理的心力和智慧。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们眼含热泪，声音哽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播《幽兰曲》，与全国人民一起缅怀先烈，悼念英灵：

树清标，立风范，  
名花移植彩云间。  
念忠魂长眠玉宇，  
恰似幽兰。  
仰洁白一生，  
日月肝胆。  
端的是流芳百世，  
香溢尘寰！

（责任编辑 王 恂）

# 新长安大戏院开幕忆旧

● 葛献挺

新长安大戏院开幕了，这可是戏曲界的好消息。谈到新长安，不免忆起老长安。我首次进长安，时在1949年，当时，长安12岁，我长它1岁，转眼间，时过47年。

1949年的烟花三月，我随军南下，驻在扬州仙女庙，全军饮马长江，正待飞渡前夕，我团（三野政治部文工二团）奉命北上，到刚刚解放的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我们4月底到故都北平，从前门车站步行到北京饭店，饭后搬到东总布胡同10号，过去这是一个王府，当时是傅作义将军守城部队刚撤出的兵营。不久，全国四大野战军的文艺代表团全部进驻这里，顿时给沉寂的东城带来一片生气，其热闹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李伯钊同杨尚昆来看望大家说：“同志们到来，是我军南昌起义后，全军文艺工作者的首次大会师。”一时间，10号大院腰鼓雄壮，歌声嘹亮，成了音乐的海洋。记得一野代表团领队是董小吾和魏风，后来的导演严寄洲、声乐家孟贵

彬等，都在此团。50年代初，我军进军西藏，有一首唱遍全国的歌曲，叫《歌唱二郎山》，就是孟贵彬唱的。他们演出的剧目是《刘胡兰》，刘胡兰的妹妹叫爱兰子，也随团到北平。二野领队是陈裴琴，演出剧目叫《王克勤班》。三野领队是赖少其，演出剧目叫《大翻身》和《淮海组歌》，剧作家顾宝璋、沈西蒙，音乐家沈亚威等均在其内。四野领队是陈其通，演出剧目叫《炮弹是这样造成的》。华北军区文工团未住这里，他们演出的剧目叫《子弟兵与老百姓》。当时北平演出场所不多，上述剧目分别在现在的大华影院、首都影院及长安戏院、音乐堂演出，由于这一原因，使我同长安结下不解之缘。

1949年7月上旬，文代会开幕后的一天下午，四大野战军代表团几乎同时行动，列队步行到长安戏院观摩。入座一看，场内几乎全是军人，演出剧目是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前场是李少春、叶盛章的《三岔口》。梅先生的精彩表演，我是第一次观看，场内观众和我相似者，不是百分之百，也是百分之九十九。对梅先生的表演，绝大多数都是慕名，我和多数人一样，也是似懂非懂。但对李少春、叶盛章在《三岔口》中惊险绝妙的开打，以及剧中人物任堂会的英俊、刘利华的武技，至今难忘。

后来我到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叶盛章先生也从中国京剧院调到北京梅剧团，接触机



原长安大戏院



会较多，不久都搬到龙潭湖小区，成了近邻，经常见面。一次我提起长安那场演出，说：“那是我头次看梅先生的戏”。叶先生说：“那你可得感谢我和尚小云先生。当时军管会给梨园公会交下晚会任务，四大名旦只有梅先生没有在长安露过，因为修建长安时，梅先生已经南下，日本投降后，铁路不通，梅先生十几年未回北平。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了，长安的老板杨守一，想请梅先生在长安露一次，以便压台，但和梅先生不熟，就请打本子的李寿民以及杨小楼的姑爷刘砚芳出面约梅先生。见梅前，先找尚小云先生。尚先生在梨园行好讲义气，他出面，梅先生肯定会给尚先生面子。当时我负责梨园公会，接了军管会的任务，也到尚先生家里要主意。因为他是前任北京梨园会长，日本投降他就辞了。虽然辞了，梨园行的大事，还得找他商量。我同尚先生一碰，正好是个机会，决定以北平梨园公会名义，请梅先生出演。我和尚先生及刘砚芳一起到六国饭店，同梅先生一说，梅先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因为梅先生的班底散在别处，故只演《别姬》一折。那次要不是我们同行邀请，梅先生的演出日期，怕还要往后推。那次长安老板请梅先生演出压台，是因为人们都说长安的台座西朝东，是白虎台，梨园行有传说，认为是凶台，有邪气，想借梅先生的仙气，图个吉利。梅先生重返北平，

头次演出，就进长安，有长治久安之意，因此，也是满心欢喜。”

这就是我头次进长安，看梅兰芳先生演出的前后经过。后来在这里看过程砚秋的《英台抗婚》和《荒山泪》，尚小云的《墨黛》和《失子惊疯》。再后来又看了豫剧名家陈素真的《洛阳桥》和《三拂袖》。在《洛阳桥》中，陈把待嫁少女含媚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但在关键当口，又极具含蓄，很有分寸，在闺门旦的表演功力上，陈素真是无愧于“豫剧大王”称号的。60年代初，又在此看了侯永奎、李淑君合作的《千里送京娘》。这出戏过去本是一出格调不高的剧目，经过秦瑾、时韬的整理改编，面貌一新，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再经过侯永奎、李淑君的精心刻画与表演，后来竟成了北方昆曲剧院的看家剧目。侯永奎以尚派大武生扮赵匡胤，他那气吞山河的唱念和心雄万夫的功架作派，堪称一绝；李淑君的赵京娘，含情脉脉，层次分明，可

谓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她与侯永奎的合作，是“捉对儿戏”中的双璧。

首次进长安后，不久，离平南下江南，后赴朝鲜，归国后到张家口求学约有七年，此后，近四十年中，我都在北京。去掉“十年动乱”，余下约三十年，如以每年在长安看50场戏算，怕有一千多场，“文革”前几年，我尚未成家，单身住在文化局内的小楼上，长安有好戏，几乎天天去看。后来长安划归北方昆曲剧院，我到该院“四清”蹲点。再后来，我曾带团到长安公演，关系可称不浅。但严格的说，我只是长安的“半个老观众”，因为长安前十二年的好戏老角均未曾见。对于我来说，长安戏院不仅是娱乐场所，而且是增长戏曲知识，进行比较、借鉴的蒙馆和课堂。老长安拆除前，刘洪春电话告我，我怀着一种若有所失的心情，请摄影师吴贛生立即把长安外景及“白虎台”内景拍下，以作资料保存。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新长安大戏院

# 张謇： 从状元郎到实业家

● 李羽壮



张 謇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文人下海经商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施展自己的抱负，宁可丢掉“铁饭碗”，到商海中去闯荡、去拼搏，许多人因此而获得了成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但在一百年前，文人下海，特别是状元郎经商，在当时就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大新闻。这里所要介绍的，是位曾被毛主席称誉为中国近代民族轻工业的开拓者，中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的状元郎——张謇。

## 一、“大魁天下” 欲展鸿图

张謇（1853—1926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自幼他就聪明过人而又勤奋好学，5岁入私塾，已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千字文》。一天，先生在堂上出了“人骑白马门前过”七字命对，张謇马上应对道：“我踏金鳌海上来。”先生大加赞赏。

张謇15岁时，已读完了《诗

经》、《尔雅》、《春秋左传》、《礼记》、《周礼》、《仪礼》等传统的经典，能做诗做八股文，16岁考取了秀才。

1874年，张謇21岁时初任私人秘书，他办事认真，文笔快捷。1876年，他随庆军统领吴长庆从山东开赴朝鲜，按照统领的意图，草拟文书，上疏条陈。一次，经他草拟的上疏条陈，送呈北京后，得到朝中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翁同龢的嘉奖。1884年回国后，他认识到如不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要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又发愤苦读，在1885年秋参加了顺天府乡试，连考三场得中举人。以后10年，他为求取进身阶，曾4次进京参加会试，皆因文章不合考官的口味而名落孙山。

直到1894年，张謇已经年过四旬，才如愿以偿，被录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张謇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大魁天下”，博得了封建士大夫梦寐以求的科举场上的最高荣誉。

## 二、“下海”翻波 实业救国

从秀才、举人到进士，这条崎岖的路，张謇走了数十年，最后达到顶峰“大魁天下”。按照传统习惯，应该是做官、升官，直至宰相，成为“状元宰相”。当然，如能和皇室联姻，做“驸马状元”，更是锦上添花，前途不可限量。这代表着几千年来无数士大夫为之奋斗的最高最美满的理想，可对此张謇却轻易放弃了。他中了状元却不走仕途之路，反而南归故里。这是什么原因呢？早在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广西前线将士用简陋

的武器，浴血苦战，大败法军。可清政府竟自认失败，与法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卖国和约。这使张謇这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文人大受刺激，可又无能为力。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屡遭外强侵略欺辱，除了朝廷昏庸，民众落后外，主要原因是中国太贫穷、太落后。中国要强盛，必须船坚炮利，而这一切都必须从兴办实业着手。这时，他初次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张謇还说，因为“国势日亟，而当道者不足与有为”，权贵腐败，国是日非，不足谋之；其次，“欲国之强，当先教育”，而“欲兴教育”，又须“先兴实业”；再其次，洋货输入以纱布为大宗，振兴实业当以棉纺织为急务；最后，张謇老家南通盛产棉花，家习织布，棉花输出，洋纱输入，日盛一日，利权外溢，无异“沥血肥虎”，更应急办纱厂，以资抵制。张謇为救国，不图虚名，为实业，“下海”经商。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最后以李鸿章到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帝国主义列强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争先恐后地强夺土地，强占港湾，索取特权，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经济侵略方面，资本主义各国的商品大规模地、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而且，外国资本家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剩余”资本。马关条约签订后，各通商口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近千家外资经营的工厂，其中棉纱纺织工厂全部是马关条约订立后才开办的。

在民族危机和外资涌入的刺激下，振兴和保护本国民族工商业，与外国“争利权”，就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口号。“设厂自救”的呼声更加激昂，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与舆论之压力，不得不表示：“提掣工商”，谕令各省招商

多设纺织等工厂，以收利权，官绅尽力“附股”，并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鼓励发明创造。张謇也深深地感到，“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中，他深信“求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于是，他“感激时会而奋志农工”，走一条几千年封建士大夫从未走过的，也不屑一顾的下海经商、“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封建社会向来鄙视商人，商人重利不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因而把商人列入“下九流”的小人。对于一个名贯天下的“状元郎”来说，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啊！这一方面反映了张謇的胆识和远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走上了初级阶段。

1895年冬，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托和支持，在南通招商集股，筹建南通大生纱厂。他开始奔走南通、海门、上海等地，收罗人才，筹集资金，组成了筹办纱厂的6人董事会。议定集股60万两，设纱机2万锭，厂基选在南通唐家闸。当时，上海黄浦滩上有张之洞从国外购来的纱机，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贬价出卖。张謇与其他董事几经磋商，最后决定领用官机，签订官商合约，变成官商合营，官机作价50万作股，商股亦集50万两，由沪、南两地商人各任一半。

纱机问题虽解决了，但资金尚无着落。张謇又四处奔波，经过二十多个月，才集得13万两。上海方面由于洋纱倾销，纱市败坏，商人们不愿再冒险购股。南通方面，购地、垫基、浚港、筑岸、建屋，已花费巨大，无力购股。对此艰难，两方均在打退堂鼓。果然，上海股东真的退出了，50万两的

担子便全部落在南通股东，特别是张謇的肩上。急得张謇这个柔弱文人“彻夜不能寐，绕屋而走”，他上求助于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徐州道台；下求助于巨贾富豪；甚至见人就求助，但“诋者十之五六，惜者二三，赞者一，助者乃不及一。”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大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有利可图，提议协作，为张謇解了燃眉之急。他立即与之订约，各领官机25万，各认集股25万，合领分办，并讲明“官股按年取息，不问盈亏”。盛宣怀还答应代张謇筹集营运资金25万两。于是，张謇得以购备砖瓦木石，在1898年春破土动工建厂。1898年冬，厂房才得以竣工，机器也已安装过半，可营运资金已所剩无几。既要收购棉花以及开车的各种物料，又要支付造厂装机等各项工价。“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别筹，而丁日又须还甲”，真是焦头烂额，使张謇“心口相商，笔舌俱瘁”。虽然厂已建成，开车却困难重重。如每月开车需工本12万两，以3月计算，至少有36万的流动资金才可运转。为此，张謇又马不停蹄地奔走沪宁等地。借款，未成；以厂房机器抵借，不睬；告急各股东，不理；出租工厂，奸商又趁火打劫，百般刁难，无理压价。张謇备受愚弄，气愤无比，把心一横，决定自力更生“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而闭厂”。当他失望地回到南通，却“柳暗花明又一村”，得到了南通一富商的同情和全力支持，资金和原料才得到解决。张謇又聘请了一批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打开了销路，创出了牌子，使濒临死地的大生纱厂起死回生。第二年就赚了近12万两银子，第三年赚了15万余两，此后一帆风顺，

走出了绝境，站稳了脚跟。

从筹办到开车，头尾共5年。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番生死，几番踟蹰。张謇为此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对于一位“状元”书生，实在是太难太不易了。大生纱厂的创办成功，不仅是张謇个人生平的大事和转机，而且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也可书写一笔，并占有一席之地。

### 三、提出“棉铁” 创建多业

大生纱厂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张謇自居为“通官商之情，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的士大夫。大生纱厂的资金既有商股，又有官股，但官方只按年取息分红，并不涉及经营，经营权掌握在张謇之手，使他得以施展自己才能。在创业之初，他就有与外国争利权的企图，创业的成功也的确影响了外国资本的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客观地讲，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外国列强经济侵略的作用。大生纱厂自开车以来，连年获利，不但还清了外债，而且有更多的盈余，推动了一些官僚地主、富贾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由于张謇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官方支持、棉价低、工资廉、运费少、经营有方，促使利润大幅上升，吸引新股不断加入，工厂不断扩大，到1906年在崇明建立了大生分厂，以后又建成了大生二分厂。到了1913年，大生纱厂已获纯利润540万两，纱机6万6千多锭，资本200万两，成为完整配套的大型纱纺企业，是当时中国纱厂中最成功、最具影响的工业。

这时，张謇更加雄心勃勃地大量投资兴办其辅助企业。为了解决

用棉问题，1900年开始筹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购置土地，扩大棉田，作为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基地；为了利用棉籽和多余动力，1902年他开办了广生榨油公司和大兴面粉公司；为了利用油厂下脚料，1903年开办了大隆肥皂公司；为了解决产品和原料的运输问题，1904年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为了解决机械设备维修维护问题，1906年设立资生铁厂。另外，张謇还创建了吕四渔业公司（1903年）、颐生酒厂（1906年）、翰墨林印刷局（1904年）以及镇江螺丝山笔铅公司（1904年）等企业。这使张謇的大生纱厂从原来单一企业，逐渐成为“五脏俱全”、成龙配套、自成体系的企业集团。同时，也使张謇这个状元资产家，俨然成为清末当时的资本家“状元”，在工商界被公认为领袖人物。

在经商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中国之现状，逐步提出了并加以完善的以“棉铁主义”为核心的振兴实业的经济思想。他把“实业”解释为包括农、工、商各部门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不仅把发展大工业看作振兴实业的关键，而且还把发展大工业的重点放在棉、铁两种工业上，并以这两个工业为起点和中心来带动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他认为，在中国“财力均困”的条件下，如振兴实业不分轻重缓急，各项工业齐头并进，势必“备多力分”。因而，主张以棉、铁为工业发展重点和突破口。另外，从当时清朝海关贸易来观察，棉织品和钢铁工业产品为进口大宗，每年进口的外国纺织品达2亿1千余万两，钢铁产品达8千余万两，这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因。这样下去，中国“即不亡国，也要穷死”。因此，他提倡发

展本国的棉铁工业加以抵制。除了抵制商品输入外，他还提倡抵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认为在华的外资企业对民族企业的生存造成致命威胁，是“最为心腹之患”，主张“设厂自救”，这也是张謇提出棉铁主义的动机之一。他认为一国之强盛在于棉铁之发达，才能“操经济界之全权”，才能有力量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取得国家经济上的独立。同时，张謇提倡棉铁主义，最先看到的是这两种工业最易得到优厚的利润。外国棉织品和钢铁工业产品之所以大批进口，在于中国市场上有广阔的销路，有利可图。中国的资本家也可以以此赚大钱，使“肥水不流他人田”。

在棉铁两种工业中，张謇尤其重视棉纺织业，认为“棉尤宜先”。这是因为棉纺织业相对钢铁工业来说，投资少，见效快，资本周转迅速，更易短时获利。“致富之法……惟实业，”而实业中最易致富的“无过于纺织”，而“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大生纱厂的成功和发展也证实了张謇的论断，张謇宣传他的这个主义当然还有他自私的考虑，就是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尤其是他的资本集团能在国内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在大生纱厂开办之初，他就依官家的名义，取得了“二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垄断专利权。曾有位姓朱的资本家几次想在海门投资建厂，均被他凭借官势强压制止。他不仅垄断了南通一带的盐垦、棉纺织业，而且这一地区的其他企业也都由他一手包办，不许他人涉足。很显然，这是张謇利用官方势力限制自由竞争而取得垄断地位的手段。

张謇由于办实业有功受到清政府的嘉奖。1904年，清政府赏赐他为三品商部头等顾问官。在他发

达受官时，仍念念不忘教育。他称“教育犹花”，认为实业与教育乃国家“富强之大体”。因此，他把兴办企业所得的利润和社会募捐所得，用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他亲手创办的学校有：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医学院、盲哑学校、南通大学、南通师范学校、女子师范等十多所。他所创办的某些学校，在中国也是首次兴办。有一些学校已延续至今，仍在发挥着教书育人的作用。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首倡者之一，为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提高和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表彰他热心办学，清政府曾任命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

同时，张謇在热心办学时，还大力资助兴办了许多公益事业。他曾兴办了养老院、幼稚园、残废院、图书馆、博物院、医院、育婴堂、公园、剧场，开办了交通警察所，蚕桑讲习所等。许多公益项目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有些是属于开创性的。张謇将近代许多文明成果从西方引进中国，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文明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 四、实业破产 晚年消沉

20世纪之初，张謇的企业已有了很大发展，实业已初具规模，利润大幅上升，这时他已不甘在政治上的寂寞，希望凭自己经济上的实力，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以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促进更大的发展。

正当张謇埋头办实业之际，中

国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戊戌维新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鲜明地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张謇则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对立面，竭力拥护康、梁，鼓吹立宪制。

1911年10月10日爆发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可张謇对此感到迷惑不解，而袁世凯的出山给他带来了新希望。他还想借拥戴袁世凯为新政权的首脑，以换取自己的“官运”和“财运”。在为实现这目标的前提下，他甘为袁世凯当“马前卒”，努力牵制和压迫孙中山的革命党向袁世凯妥协，成为北洋政府的“开国功臣”，被袁世凯任命为工商总长，并兼任全国水利总裁。

张謇当上工商总长后，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施展他的鸿图大略。他首先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书》及其他一系列文告的法令，幻想凭借政府的权威，来振兴中国实业。但袁世凯早已开始做皇帝梦，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登基，对张謇振兴实业计划根本不感兴趣。1915年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逆潮流而动，恢复帝制，宣布一切沿袭清朝旧制。张謇在前途渺茫、抱负难展、极度失望的心情下，不得不告退还乡。他万万未料到竟会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张謇回乡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这使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喘息和发展，也是张謇的实业办得最辉煌的时期。大生发展成四个规模可观的纺织厂，纱锭达15.5万枚，资金达900万两，又办了20个盐垦公司，用地达413.5万亩。

但是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

战刚刚结束，帝国主义列强立即卷土重来，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贪婪来压迫掠夺中国。再加上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民生凋弊，百业衰败，使本来就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雪上加霜，岌岌可危，张謇的企业也无法逃避这场灾难。当然，除了外部原因外，大生纱厂等企业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弊端。一是资金不足，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银行，依赖于银行；二是股东们不负企业亏损之责，不论盈亏，不担风险，先付官利，使资本积累受限；三是贪图眼前之利，对公积金的提存与折旧的提存不重视，设备不更新，造成生产率下降。最后，由于他投资太多太分散，因而借债也多。虽然，大生纱厂年年获利，却又年年背债，一旦纱厂不景气，将导致其他企业也要遭灾。加上棉田歉收，外国廉价棉织品大量倾销，资金告枯，仓库告罄，市价飞涨，债台高筑，债主逼债，到1925年，大生纱厂不得不宣布破产，被上海四家银行正式接管。

张謇呕心沥血经营半生的企业，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统统化为一串串泡影而彻底破灭了。他感到“茫无方向”，凄凉而又无奈地对他儿子说：“父日尽人事，儿亦尽人事而已。”张謇办企业的经历宣告了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彻底破产。这证实毛主席所总结的一条历史结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张謇于1926年8月，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历史将公正地记载他的一生，同时也不会忘记他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及教育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廉俭恤民的君主隋文帝

● 贺 海

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短，从公元581年杨坚灭周立国开始，至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被害为止，前后经历了38年，时间虽不算长，但它所创立的各项制度对以后的朝代都有过重要影响。它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应该说在这一段封建社会历史上有所建树，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

杨坚，是北周勋臣杨忠之子，袭父爵随国公，杨坚建国号为隋，本是袭父亲随国公的“随”字，因其厌恶中间的“辶”（走），认为不祥，于是改“随”为“隋”，象征升平安定。当时他属于在北周掌握实权的“外戚”。

隋文帝灭周取得政权以后，他首要的功绩在于统一了全国，使两晋以来连续300余年的战乱得以停息，使民众获得安宁生息。一改他即位之前周宣帝时期昏狂暴虐，屠杀宗室大臣，用法苛刻，造成外自朝士，内至宫女人人恐怖、朝夕不保的局面，民众归心，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他所创立的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沿袭，对推动封建社会的进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隋书》赞扬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廩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此”。史籍上对隋文帝的溢美之词可能有过分之处，但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情况。

隋文帝即位之前正处于天下分割，战乱频繁，朝政腐败的时代。他亲眼看到北周灭亡的原因，总结前人的历史教训，使他认识到，治国的方略很多，一要节俭，二要廉洁。隋文帝在位24年，这两条始终贯注于他的全部行政。因而使宫廷内外节俭成为风习，对民众的强取豪夺大为减轻。那些豪强官吏，也不敢胡

作非为。他曾训诫太子杨勇：自古帝王没有一个好奢侈而能久坐天下，汝为太子，首当崇尚节俭。他身体力行，勤于政事，俭于自奉。他首先在宫中倡导“以俭素为美”，严禁妃嫔锦衣玉食。当时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钢铁骨角，不用金玉。并在法律上规定，对挥霍无度者，严惩不贷。

隋文帝对下级官吏用给田养廉（即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级分给职田）等措施，其使向善称职，不去扰民。对于考绩优秀者，给予擢升，并布告天下。这种奖励良吏的办法，虽然未必能使所有官吏就此向善称职，但朝廷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对民众毕竟是有益的。

对于不法官吏，隋文帝向来主张严惩。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城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严加重罚，甚至对他的子女也是如此。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靡，建造宫室，被他发现，勒令禁闭。他又发觉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于是废黜杨勇，立杨广（即隋炀帝）为太子。不过由于他依靠一些左右亲信当作发觉臣下罪过的耳目，难免产生偏听偏信，信谗言，受蒙蔽，后来甚至发展到考核流为猜忌，严惩流为苛刻。杨广的行为与杨勇并无二异，只因善于伪装，并有皇后独孤氏及杨素等替他说好话，终于夺得了太子的地位，但最后杨广与杨素恰恰成了杀害他的奸人。隋文帝由于他执法严明，一般的官吏有所畏惧，当时贪污妄法的行为确实减少很多，使民众少受其害，但其中也有他血的教训。

隋文帝除了提倡廉政，对待民众比较宽平。辅政开始，即制定了隋律，废除了周宣帝时期所颁布的《刑经圣制》种种酷刑。规定民众有冤屈，当地县官不理，允许向州郡上告，以至投诉到朝廷。并下诏，诸



州被判处的死囚，不得在当地处决，须送当时的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复按。按毕，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决。同时规定，死罪囚要经三次奏请方能行刑。他这些严格规定，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保护民众的作用，少发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隋书》也曾赞扬他留意民间疾苦。他即位以后，关中一带发生饥荒，他得知百姓所食皆豆粉拌糠，于是命宫廷撤消常膳，不吃酒肉，并让洛阳附近的灾民到城里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迫，他也要求下级官吏要“至诚待民”。他曾下诏书说：只要官有慈爱之心，民并非难教之人。封建时期，像隋文帝在执政当中懂得信于民的皇帝为数不多。

隋文帝在位期间，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有沿有革，制定成隋制，当然中间也有某些变革。隋制在中国历史上同秦制一样，都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隋文帝对于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本着“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罢天下诸郡”，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分掌政权，共议国政。这种三省分权制度的建立，可以避免因丞相权力过大，而夺取皇位的危险。从而加强了皇权。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行政、经济、军事、司法以及文化等事项。这种管理体制，不仅简化了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改变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而且节省了经费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进一步促进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备和严密。

其次，对于过去以战争为专业，完全脱离生产的坊兵制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实行府兵制。所谓“府兵”，即挑选有勇力的农民当兵。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受战阵训练。府兵制既能寓兵于农，又有各级军官督率，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可随时调遣。这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至少有可以节省军费的优点。

第三，创立了科举制度，打破了过去门阀大族垄断做官的局面。魏晋以来，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度，即做官凭门第，仕途完全为门阀大族所把持。隋文帝称帝后，则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度，实行州、县荐举人才的制度。从开皇七年（587年）开始，隋文帝规定，每州每年选举贡士3人，选举贡士的标准主要是以文章华美为主。初期只设秀才、明经两科，后又增设进士科。用考试的办法选取进士。进士科的设立也就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形成。这种以考试取士的办法，使南北士人均可凭文才来竞争高低，打破了门阀大族垄断做官的局面。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第四，修订刑律。隋文帝即位后，命其大臣高颖、

李素、裴政等十余人修订刑律，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沿革轻重，务取平见。废除了前朝惨无人道的枭首、轘裂（车裂）、孥戮、连坐等惨刑。除了反叛罪，一律不用族刑。死刑分绞、斩二等，流刑分千里、千五百里、两千里三等，服刑最多不超过五年。同时规定，民有枉屈，得依次上告到朝廷。全国死囚罪，都得经大理寺复按。隋文帝执政期间，制订的新律由过去的近两千条，只余五百余条。新律体现了“以轻代重，以死为生”的律意。历史上秦律残刻，汉治秦律，直到南北朝仍一脉相承。隋定新律，化秦汉系刑律确有很大改进，应该说是法律上的一大进步。隋律基本为唐、宋以后各代所沿用。

第五、均田减赋。隋文帝为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他在行政，定制度等方面，都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为目标，一切都围绕这么一个中心。

即位之初，他就主张“劝农积谷”，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皇初年，他曾三次诏令，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解决部分农民土地问题。除均田之外，隋文帝对租调力役也作了调整。租调力役的减轻，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民间安居乐业，谷物也连年丰收。

积谷建仓，也是隋文帝时期经济政策的一项具体举措。他发现水旱灾害历年常有，贫民伤亡流散，常是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储粮于民，以防荒年灾害。当时所建仓储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一类是义仓。官仓积储租米，供朝廷使用。义仓则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也称社仓。义仓防小灾，官仓防大灾，这种积谷防灾的举措，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用意是可取的。

经过历史上的长期战乱，民众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统一的国家。动荡不安的社会以及残虐的暴政，给民众带来的只能是痛苦。因此，“安居乐业”，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民众的一种企求。隋文帝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一些措施，一般符合民众的愿望。民众得到这些必要的条件，得以生息，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必然会自发地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景象。因此，隋文帝在位期间社会上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与他所实行的“躬节俭，平徭赋，仓廩实，法令行”等一系列举措是分不开的。

隋文帝在位24年，在封建帝王当中执政时间不算长。通过他的惨淡经营，给隋朝创造了一个兴旺发达的局面。史学家也认为他是一个节约恤民，统一大业，勤于政事的君主。

（责任编辑 萧 徐）

# 夜游秦淮

● 傅 贵

大约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便读到了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寥寥数笔，便将一个纸醉金迷、笙歌夜起的秦淮河活脱脱地勾勒出来。后来参加工作，几次途经金陵，皆闻夫子庙破烂不堪，秦淮河淤塞成为一条又臭又脏的死河，失去游兴，未果。

这次去金陵，欣闻秦淮河已向游客开放。华灯初上，我独自一人来到秦淮河畔，买了一张船票，也效仿杜牧乘一叶扁舟观赏秦淮风光。

据传，秦始皇到金陵发现此地有王气，为断此王气派人挖掘这条人工河，后人称秦淮河。其实，唐朝以前称龙藏浦，又叫淮水。后人传闻秦淮河为秦始皇所为，依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诗云：“凿断山根役万人，祖龙痴绝更东巡。石城几度更新主，赢得淮河尚系秦”。《建康志》载：“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分派委屈，不类人功，非秦皇所开”。而人们习惯的心理，凡事都想沾点帝王气，因而，秦淮河便姓秦了。

秦淮河是南京地区主要的河流，其源有二，东源出自离句容县城北部 60 里的宝华山，经过句容县城，汇集赤山湖之水后，流经湖熟到方山，和南源之水相汇合。南源出自离溧水东南 20 里的东庐山，两源之水于江宁县境内的方山汇合后，

水量大增，再由上方门流入南京市内。秦淮河至通济门外九龙桥，分为两支，流入城内的叫内秦淮，是其正流，从水西门偏南地西水关出城，与城外淮水汇合。未入城的叫外秦淮，是南京城的护城河，经长干桥、赛虹桥向北与内秦淮正流相合，向西北经汊河入长江。

自晋至陈，多以秦淮作为守卫都城建康的屏障。西连石头，东接青溪，设浮航 24 所，一旦有警，断舟棚流，号称险隘。

秦淮河全长 110 公里，是一条较短的河流，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又是一条知名度极高的河流，可以说没有哪一条河流像她承受如此沉重的负荷，并不太宽的河面上承载着如此众多商旅、歌妓、贵族、文人墨客、江湖艺人、平民百姓的穿梭不息的造访、居住、喧闹与逗留。囿于这条河流的缘故，她平添了六朝古都金陵的辉煌，使其更具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具东方巴黎的魅力与文化品位。我想，简单地肯定与轻率地否定秦淮河似乎都不合适，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去评判它的功过是非，成败荣辱。如果仅从繁华与喧闹的角度而言，那么，秦淮河是一幅展开的、流动的清明上河图的历史画卷。但我觉得它除去热闹与喧哗外，更多的是文化气息与优美传奇的故事，以及动人的诗篇，才是它的主流。

秦淮河这种特殊的混合体是多种因素造就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枕着石头城，舞动长江，倚山傍水，是江南的门户；厚重的历史，金陵是六朝古都，江南热土，军事要塞；士族望户的居住区、商业区、文化娱乐场所等。因而，它才能将巨商大贾、豪门巨富、迁客骚人、歌妓商旅汇集于此，流连忘返。因而，这条河才留下了一篇篇优美的诗作，一个个动人的佳话。

从秦淮河向东是鼎鼎有名的桃叶渡。晋时是一个渡口，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迎妾桃叶处。王献之为爱姬作《桃叶辞》：“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桃叶辞》虽写得很俏皮，但意境不甚优美，相比之下不及陈文述的《桃叶渡》诗：“绿波春水易消魂，江草江花旧梦痕。一样婵娟同打桨，如何人不说桃根”。桃根是桃叶的妹妹，可能不及桃叶娇好，或者是桃叶仰仗其夫王献之的大名，使一片桃叶在秦淮河上红了起来。

从夫子庙向西，秦淮河流经乌衣巷、朱雀桥，东晋时是王导、谢安两大名门望族的宅地，曾经显赫一时，唐时已衰败，在此居住的皆是平民百姓。诗人刘禹锡在此凭吊，感慨万端，写下了《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使秦淮河声名大震的当属杜牧的

《泊秦淮》。

明清时期，十里秦淮更是热闹非凡，朱元璋将秦淮河畔一些花园宅地赐给功臣，使秦淮河畔再现王导、谢安名门望族出入其间的盛况。“倚窗丝幃，十里珠帘，灯船之盛，甲于天下”。余怀《板桥杂记》亦谓：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灯船之盛，天下所无，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踏赖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闹达旦”。

除灯船之外，每年春天，秦淮河畔举行斗草游戏。《红楼梦》曾对此有所描绘。春日融融，莺飞草长，一群群男女相约，嬉戏于秦淮河畔，好一幅江南踏春图。诗人吴兆写下《秦淮斗草篇》，记述这有趣的活动：“因娇丽日长干道，相戏相耍斗芳草。芳草市初齐，茸茸没马蹄，芳草远如雾，望望迷人步”。

由乌衣巷向西，便是江南名妓李香君的故居。孔尚任的《桃花扇》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皆从秦淮河拾得灵感与才气，使文章斐然。

诚然，秦淮河亦是一条藏污纳垢之河，成为公子王孙狂欢作乐的去处。秦淮河喧嚣的外表下面，亦流淌着多少妓女歌妓辛酸的泪水，载不动几多愁。

荡舟在20世纪90年代夏日的夜晚，夹岸灯光如昼，夫子庙前依然是游人如潮，但秦淮河已失去往日浮华与喧嚣。到秦淮河来觅古寻幽的寥若晨星，仅一只游船稀疏地坐着几个人，没有琴瑟，没有歌唱，似乎怕惊醒那远古的梦。我想此时的秦淮河像卸了妆的演员，虽不艳丽，却是一个真实的秦淮河。只可惜这场戏演的太久了，演了一千多年。秦淮河真的太累了，该进入梦乡美美睡一觉。我乘的这只游船，从它梦的边缘轻轻滑过。

（责任编辑 丁未）

# 秋雨亭

# 新记

● 吴继路

在绍兴解放路的轩亭口，有一座像利剑直插云霄的石碑，这就是“秋瑾烈士纪念碑”。望着它，像条件反射似的，心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阴森惨怖的场面：

一个浑身黑色的人，一只手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从对面瑟缩颤抖的老人手里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走了。那是个丁字街头，破匾上有“古口亭口”四个黯淡的金字。

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听老师细细地讲《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鲁迅的作品；也从老师口里知道，小说里那个被“间接描写”的革命者，坚贞不屈，在狱里还鼓动人“造反”，最后被清政府的刽子手杀了头。他的名字叫夏瑜，实际上暗寓一位女革命烈士，鲁迅的同乡，她就是秋瑾。

于是我也第一次知道秋瑾。这位女革命家得到了文学大师由衷的礼赞，那就是新文学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细节：烈士的坟上平添了一个红白色花扎成的花环。花环在我们心灵上熠熠闪耀了许多年月，但是我对秋瑾烈士更详细的事迹却并不知道。

那一次——已经近十年以前，我因参加一个讨论会有幸游览绍兴。鲁迅故居和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自然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去处；东湖、兰渚山和禹碑等名胜也观光了。而我觉得意外的，是瞻仰了几处秋瑾的遗迹：故居畅和堂、当年她联络同志准备起义的大通学堂、纪念碑和后代特为纪念她而修建的秋雨亭。由于同时读到秋瑾的传记，拿文字记载与实地实物相比照，这位本世纪初为人民解放而献

身的杰出女革命家、女诗人的高大形象，才在我心中雕塑般矗立起来，鲜亮起来。

人类历史上任何除旧布新的路都是鲜血铺成的。秋瑾 33 岁的生命，正赶在 19、20 世纪之交，也是中国新旧时代之交。为了结束延续数千年之久的黑暗、专制、愚昧、惨苦的社会，建立较为合理、进步、光明的新生活，有多少人喋了血、拼了命、掉了头呢？而这个前仆后继行列中的女性，她的精神光辉无疑更加熠熠耀目。读秋瑾故事，我头脑中时时浮现出我的祖母和母亲那一代妇女的生活情景。从年龄推算，祖母属秋瑾同一代人，而母亲则是她们的下一代。且不讲别的，这两代妇女都是缠足的。缠足，以极愚昧的方式摧残身体，这项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恶俗，曾经顽固昏蒙地延续数百年。我小时候，已经三四十年代了，竟还见过小小姑娘被大人逼迫着，用几十斤重的捶布石压挤，只为了弄出一双小脚！“妇女解放”是近代世界频频疾呼的口号，想不到“解放”二字，对旧中国妇女的双足，还有那么实际的放绑意义。秋瑾投入革命洪流十几年，对妇女解放这一历史课题，她的先觉、先驱言行，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明灯、如号角，振聋发聩，彪炳不磨。伟人周恩来赞颂：“自秋瑾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以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为求妇女解放而投身社会解放的革命，秋瑾清醒而自觉；她写诗述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多”。她的励行实践，直至喋血捐躯，那巾帼英魂始终高擎解放的旗帜，毫不懈怠。

在绍兴，最醒目，最具有纪念价值，可以成为“愿牺牲报国”的秋瑾烈士不朽精神象征的建筑物，要推卧龙山上的秋雨亭。城西葱茏峻拔的卧龙山古迹不少，北有观

海亭，东有越王台遗址。南山顶上矗立的六角翘檐木亭，即秋雨亭。在亭里可以眺望会稽四方山光水色；东南角粼粼闪光的宏阔水面，正是鉴湖，这让人立刻联想秋瑾投身革命之后，束发佩剑，英姿英发，自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号：“鉴湖女侠”。亭与湖盈盈相望，遥遥辉映，其间翩然奋飞着女杰慷慨高洁的灵魂。

我坐在秋雨亭旁正作剪辑时空的遐想，忽然被近旁爆发一阵多声部的笑声打断。从山下走来一群游人，一律女性。凝望一伙衣饰时髦，又豪气十足的当地女子，我心幕上不由“蒙太奇”般叠映出一个镜头。啊，这是出自名人手笔的当时场面：

“一忽儿，看见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的奔过我家门旁的锦鳞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

这一瞬间场面是在一个六七岁孩子眼前发生的，被他天真的记忆清晰摄影下来。记忆存留数十年，当把这目睹的情景描述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名字叫范文澜。那件偶然遇见而烙印心中的事，发生在 1907 年 7 月 13 日下午，当时正秘密准备反清起义的秋瑾，因为官绅告密，她在大通学堂被官兵拘捕。范文澜先生的故家，正在那附近的弄堂。

啊，时光流星般倏忽驶过 80 年，刚才朗笑着的这几位绍兴姐妹，知不知道当年曾有一位如自己现在年龄的同乡、先贤，曾经为自己的祖母、母亲们的解放，为她们获得登山观水，开怀畅笑的幸福，甘愿献身流血呢？

我抬头细看秋雨亭。亭在蓝天映衬下闪着明亮的阳光，灿灿如

金。它的名字取自秋瑾女士绝命时的一句诗：“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被捕后，被押往绍兴府，府官贵福严刑逼供，又软硬兼施。秋瑾承认是革命党，把一切事揽在自己身上，对同仁、组织守口如瓶，只字不露。后来换了山阴知县李某审讯，仍然问不出一点名堂。为找个台阶下，县官命人拿来纸墨，诱秋瑾把口供写出来。秋瑾拈笔在手，凝思片刻，落笔写了个“秋”字，停笔沉思；审官催促“快写”，她奋笔疾书，纸上龙飞凤舞现出 7 个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写罢掷笔，再不说一句话。

“于无声处听惊雷”——在这充满苍凉悲愤的起句之后，跟着涌动喷薄的是怎样的情思之瀑呢？是对黑云压城腐败统治的控诉？是对家国命运飘摇的忧虑？是对自己行动失败的叹惋？是对后继者再接再厉的沉重寄托？如此浩荡无涯的情思，“怎一个愁字了得”？7 个五雷轰顶的字，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永远鸣响的煌煌断句。

一座秋雨亭，不正是这振聋发聩 7 字大诗的建筑凝结么？

秋瑾牺牲的第四年，腐败的清政府被革命党人推翻了。友人依她的遗愿，把骸骨从绍兴移葬到杭州西泠桥畔；那里长眠着岳飞、于谦和张煌言等民族英雄的忠魂。秋瑾墓边同时修建了一座亭，名风雨亭。1930 年，由秋瑾战友主持，于绍兴轩亭口她就义处建了一座纪念碑，同时在卧龙山修盖了这座居高临下的秋雨亭。

华夏大地，绍兴古城，在这大禹建功立业，数千年英雄贤者辈出的地方，有这么一座亭，纪念为祖国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女杰，这亭尽管不豪华，却是很值得本世纪人，也很值得新世纪人瞻仰的。

（责任编辑 一尘）

# 《炎黄春秋》1996年1—12期总目录

题 目	作 者	期·页	题 目	作 者	期·页
新年致读者	本 刊	1·2	解放大陆的最后决战		
			——从卢汉起义到汤尧就擒	王永春	3·37
			高树勋捕杀石友三始末	张云奚	3·46
			假扮和尚 幸离血海——南京大屠杀		
			的见证人钮先铭	谢尊一 呼延如璞	3·49
			沙市“火烧洋码头”事件	陈礼荣	3·53
			胡适竞选总统内幕	马克锋 游国立	3·57
			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		
			元老陈诚	左双文	4·42
			海外华人学者陈源的一段是与非	吴海发	4·44
			毛泽东巧借美机空运将帅赴前线	牛大勇	5·10
			百天战斗：北平《解放》报从创办		
			到被查封	于光远 张 沛 孙 政	5·15
			长征：共和国在马背上	李茂林	5·21
			历史档案回答了张学良对长征的		
			一个疑问	力 平	5·25
			王明错误路线纠正始末	曹 英	6·6
			抗日劲旅第十九路军的兴与亡	陈光明	6·12
			驻旅顺苏联红军提前撤退内幕	周金明	6·20
			傅崇碧谈“杨余傅事件”	舒 云	6·22
			错误开除刘少奇党籍时		
			陈少敏唯一反对票的是非毁誉	耿一民	7·11
			“太上皇”洋顾问李德离开中国之后	卢 弘	7·20
			黄绍竑、刘斐与44人声明	刘晓滇 刘小清	7·28
			在农村工作大论争中求实直言		
			的邓子恢	许人俊	8·2
			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		
			的党内争论	李 锐	8·14
			为剿匪屡建奇功的“二〇八”情报站		
				王方业 赵 青	8·22
			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	马仲扬	9·2
			日军攻占香港的“C作战计划”	马仲廉	9·11
			李默庵纵谈湖南起义	高建中	9·18
			张国焘的人格缺陷	朱秀海	9·26
			周恩来和赵丹谈文艺需要民主	周 哲	10·2
			韦国清与莫边府大捷	王振华 张广华	10·6
			陆定一与百家争鸣方针在遗传学中		
			的运用	于光远等	10·9
			毛泽东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张纪夫 谭德峰	11·2

孙中山北上及病逝北京前后	劳允兴	11·10
续范亭与“西安事变”	邢同科	12·7
由“沈崇事件”引发的一场爱国斗争		
方复	杨立	胡东明 12·15
刘善本驾机起义始末	温济泽	12·20
胡耀邦最后一次故乡行	杨第甫	12·24
罗青被捕与“七君子事件”	申春	12·27
杜任之被阎锡山决意处死又获救经过	马明	12·30

### □ 争 鸣 录 □

试析“康生现象”的历史条件	冯建辉	12·34
---------------	-----	-------

### □ 英 杰 谱 □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	孙彦钊	1·42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最初奠基人江上青	欧远方	1·48
张爱萍单枪匹马闯路东	胡士弘	2·14
张云逸大将的廉政风范	张广华	2·20
上将杨至成的五次坎坷婚恋	窦孝鹏	2·28
我所认识的艾思奇	温济泽	3·2
毛主席称他“邵大哥”	陈家鹦	3·8
大总统孙中山廉洁自律	徐庆全	3·15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孙彦钊	5·38
内蒙古·乌兰夫·周恩来	郝玉峰	6·26
沈鸿：从小业主到共和国部长	曹进堂	6·30
朱德和他的女儿朱敏	王基高	6·36
贺龙和他的姐姐贺英	周保林 罗长江	7·51
饮誉中外的正义法官梅汝璈	王俊彦	7·56
毛泽东和开明士绅李鼎铭	李葆定 冯彩章	8·26
宋庆龄与鲁迅的友谊	陈廷一	8·32
陈毅登门向民主人士道歉	王荫	8·34
满门英烈的张太雷一家	伊里	9·40
张闻天为何三让中共中央总书记	孙彦钊	9·48
搞原子弹王淦昌埋名17年	马京生	10·19
奇人陈翰笙要跨三个世纪	张彦	10·21
血战上甘岭	李德生	10·24
我所了解的孔从洲	杨荫东	10·30

### □ 人 海 浪 □

陈布雷、陈璉父女分道扬镳	章学新	1·52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	舒芜	2·61
“中国女婿”李敦白	李健民	4·46
宋霭龄给孙中山当秘书的日子	名芳	4·51

粟裕对手李默庵谈“七战七捷”	高建中	5·52
艺坛猛士、政治漫画家米谷	沈云汉	5·59
蒋介石的身边人 共产党的好朋友	王光远	6·60
一个战犯夫人的悲喜人生	李占恒	6·63
周扬晚年的彻悟	宋廷明	9·56
从历次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翻译家		
——许渊冲	龙梅	9·58
中央苏区第一任妇女部长周月林		
的曲折人生	万刚 辛畅	10·55
芬娜走进蒋介石家门	窦应泰	10·58
梁实秋之女梁文茜的昨天和今天	杨小武	11·66
“第二条战线”的闯将袁永熙的传奇人生	章学新	11·59
吴子熊的玻璃雕刻艺术		
令世界惊叹	陈明红 金正传	12·55

### □ 赤 子 心 □

霍英东是怎样从底层搏出来的	纪流	2·44
一个结束“天有不测风云”历史的人——记著名气象学家、百万元大奖获得者叶笃正	顾迈南	3·20
郎平回国意在重振女排雄风	周童	4·30
李小龙、成龙“双龙”挑战好莱坞	东方舟	4·34
司徒美堂何以受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礼遇	木易	5·43
参加拟定“863”计划的老科学家		
王大珩	马京生	6·48
美国总统奖获得者中国青年科学家		
邓兴旺	陈浜	6·51
谢子长之子谢绍明是怎样继承父业的	青霞 炳书	7·38
美国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中国心	吴跃农	8·36
三次“金钥匙”奖获得者李美筠	田兰富 齐海萍	8·38
慕生忠：筑在世界屋脊上的“丰碑”	邹蓝	9·62
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博士	李宜华	9·65
冰心子女谈冰心家教	满素洁	11·48
吴清源驰骋日本棋坛六十年	吴景略	11·53

### □ 殒 星 篇 □

石井音魂——音乐家任光血洒皖南	周乃光 严文欣	2·17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	靳树鹏	2·36
青年刘少奇	黄诤	2·25
叶挺为何四辞新四军军长之职	张婉英	3·26



## 千古悲歌黑茶山——纪念“四八”

烈士遇难 50 周年	赵友慈	3·31
“八女投江”故地行	李向前	3·35
谋杀刘少奇的“湘江案”泡汤记	胡 牧	4·19
邹韬奋在日伪鼻子下脱险	王 荫	4·24
李维汉“残年有志惜晚晴”	温济泽	6·40
从文坛女将到总理秘书	刘小清	6·44
周恩来要我经商	肖 林	6·47
碧血丹心的郭化若将军	周而复	7·44
抗日英雄李兆麟遇害始末	钟子云	7·48
艾青的风雨人生路	祁 人 沙 平	8·11
我的老师闻一多	李羲沐	10·34
胡耀邦和他的警卫	舒 云	10·36
古柏一生遇一知己	陈其明	10·38
斯诺眼中的焦点时刻	武际良	10·41
纪念革命先烈杨匏安百岁生日	于光远	11·20
我的父亲杨匏安烈士	杨 明	11·22
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胡愈之	马仲扬	11·26
法学家张志让与三位共产党人的交往	钱听涛	12·38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后日子	刘小清	12·41
中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	吴 鹏 于建宁	12·45

## □ 时 代 风 □

### “规范+选择”:冯恩洪为跨世纪

教育“抛砖”	萧 徐	1·63
聂荣臻元帅和他的两位老秘书	马京生	2· 6
胡耀邦胞兄探亲记	余振魁	2·43
通向太空的航天铁路	才铁军	5·69
延安时代的清廉与民主风尚	杨闻宇 张祖煦	6· 2
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中国在亚 特兰大奥运会上能保持金牌第四名吗?	笑 非	7·33

陕西农民的苹果梦	辛 平	8·65
一个乡村中学校长的“教育价值论”	萧 徐	9·72
异国航天业巡礼	王剑盟	10·48
贵州人移贵州山	刘宏伟	10·53

## □ 长 征 颂 □

有矣记述长征故事的故事	辛 平	7·61
大渡河边的战前动员	李水清	7·67
珍贵的长征记录	谢景星	7·69
从 60 年前拍摄的毛泽东照片说起 ——红军老战士钱江忆长征	钱听涛	7·72
炸不垮打不散的红军长征队伍	董小鹏	9·54

我送贺老总一匹“绿马”	陶汉章	12·49
万里征途生死情	易 雯 黄道强	12·51
莫文骅老将军的两件珍藏品	李春宇	12·53

## □ 神 州 光 □

郑州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	朱启新	1·79
中国制造金属管形火器始于何时	朱润轩	2·77
随州出土一件西周青铜罍钟	刘永国	3·45
杨廷宝:中国现代建筑的创始人	孙宅巍	10·68

## □ 九 州 景 □

山西有个“克难坡”	孙觉民	4·77
夜游秦淮	傅 贵	12·74
秋雨亭新记	吴继路	12·75

## □ 民 族 园 □

十一世班禅大师应化现身追记	王 尧	6·56
跟着红军走到如今的扎喜旺徐	李志刚 李泰年	11·31

## □ 同 心 结 □

三位南沙老人说南沙	杨肇林	2·10
唐纳与我	夏其言	2·64
台湾归来祭陵人	高建中	4·56
遥念谢冰莹	倪 锋	12·62

## □ 两 岸 情 □

台北飞鸿 情系故里	林玉华	8·69
-----------	-----	------

## □ 文 荟 园 □

姓名趣谈	史文贵	2·68
遗憾的怀念	于光远	3·61
不做闺秀做战士的陈学昭	陈伯良	4·60
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	陈忠祥	4·64
开明书店与文化人的情结	王汉华	4·69
纪念长征胜利 60 周年	晓 初	4·73
梁实秋、冰心联袂主演《琵琶记》	罗静文	5·65
艺苑掌故新谭五则	朱继功	5·47
画里画外的吴冠中	刘宏伟	6·76
《东周列国志》:三百年磋磨成名著	罗静文	6·78

解放区最早出版的画报	梁小珍	6·11	契丹一代巾帼英主萧太后	王兴文	关玉华	7·78
著名舞蹈家赵青广东寻根记	李健民	8·55	忠勇直谏、节俭奉公的晏婴		张伯芸	8·71
访炎帝扮演者孙玉书	苏咏鸿	8·57	“帐中坐叱山川走”的奢香夫人		彭云鹤	8·74
黄炎培的亲情诗	俞润生	8·58	从屈原、欧阳修谈到“贬官文化”		杨尚聘	8·76
一幅没有题名的舒同墨宝	田方	8·63	“关羽大意失荆州”吗?		李书吉	9·75
谢稚柳和张大千的敦煌情	倪怡中	9·70	力主“匡正时弊”的李鸿		瞿林东	9·79
马上诗人张爱萍的长征诗	东方鹤	10·45	洋务运动:一个悲怆而沉重的话题		徐庆全	10·71
毛泽东与京剧演员李和曾	冯彩章	11·37	司马迁后人今安在		李镜	10·77
诗六首	强晓初	11·40	居官之箴规 察官之明鉴		李文林	11·70
台湾作家的乡土情中国心	王景山	11·41	太平天国的禁赌禁娼禁毒		邱远猷	11·72
			张謇:从状元郎到实业家		李羽壮	12·68
			廉俭恤民的君主隋文帝		贺海	12·72

### □ 艺苑志 □

我同京剧三大名旦的交往	葛献挺	1·76
伶界大王谭鑫培的戏外戏	刘连群	3·71
我与“武生泰斗”厉慧良的40年交往	冯其庸	7·75
怀念周总理对昆曲艺术的扶持	陆放	12·64
新长安大戏院开幕忆旧	葛献挺	12·66

### □ 遗闻录 □

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	丁人卜	2·46
报头变换《光明日报》曾起风波	关民	5·48
毛主席纪念堂工程与天池山文物保护单位	张志新	5·50
蒋军在台湾的一次特大坠机事件	徐刚	6·66
三位名教授掩护我脱险	裴毓荪	6·68
彭总和甘泗淇行军路上的一次趣谈	陈辛火	7·19
张大千重金求名画	李永翹	8·46
回忆在中南海的采访生活	徐熊	8·52
40万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	苏智良	10·62
长征中红军将领的坐骑	于东	10·65
江青诡踪查武训	傅哲清 傅军	11·43

### □ 轶闻录 □

张学良恳求普顿德调停直奉战争	王福时	3·63
张学思与启蒙老师王西微	刘永路	3·66

### □ 古镜台 □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记	邱远猷	1·67
人祖伏羲考略	段向群	2·74
从出土墓志看包拯的廉正家风	朱启新	3·77
黄梅案乾隆帝为何出尔反尔	傅贵	4·71
历史上的刘墉	王俊义	4·74
清代名臣孙嘉淦和他的《三习一弊疏》	李文林	6·70

### □ 古今谈 □

歌谣、谚语与武则天前后的朝政	拜根兴	1·73
华夏文明和龙凤文化	谢世俊	2·78
“扬州出美人”背后的血泪史	经盛鸿	3·74
大渡河: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邱远猷	5·47
以崇节俭为要务的刘裕	安中晶	5·78
瓷殇——中国古陶瓷市场的忧思	段向群	6·73
欧阳修严以责包拯	春江	11·75
闻一多眼中的美国	李凌	11·77

### □ 他山石 □

光耀太平洋两岸的史迪威将军	张文苑 张星星	2·54
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	韩凤琴	10·12

### □ 耻辱柱 □

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赵友慈	12·58
----------------	-----	-------

### □ 编读窗 □

《还历史本来面目》等三则	本刊编辑部	4·79
作家舒芜致本刊信		5·79

### □ 信息窗 □

《炎黄春秋》隆重纪念创刊五周年	本刊编辑部	8·78
“孙中山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12·6

# 炎黄春秋



1949年11月28日，纪念西安反“围城”胜利10周年大会，前排为党军学员，中为新调城，后排右二为罗青等。



罗青与“七君子”出狱时合影，右起：罗青、邵剑奇、李干里、李公朴、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

## 罗青被捕与“七君子事件”

### 法学家张志让与共产党人的交往

### 刘善本驾机起义始末

### 怀念周总理对昆曲艺术的扶持

### 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 张謇：从状元郎到实业家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00元